



Mt
K101
28

世界歷史名著叢刊

社會鬥爭通史

第四卷

近代社會鬥爭與社會思想

Max Beer 著
葉啓芳 譯

8429

神州國光社出版



3 1799 8648 8

譯者小序

柏耳的社會鬥爭通史全書，共爲五卷。我在本年二三月之間，一口氣便把前四卷譯成了。我不懂德文，所以譯本便以紐約國際書局之史天雷(H. J. Starnitz)英譯本爲根據。但該英譯本是曾爲原著者柏耳所校訂過的，其可靠之程度，當不下于原文也。

關於本書之綱要及優點，讀者可於書中領略出來，不必在此多說，而且我在第一卷及第三卷的小序中，也已說過幾句話了。我在這裏所說說的，是原著人柏耳之生平及其著作，相信這對於本書之瞭解及趣味，是很有幫助的。

孤陋寡聞的我，對於柏耳生平毫無所知。至於其著作，則除本書社會鬥爭通史之外，聽說還有馬克司生平及教訓與英國社會主義史二書。我的所知既少，所以便四處向

友人通信，務期集合所見，以便成一篇較詳細的柏耳小傳。然其所得之結果，竟微而又微。有一友人曾在德國習政治經濟有年，覆函竟說全不認識有柏耳之名字。復細查一九二九年人名錄 (Whos who 1929)，此公之名字，亦不見有列入其中。我是如何的失望啊！

幸而過了兩個月，對於柏耳生平之認識，才有把握。劉秉麟先生本是國內經濟學中之名宿，我本來不認識牠。這次因為查考柏耳之生平，由友人輾轉托黃君向劉先生探詢一二。承劉先生不棄，竟抄錄柏耳生平之自述見示。原文爲英文，茲漢譯於下：

『馬克司柏耳生於西部之加利西亞 (Western Galicia)，其地爲多奴伯拉色 (Tor-nobrezeg) 的純粹波蘭人之區域，但隔最近的俄羅斯鄉村，祇橫過維斯多拉 (Vistula)，其距離僅一英里。一八八九年，我剛正二十五歲。我離去家庭，在德國住了五年，其中，有十四個月，困於囹圄，其原因，是在於我在麥格德堡 (Magdeburg) 的一個社會

主義勞工黨的報『人民之聲』(Volkstimme)，爲編輯的工作。一八九四年春季，出獄，當地長官警告我，說，除非我不再爲社會主義的報紙作文章，否則必把我逐出於普魯士之境了。一八九四年六月，我離開麥格德堡，到倫敦去，在該地工作，直到一九一五年五月爲止。我是倫敦大學的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第一批學生之一個，在學之時間，爲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而領導我者，則爲荷文斯教授(Prof. Hewins)。一八九八年，我在巴黎住了幾個月。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我又到紐約探訪我的父母。從一九〇七到一九一一年，我是柏林 *Vorwärts* 日報的倫敦通信員。從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五年，我以著作家和職業的通信員爲生活。在大戰的時間，我被人詆毀爲一個仇敵，令我不得不離去英倫。自一九一五年五月起，我便住在德國了。』

關於柏耳生平，所知僅此，但寫了出來，對於本書讀者，必會發生多少興味也。

我對於劉黃二先生，均表示萬分之謝意。因為若沒有他們的幫助，則這一段柏耳的生平，總寫不成了。

又史天甯英譯本之第五卷，到今尙未出版。一俟出版後，當即趕譯，俾本書之漢譯本，得成完璧也。

十九年六月五日 葉啓芳

近代社會鬥爭與社會思想目次

第一章 英國之經濟革命

(1) 商業及工業階級之優勢

(2) 機械的發明及工場制度

(3) 亞當斯蜜，邊沁，和李嘉圖

第二章 經濟變遷第一期之英國社會批評家

(1) 羅拔窩雷斯：社會主義與人口過剩

(2) 斯賓斯和土地改革

(3) 葛德文和無政府社會主義

(4) 查理士荷爾：階級鬥爭之說明者

第二章 法蘭西經濟變遷之嘗試

(1) 由保護到自由

(2) 重農學派：經濟的自由：放任，自由

第四章 法國革命

(1) 各種階級與憲法之衝突

(2) 革命的獨裁制度

(3) 一七九三年之憲法及社會批評

(4) 郎格及多利維耳

第五章 巴卑夫及其徒黨之謀叛

(1) 原因及目的

(2) 腓立普波拿洛第及革命的獨裁制度

(3) 謀叛之結果

第六章 德意志之反動

(1) 經濟的復興和政治的壓迫

(2) 威蘭德和海因斯之社會主義

(3) 異教徒的社會及宗教之趨向：韋沙布德(光明派)

(4) 噶荷爾德以法連來辛

(5) 法特烈基利斯托夫奧廷格爾

(6) 斐希特及其社會政策

第七章 拿破侖時代及王政復古時代之法國

(1) 戰爭，帝國政策，及商業投機

(2) 查理十傅立葉

(3) 聖西門

(4) 聖西門派

第八章 英國勞動運動之發端（一七九二到一八二四年）

（1）法國革命之影響

（2）拉第德派

（3）狂飆時代

（4）羅拔奧文

（5）孔伯，格雷，湯普孫，摩爾根，伯雷

（6）個人主義的社會改良家：歷文斯頓，霍斯堅

第九章 第一次的英國社會革命運動（一八二五到一八五五）

（1）第一個階段：爲要求選舉權的勞動階級及中產階級之同盟（一八二五到一八

三二年)

- (2) 第二個階段：反議會主義及工團主義（一八三二到一八三五年）
- (3) 第三個階段：新憲章運動（一八三六到一八五五年）

第十章 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之法國

- (1) 資產階級的王政
- (2) 資產階級與平民階級之劃分
- (3) 祕密之謀叛及暴動
- (4) 奧國斯德白蘭格
- (5) 社會主義者及社會改良者：伯格爾，蒲魯東，加伯德，拉羅克司，白蘭克
- (6) 一八四八年之二月革命

近代社會鬥爭與社會思想

——社會主義通史第四卷——

第一章 英國之經濟革命

(一) 商業及工業階級之優勢

一六四二年所暴發的革命，在各種方式和變化之下，延續下去，到一六八九年之開始，方才結束。牠的結束，同時便是個人王政之傾覆和議會之勝利。自此以後，英國成爲一個共和國，但有一個王政的名目。當時人口還是很少；祇達到五百萬人，其中有一百五十萬人，屬于工商階級。製造業倚靠于手作工業和家庭工人，但同時也有大工場聚集着大批工銀的職工，而形成偉大的人類機械。她們都全以工業資本來支配的。



(南)

就在革命之時候，處于克林威爾 (Oliver Cromwell) 領導之下，工業利益已經統制了海外政策，而這種趨勢，在十八世紀之時間進程中，都是很有力的。外交和議會，民權黨 (Whigs) 的貴族和銀行家，互相結合權力，又以商業的，殖民的，及戰爭的經營之贊助，而壟斷商工二業之廣大市場。他們克勝了尼達蘭 (Netherlands) 及法國，壓抑愛爾蘭之工業競爭，還且企圖把北阿美加洲之工業開拓，加以摧毀，而又建設一個印度帝國。他們造成銀行，船隻，製造業，掠奪小農階級，而把他們變形為無產階級，他們要在築路，修河，和方興未艾的工場制度，找到他們的工作。他們唯一的失敗，是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三年美洲合衆國的獨立，美洲合衆國之獨立，完全是應由古老的和短見的殖民政策所負責的。

(2) 機械的發明及工場制度

市場擴大和商品需要增加之結果，令到交通和生產，都非常必要，刺激工程師，發明家，和科學家，以滿足市場之需要。於是英倫馬上，便有了新道路新運河的一個密網了；蒸汽機已加改良；石炭在金屬工業中，得了很大之經濟利用；紡績機和飛梭機創造了近代之紡織業。機械之急速轉動，鎔鑄爐之明亮火光，工場烟鹵之行列，在十八世紀之最後二十五年中，已經宣布石炭和銅鐵時代之來臨了。

英國從農田的國家一變而為工業的國家，其時間的過程是狠短促的。工場及整個工業的中心，從古老的荒村和平的鄉落，發生起來。人口之增加，其速度為以前所未有；城市在鄉鄰之間，蔓延，伸展，而且膨脹。一七五〇年，英倫及威爾士的人口，祇達到六百五十萬；一八二一年却超過了一千二百萬。一七六〇年，曼徹斯特（Manchester）居民為四萬名，一八一六年，却為十四萬名；伯明罕（Birmingham）在一七六〇年為三萬，一八一六年為九萬；利物浦（Liverpool）在相同之時期，也由三萬五千人口，增

加到一十二萬了。(註一)

(註一)這種人口急速增進之現象和民衆之無產化歷程相結合，在窩雷士(Wallace)及湯散德(Townsend)範成公式之後，幫助馬爾塞斯(Thomas R. Malthus 一七九八年)的教義四處傳播，馬氏學說以爲人口增進比食糧增進較快。所以貧窮之補救方法，在節制性慾，或節制窮人家族之人數。

一七五〇年，出入口貨總計大概爲二千萬磅；一八一五年，增加到九千二百萬磅。令到這個光景之轉變是工業革命。全體人類都走入牠的軌道之內。牠的結果，非常深刻，非常廣泛，遠過于古代文化，十字軍，文藝復興，及種種政治上之革命的結果。牠建設一個新的秩序之基楚；牠做成消滅貧窮及社會壓抑之手段；牠又造出近代無產階級及近代社會主義。

創造的歷程，如下所述：經濟之需要，科學之研究，技術之發明，工業之狂風暴雨，生產能力之解放，新的社會觀念，社會批評，階級鬥爭，罷工，示威運動，機械之

破壞，社會改良和政治改良之方案，社會革命。

造成這種革命而且加增財富生產之可能性的人們，大多數是勞動者，工匠，和小規模工業家。他們之發明的思想，經已和種種困難相搏鬥。但為社會之需要所驅策，他們便繼續工作，不顧及結果和報酬。那些為紡織機的完成而供給貢獻的人們，是：開爾（Kay，鐘錶匠），韋德（Wyatt，木工），亞爾護黎特（Artwright 理髮匠），海爾格來夫司（Hargreaves，紡織工），和格林普頓（Crompton，機械工匠）。飛梭機之創製是鐘錶匠開爾及牧師加爾德護黎特（Cartwright）的功勞。新的道路及運河，是由于兩個既不能寫字，又難于讀書的文盲工人，伯連德利（Brindley）和馬德加爾夫（Mecalf）所建築的。蒸汽機及自動機關車之完成者，是紐琴曼（Newcomen 鐵商），加來利（Crawley，玻璃匠），瓦特（Watt，機械師），和斯梯芬生（Stephenson 牧牛童及機械匠）。

工業革命之豐厚的財政結果，其收獲者，不是實際的創始者，不是科學之研究家，

也不是發明家和生產的工人，而却是具有商業聰敏及企業精神的商家及富翁。其結果，則他們對於自己處置的機械發明，完全不懂是什麼東西，他們祇具有為商業目的而統治生產力的能力，務令到生產力，繼續存在，繼續增加，並且為把一切東西，附從于利息的原故，祇以利息為物質勝利的最必需的東西，而其他則儘可以殘酷無情。羅拔奧文是他們同時代的人，對於當時的情形，又非常熟識，他說道：「新的主人之大多數，祇懂得商業的技巧和初級的算術，此外一無所知。機械發明的發達之結果，就是財富之迅速集合，牠造出一批資本人家，然而他們是人口中最愚蠢，而又最殘酷的份子。」（註一）他們這一羣人之中，又招募有工業之隊長，資本主義形式的經濟組織者，他們自以為是他們自己幸運之創造者，他們把自己的勝利歸功于自己的能力，他們要有一種受他們支配的法律，反抗一切國家的干涉及官長的參加于其內。

（註一）羅拔奧文自傳。為本書著者伯爾所編纂，倫敦一九二〇年版，一七七頁。

(3) 亞當斯密，邊沁，和李嘉圖

工商資本之利益及主要的性質，和擁護新生產力的解放之人們，都逐漸和拘束經濟生活的國家及警察規制相衝突了。一切以往的制度，全以手工業，家庭工業，古老的學徒制度，入口貨之限制，農業之公開土地制度等爲基楚，現在呢，則以一個繼長增高的程度，表現牠自己是一種以大規模工業及必須技術的改良和進步爲基楚的新經濟樣式之不能忍受的束縛了。『自由』成爲戰陣中之呼喊。個人之自由，爲個人利己心所指揮的行動自由。以人類利己的心理代替了國家及警察，牠規制一切東西，刺激一切人類，從事他所最好的工作，并且從他自己的行爲中，抽出最偉大的利益。

工業革命之世紀，創造了自由主義是資本階級之利益和心理的政治及道德之表現。他們在英國之代表者，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13至1790年），耶林美邊沁

(Jeremy Bentham 一七四八至一八三二年)，和大維德李嘉圖 (David Ricardo 一七七二至一八二三年) 三人，他們雖在個人之觀點及行爲上，都極表同情于勞動者，而在研究者和著述家之地位，却表現資本和一般私有財產的利益，他們總以爲私有財產是社會生活的最確實的基礎。

按照斯密之見解，生產之勞動形成國家之富的源泉。假若土地和牠的粗糙原料，仍然是公有的財產，則生產物品之勞動者，必仍然是財富的擁有者，而一切增加之價值，都要歸屬他們。因爲商品之價值，由應用于生產之勞動和艱苦所構成。但是公有財產早已不復存在，而勞動者祇能受取工銀，所以工銀必當規定較高額，令他們能夠供給生活。由勞動而商品增加價值，落在資本家手中，他們把生產手段供給于勞動者之處置。至于此外，則國家不當干涉經濟生活，而當由個人之利己心及自然的自由充份行使其職權。工作，資本，和自由是經濟繁榮的三個條件。國家之任務，應該自限于保護財產。

勞資之關係，則後者應以人道和正義，優待前者，給以較高的工資和適當的勞動條件。斯密的主要著作，出現于一七七六年，其名號爲『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邊沁之槍頭既對着國家，也對着社會主義者。他的基楚觀念，以爲一切社會及政治的組織應該以下述的原理試驗之。這個原理就是：牠可以促進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麼？國家決沒有完成這個目的，但在普通利益之托詞之下，牠祇見及他自己的徒黨，少數特殊權利之人之福利而已。這樣的一種事情，可見一般利益全無存在；現在祇有的是個人利益，所謂社會的生物，並不是什麼，祇是多數個人之一種集合而已。社會主義也不能促進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因爲牠主張平等的分配，于是便毀壞了生產勞工之勞苦的及有效的刺激。自然界把人類放在兩個主人之下：痛苦和快樂，有效和損害。他們告訴我什麼是我們應做或應避的事情。一切產生繁榮或快樂的東西都是善的，其反面則爲惡。

的。個人集合而成社會，每個人都為有效的，繁榮的，和快樂的行動而追求，每個人都應該有參加政府之權利。一切政治的政府之所以必需之時，必要是民主主義的，但就使在民主主義國家，也應當自限于消極的方面：牠祇要把阻礙個人追求快樂之礙石移開去而已。

邊沁之教義表現于他的『道德及立法的原則』(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一七八九年)一書中，他的教義名為『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在英國改良運動(一八二五到一八三二年)有極大之影響。

李嘉圖以經濟學家著名。他的主要工作，是關於工業革命之影響，和價值，價格，工資，利潤及地租之性質，啓發英國國民，而且以經濟學之名詞，以解釋工業階級和地主之衝突。按據李嘉圖之說，社會中有三種階級：資本家，工人，和地主。社會中以資本家為最重要的階級：他們領導生產，造成經濟生活之主動原因；他們收入之根原是利

潤：工人祇是生產之工具，像負重担的畜生，器皿和機械一樣；他們收入之根原是工資；至于地主呢，則完全是寄生虫；其收入之根原是地租。資本和勞動之利益，在其最後之手段，是相一致的，雖然在事實上工錢之高漲就是利潤的低落。這種一致性要在新機械之引用，才被破壞，新機械之引用，對於資本家，大有益處，增加牠的競爭能力，但對於勞動者，則大有害處，因為牠的影響，會節省了生活的勞動力，造成失業的情形。從他方面言，一面有勞資的尖銳反抗之存在，而一面又有為穀米律保護的地主主義。因為工業之發達和都市之繁榮，令到糧食有一種極大的要求，價格和地租，都繼續騰貴，于是資本家的利潤和工資之一大部份，都走入地主之荷包中。這種反抗，深深地植根于經濟之事實，而商品之價值則包含于牠的生產和分配（從工場到消費者）所必需的勞動數量之中。勞動數量的每一種之增加就是牠的價值之一種增漲，反之則與勞動數量之每一種減退而同時墮落，而所謂勞動數量就是商品生產之代價。減退的事實就是工業

之情形：價格低落了，因為新的機械發明，減少了物品生產所必需的人類勞動的數量。但在農業，則這種趨勢適為反面。因為工業發展的原故，食糧之需要，隨之而增加；農耕擴張起來，便連不很肥美的土地，也加以利用，而其結果，又需要勞動之數量了。勞動之數量愈大，則指明價值之份子及價格都愈高；而且若不很肥美的土地，也加以利用，以不很肥美的土地來決定地租之租額，則第一等土地的地租，自然是更昂貴了。食物價格之高漲又令到工資必須加高，因為工資並不是什麼，祇是一種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費。工資加高之要求又令到資勞二方面之爭執，同盟罷工，羣衆之不平，和生產之破壞。工資之增加必會減少利息，因為工資愈高，利息必愈低。工資和利息恰成兩個極端之反面。而且，工人從較高的工資中，還是得不到利益，因為他不得不以全部工資費耗于食糧之上。所以，地主是從工業發展中得獲鉅大利益的唯一階級。于是而中層階級及地主階級之鬥爭便興起了。

李嘉圖之主要著作是『政治經濟學及租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出版年爲一八一七。由於他對於階級，價值，工資，地租，等觀念之定義，和階級鬥爭的顯示，李嘉圖替社會主義者開闢了一條大路。社會批評家站在李嘉圖的價值論之觀點上，而土地改良者則站在他的地租論的觀點上。後一種人以爲地租之騰貴，祇爲工業文化擴展之結果，並不是地主的個人努力，所以價值之不勞而獲的增加，應當爲公共的利益而消費。

第二章 經濟變遷第一期之英國社會批評家

(1) 羅拔窩雷斯：社會主義與人口過剩

經濟變遷之開始便刺激社會批評，而且領導思想家對於社會主義問題之注意。

這些思想家之第一個便是神學家羅拔窩雷斯 (Robert Wallace 一六七九到一七七一年)，在他的『各種的形勢』(Various Prospects 一七六一)一書中，他發起了一個問題，即是爲什麼一個人具有一切的天賦和自然的寶藏，還要居住于這樣的一個水平以下的文化之內。無論是道德，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生活，都是滿意的結果之證據。所以牠的問題便是社會中之罪惡及缺點能夠以社會主義之引用而除去麼。窩雷斯是從積極方面

解答這個問題之第一個人：社會主義並不和人性反抗，因為物品之平均在人類早期社會中，是最流行的。現在還應把這種制度重新引入于社會之中，固然那些偉大而有權力的人們，專從私有財產上，得獲莫大利益的人，對於這一種的變遷，是會以死力來抵抗的。社會主義可以消滅貧窮，工作過度，愚蠢無知，和不道德。然而牠並不是不可實行的。其真正的阻礙，實在由于人口之急速增加，牠奪去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之地位，而其後，竟令到一切反對一切的鬥爭，發生起來，因為食糧供給之增加決不能和人口之增加同一速度的原故。

從這一點，便可以見出社會主義之這一種特殊反對論證是怎樣的古老。但自十九世紀之後期二十五年以來，牠便喪失了一切意義，因為那個時代，反對之趨勢顯示出牠的自身——長官，祭司，和社會改良家，都主張要把在一切文化國家所進行的家庭制限，這一種事情，加以禁制。

(2) 斯賓斯和土地改革

多馬斯賓斯(Thomas Spence 一七五〇到一八一四年)是第一個都市社會主義的土地改革論者。原來他是紐加斯德爾(Newcastle)的一個製靴鞋匠，又曾做過會計員和教師的任務，他後來便轉其注意點于社會之研究，一七七五年，他在紐加斯德爾的哲學會中，演說土地的私有產業之不公義。他不久便把演講稿印刷起來，而且以幾個便士的廉值，沿街叫賣，因為這一個原故，他便被哲學會除名了。然而自此以後，這一種演講稿，以各種不同的名號，常常翻刻及發售：一七九三年，名爲『真正之人權』(The Real Rights of Man)，一七九六年，名爲『自由之日中時代』(The Meridian Sun of Liberty)，而一七八二年，則名爲『土地之國有化』(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Land)，及其他。斯賓斯和他的徒衆之見解，如下所述：在人類之古代情形中，土地是公共的產業，所以，每一個

初生的嬰孩，即有土地平分額的一種不能讓渡之權利。當時一切人都非常自由，其生活沒有政治之壓迫和人爲之法律。經濟之平等及社會之自由，都是一個人的天生的權力。像我們讀者所曉得的，這些教義是從古代的自然律引生的。自十八世紀之後，人類被混合于動物界內，而人類之先祖，則直溯源于類人猿去，因此，而人類便被人認爲是「人類動物」的一隊羣衆，他們的公共草場就是土地，恰像森林，河流，和湖沼，是其他動物界的繁殖之公共牧場和土地一樣。人類之自然社會逐漸崩壞了，一部份因爲人口之增加，和由人口增加而來的爭執和暴亂，而他部份則因爲專權的個人，沒收大部份的土地，歸屬於自己的利益之下，這是他們罪惡之性癖和壓制的行動。同樣，私產之概念，其興起實關於人類以自己的工作，而創造及改進的各種事物。所以，罪惡和權力，便擾亂了社會主義之自然社會，而創造土地之私產制度，并且人們的勢力又創造一切動產的私產制度。古代的自然秩序再不能夠維持；一種新秩序便爾產生，其產生也，或顯示，

或隱合于社會契約之中，根據這個基礎，而私產及國家便發生了。這樣爲防止一切爭執及一切暴亂起見，用約束的方法，規制着個人的暴力及罪惡。

中層階級的社會及文化，用這種方法，而得獲存在。牠確實增加了財富，促進了農業，商業，工業，科學，和文藝；然而牠同時却把人類分爲貧富兩個堡壘，創造出偉大的反抗及階級的鬥爭，還且引起貪慾，熱情，自我主義，欺詐，掠奪，和犯罪——總結一句，引起全部份的社會罪惡。所以，一種改革確是必要的，牠要把自然情境之利益（平等及自由）和文化情境之利益（財富之增加，科學及藝術之進步）聯合起來。

斯賓斯以爲這樣的一種改造，要以土地市有化爲之基礎。國家應該經過公共會議之手續，宣佈社會契約之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回復教區的土地制，這樣便可以令到農民繳納相當的地租。從這種地租而來的收入，要用在行政和教育上面。此外，其他租稅，都可豁免。至于他方面呢，工商二業，都因爲沒有絲毫防礙，而可以自由從事經

營。

這些基楚觀念和李嘉圖之地租論聯結起來，便形成土地改革的整個運動之基楚，直到今日。這種運動，自然有各不相同的好幾種趨勢，這祇是關及他們積極計劃的內容，各各不同，所以我們實在不必一一詳細敘述這些趨勢及其領導者，如：鄂楚維（*O'Connell*），比因（*Paine*），多夫（*Dove*）亨利佐治（*Henry George*），及他們的比法德幾國的徒衆。綜合言之，他們所佔的地位，是介于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之中間；他們都是社會自由黨，而且其自由派的臭味比社會主義之臭味更深。但是這種情形是不能夠實施于斯賓的，他抱有一種澈底的忠誠，無產的和言行一致的性格，直到他臨死之時候，他還以嚴重的犧牲和痛苦，來參加一切革命的勞工運動。

(3) 葛德文和無政府社會主義

和斯賓斯同時的威廉葛德文 (William Godwin 一七五六到一八三六年) 是無政府社會主義之創設者，以知識方面言，遠勝于斯賓斯，但以道德之能力言，則遠遜于斯氏了。葛德文原屬于一個不信從國教的神學家，而且在大學之時，和法國的百科全書派 (Encyclopaedists) 的著作，非常親密，其結果便不得不辭退他的僧侶之職務。他為法國革命的第一次大波浪所掀動，寫了一本兩冊的著作，『政治的正義』 (Political Justice)，以一七九三年出版，得了很多人的注意。在這一本很著名的著作中，他企圖表現現存社會制度之罪惡及缺點，而且指陳其原委，更進一步，則陳述社會良好生活之實現，祇有在正義原理之接納及實施，方能達到。『政治的正義』一書，實是從倫理觀點之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分為八卷，其「一以貫之」之基楚觀念，則如下述：人類思想之最有力量的心能，就是理性，理性造成人類之有意的及無意的運動，并且供獻人類行為的直接動機——所以，道德是以理性為基楚的。政治(用古希臘的意義，則政治者實為社會的活動)

爲人類行動所構成，所以，便包含各個個人，人類團體，政府，及其他的道德的及非道德的行動。由此言之，政治實爲一種包含倫理的教義，人類之目的是快樂，良好的知識，良好的體魄，然而快樂祇能從德性，正義，和道德行動之手段，才可以成功。一個人是一個進步的生物，能夠達到最高完美之標準。一切東西，都可以除去那些防止理性得獲真正正義的明顯概念之障礙物，而且令到理性成爲道德行動的驅策力。當理性從外界接收感覺而形成牠的印象時，倘外界和社會生活良好而有正確的秩序，則牠祇能夠接收良好的感覺，而且把牠形成爲正義及道德的知覺和動機。所以我們應該用道德原則爲基礎，而以理性改組我們的社會生活。

一種道德的社會生活之所以不能夠達到的主要防礙物就是私產和政府。『根據無論是粗糙或正確的我們觀念言之，牠會啓發我們，曉得無政府社會的一種單簡形式之結果（自然的或社會主義的），而且又把我們固結于複雜性（這就是私產，國家權力，禮儀，

商業，及其他所流行的地方，）的成見除去。」（卷八，第一章）現在財富之分配法，最爲不良，勞動之報償不公正。多餘和飢餓，專制的權力和自由的缺乏，驕傲和服從——這些都是我們社會生活危險疾病之確實的符號。私產之統治把自私自利，成爲人類行動的最強壯的動機。從這種事實，而罪惡，愚蒙，殘殺，和戰爭，個人的及民族的憎恨，都一併發現，于是一個人便不能夠達到他的快樂之鵠的了。

補救的方法要從經濟的平等之設立找出來，而經濟平等的設立却是私產消滅之結果。然而這種補救法，若用強力壓迫，是不可以實行的。人民之羣衆，祇有用和平之宣傳，令到他們相信無私有財產，無壓制政府之一個社會，並不是不可能的。倘若這種信仰，一經確立，則理性便已有一條清楚的道路，能夠領導人類，達到最高的知識和德性了。將來的社會必不是嚴厲地組織的：個人必有活動之自由：每一個人都接着社會秩序之指揮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七九六年，葛德文和一個女權運動之先驅者，瑪利胡爾斯東加拉夫德(Mary Wo-
lstonecraft)結婚，她是『女權宣言』(Vindication of Woman's Rights)的著者。從這一
對的婚姻，生了一個女兒，名瑪利葛德文(Mary Godwin)，後為空前絕後的最偉大而最
革命的詩人之一，伯士巴斯雪梨(Percy Bysshe Shelley)的妻子。

一七九八年後，葛氏所著的書籍，便不很重要了，而他的生活方式，已經指明墮落
于單調無聊的作家一流去。他的晚年名譽不振了。

(4) 查理士荷爾：階級鬥爭之說明者

在經濟變遷第一期社會批評者之中，最著名的還是醫生查理士荷爾(Charles Hall)
七四〇到一八二〇年)，他在一八〇五年，印刷他的『文明之結果』(The Effects of Civi-
lization)一書，他用統計的方法，證明資本和勞動兩種利益之衝突，永久不能溝通。荷

爾之出發點爲自然律之觀點，古代社會既無私產的制度，又無政治的政府之假設。直至文明時代興起，這兩種制度方才發展，把社會分成兩個階級，貧和富，掠奪和被掠奪，主人和僕從。財富就是權力；牠給財富擁有者以統治貧人之權力；牠把貧人趕到工場和礦坑去，而逼令他們從事于最污穢和最危險的工作。工人造成功價值，然而他們所得的，祇是工資。由于價值和工資之分別間，利潤便生出來了，而利潤是由地主，僱主，和商家所分有的。令到富人能夠從工人勒索一部份勞動生產的手段是資本，而這一部份的財富，就是僱主準備一切生產手段之方式，原料和工資，擺在他們工人之處分之前，令到他們更創造多些的財富來。然而造成資本之財富實是貧苦工人之結果啊。

然則爲什麼工人贊同這樣的一種條件呢？兩方面所訂立之契約是不出于意願的。貧人沒有選擇之可能。他們不得不接受資本擁有主所造成的條件，否則唯有餓死。資本家施行絕對的壓制，而工人則爲絕對的需要所驅策，有產者和無產者，資本家和工人，彼

此直接衝突。

英國工人之平均工資，每年之總數爲二十五磅。而工人羣衆實爲全國人口十分之八。所以一個國家而有一千萬人口，其中有八百萬，屬於工人階級。假如我們暫且假定每一個工人的家庭，有五口人，我們便有一百六十萬個的勞動家庭了。他們的每年收入總數是一百六十萬和二十五磅相乘，等于四千萬磅。然而每年的全國收入，究竟若干呢？大約在一七八〇年，英倫之地租爲二千萬磅。自此以後，還繼續增加，其增加數大概爲一千萬磅；現在呢（一八〇四年），大約是三千萬磅罷。又根據亞當斯密的假設，地租祇表示出生產價值的三分之一。所以，由此算來，生產價值便是九千萬磅了。更根據其他的估計，則說已達到一萬一千二百萬磅。我們再由農業而轉到工業罷。一八〇四年，柏德（Pitt）先生指出出口製造品之價值爲五千萬磅。而國內消費之製造商品，大概比之出口總額，爲二倍或三倍。這個總數便可以表示每年的勞動生產品了。總計起來，

牠們的總額爲三萬一千二百萬磅，然而貧苦的生產者，却祇從中得獲四千萬磅，約爲總數八分之一。十分之八的人口，祇得每年國家收入的八分之一，而其他牠十分之二的人口，却得八分之七。然而前一種人實是財富之生產者啊！

貧人之損害就是富人之利益。文明愈增進，資本家手中所擁有的財富總體愈加多。財富之增加表現于增額的地租，國家欠債之增進，由此更令國家，要倚賴于金融階級；財富之增加又表現于製造品，商店，碼頭，船隻，倉庫，道路，運河，出口貨，和入口貨之增進。然而財富之增加和貧人數目之增加，一同進步，因爲中等階級，在以前的時候，還可以到某程度內，支持他們的生活，比貧窮綫較高，然而現在不成了，他們要墮落貧窮綫下了。不過貧者固然愈陷愈深，而且財富增加，富者之要求和他們對於精製品及奢侈品的對象之需要，也一同增加，這樣便令到工作更爲緊張，工作的時間，更爲延長了。于是反抗之情勢，更加尖銳，甚至人們還恐怕貧人到底必爲解放之企圖，他們

必用武力，把自己從壓制之重負之下，超脫出來。而這種企圖之報復，則爲富者之壓制手段。這種內戰，引生武力化之國家，其甚者，則爲軍閥之統治。

而且，富人已準備着燃點戰爭之火炬。戰爭之對象是商工二業或領土之擴張，否則就是復仇之行動。一切工商業國家之富人，都爲着外邦所產生的原料和奢侈品的追求而競爭，其結果自會領導出戰爭這一種事情來，戰爭對於貧人，完全無益，而對於富人則常常以爲是爲人民之利益而後戰爭的。富者貪圖有更多的榨取，他們便不得不征服牠國人民，因爲這一個原因，流血的衝突又發生了。富人之驕傲及激怒的性質，令到他們武裝起來，捍衛所謂國家之光榮，反抗異國的仇敵。然而隨處隨時，戰爭之重担，總壓在貧民身上。富人當攻擊他國國民的問題到來之時候，其解答是非常迅速的。而且，富人對於戰爭，還有其他的動機。當富人看見貧人躍躍欲動，要求他們的權利，企圖改進他們的地位之時，某一種國際之戰爭便起來了，于是貧人便不得被驅策而互相殘殺。我

們以前七年和法國的戰爭，就是發生于上述的動機的。(註一)當時法國人民起來，要設立政治之平等，和完成各種經濟之改良，一切國家的統治階級和金權階級，無不失魂喪魄地恐懼。他們怕這種革命，會由法國蔓延全個歐洲，假若法國不能夠克勝他們的努力，全歐前途，不堪設想。爲避免這種驟然之事故，富人便釀成反對法蘭西之戰爭，強制一切貧人，忘棄一切改良他們地位的機會。真令人反想到這樣事情，便傷心不已。貧者的希望完全擲碎于地上，然而還要負擔這種可怖的冒險之重責。富人充份驕得戰爭之用處，所以對於在學校的兒童，都努力灌輸以戰爭的精神。歷史教科書內充滿着戰爭的故事。牠們描寫戰爭，以爲是光榮，聰慧，和高尙的事情；牠們崇拜英雄及英雄行動，這就是血戰之勇士，流血之噴射，和屠殺之行動。然而牠們却十分小心地，避免描述由戰爭所得來的可怖之佈景；例如殘肢斷體，令人心傷的負傷者之呻吟，堆積如山之尸體，和過于擁擠之病院。不顧一切理性，不顧一切人性之感情，把戰爭之憤怒散佈于各

國民之間，這真是一種令人畏懼的勢力。這種勢力就是財富，資本，而財富及資本是由原始平等毀滅後而發生的。固然野蠻人也間有所謂戰爭，然而其原因，或由于活必需品之欠缺，或由于不曉得農耕的方法，以滿足部落中一切份子之需要。然而在文化時候，戰爭却是追求奢侈品，追求過剩品及無用物之一種結果，牠祇令到貧人之壓制，逐漸增加。而且我們確實曉得，倘若人民能夠統制經濟生活，決定戰爭和平的決議，則今日是不會有戰爭的。

以上的陳述都是在一百二十年前所寫的！

（註一）荷爾所指的是英國反對法國革命之戰爭。

荷爾在批評方面，非常尖銳，而在建設方面，他却抱着不冷不熱的微溫和躊躇不決的猶豫的態度。他的計劃，如下所述：土地國有，復回到手工藝工業，一種單簡的生活樣式，消滅奢侈。

稍後一點，我們還要討論工業革命第二期的英國社會批評家。現在讓我們轉而注意于法德二國的同樣的發展，由是而指出幾個超等的文化國家，在十八世紀轉到十九世紀的變遷中之社會批評的性質。

第二章 法蘭西經濟變遷之嘗試

(1) 由保護到自由

從十七世紀之初期，法國政治家已經努力于促進國家的工業生活，確定製造的品物。因為這種發議，由于政府，由于國家之長官，所以這些努力却含有官僚化和規制化的性質。固然製造業，從政府方面，收受有偉大的幫助，不過牠同時却要屈服于貿易，運輸，物品之生產及分配的嚴厲規制之下。生產之全部過程由警察官所限定和監督，并且無論如何，不准離開長官之指令。為亨利四世（一五八九到一六一〇年）所設立之工業製造，不久歸于頹廢，直到十七世紀之最後二十五年——在財政總長科爾伯特（Colbert）

Colbert, 一六一九到一六八三年) 的富有能幹之指導下——工業製造方才復起，但在路易十四世的侵略的戰爭中，却被廢棄了。

大概在十八世紀中葉，國家之工業活動又再覺醒起來，更有活動之生命；本地的工場設立了，比較偉大的工業中心和工作都增進了：例如克利梭德 (Creusot)，法國東部之鎔爐事業，法爾曼尼 (Firminy)，和聖愛登 (Saint Etienne)。絲業和紡織業盛行于加爾加森 (Carcassonne)，里昂 (Lyons)，魯貝克司 (Roubaix)，阿貝菲爾 (Abbeville)。巴黎，赫佛 (Heave)，魯安 (Rnoen)，和林莫高司 (Limoges) 等地，都成爲製造業之中心。大抵在一七六〇年，法國工業產品之價值，爲九億三千萬佛郎。自然科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和著作家，開始活潑地注意到一切工業的經營。發明之精神也鼓舞起來了。(註)

(註) Germain Martin, *Les Grandes industries en France* (一七一五到一七七四年)。巴黎，一九

自此以後，各個都市都努力爲自由和政治的權力而奮鬥了；農民呢，則努力于消滅封建之重担，和屬於教會及貴族的土地之瓜分。

在這種氛圍之中，自然有好幾個社會批評家之興起，他們之觀念，我們已在本書的前一卷中討論過了。

不單獨社會之批評，就連政治經濟學之全部教義，也爲經濟變遷的知識反動所刺激和推進。牠的文字之代表者，無論是生于宮庭之中（如 Francois Quesnay 博士，一六九四到一七四四年），或屬於貴族階級（如 Mirabeau 侯爵，法國革命大演說家之父親），又或屬於高級之官長（如 Mercier de la Riviere）——他們或者很容易趨向于愛護農耕，或則不和工商制度直接接觸，他們創造起一種經濟制度，一方面對於農業，評價過高，負擔過重，而牠方面却賤視工業，然而仍是贊助資本主義之勝利，擁護絕對主義，而埋沒

國家之基礎。當時的法國正有着一種充滿矛盾的兼收并蓄之制度。我們下面討論重農主義(Physiocracy)罷。

(2)重農學派：經濟的自由：放任，自由

重農學派為十八世紀中葉後的法國所造成，牠的制度，完全是中產階級，我們現在所提及的，祇以這一派對於經濟生活和法國革命之影響有關的為止。

這一種學派包含有兩種主要觀念：(1)有一種經濟生活的自然秩序，(2)祇有土地，自然物質(物質，希臘語為『Physis』，重農學派之名稱由此)之栽培，才是生產的，換言之，才能夠創造出比之要支出勞動費用更多之價值；祇有農耕才可以創造出丰餘(Product net)，而因為這種豐餘及過多之價值，方可以支持社會。現在讓我們更詳細地來考察這兩個要點罷：(1)重農派以為社會有一種自然秩序，規制着經濟生活，而且後

來，竟不要國家加以干涉及規制了。這種自然秩序的基礎就是財產，安甯，和自由。重農派以這三種東西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人類權利，而專制獨夫之功用，就是保護這些權利。很清楚見出，重農派之所謂自然秩序完全和古代的自然律不同，而古代的自然律，唯有社會主義者及社會批評家才援引的。重農派是中層階級秩序之擁護者，主張私有財產爲一切權利中之最自然者，倘若牠和經濟之自由相連結，則可以確證國家之繁榮了。

所以最良好的政策，就是：放任，自由 (*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換一句說，給有產業者，僱主，和商家，有充份行動之自由。因爲個人之利益和團體之利益相一致。世界順着牠自己的規則進行，何需國家之干涉！(2)當勞動與自然關連的時候，勞動才是生產力。從牠方面言，商業和工業，都不是生產的；牠們的活動，祇在于把價值，加以變形或交換而已。社會所包含的，有三種階級：(A)生產的(從事農耕者)，(B)統治的(土地之主人和高級之國家官吏)，(C)不生產的(如商人，從事工業的人，自由職業

者，及服務者）。因為農耕才是生產的，所以牠應該是唯一的納稅者；其他的一切階級，都應豁免租稅。

重農學者雖然把農耕和專制君王制度，提到極高的地位，但我們很容易見出他們實是英國資產階級的不自覺之代言人，到後來，他們意識到他們的階級地位和權力了：這就是私有財產，所有權之確立，工商業之自由，和個人主義。這是重農學派正當的理論成功；他們影響亞當斯密；他們同時也為人們稱作經濟學者。從牠方面言，他們的矛盾點，不久便經過法國革命，而得獲解決了；因為革命的資產階級以盧騷的政治自由之觀念為贊助，消滅絕對的專制主義，和擁有土地之貴族。

從社會主義之自然律，資產階級借得有自由和平等之觀念，以反對王政及貴族，他們又從重農派的自然秩序說，借得有經濟之自由和私產的不可侵犯性，以反對社會改造家及社會主義者。

第四章 法國革命

(1) 各種階級與憲法之衝突

路易十四世及路易十五世和英奧二國之戰爭（西班牙承繼問題之戰爭），和普魯士之「七年戰爭」，及英國（加拿大，印度）之戰爭，時期既長，災禍又大，其結果便令全國負債務之重責，又因宮庭之浪費，君王寵妾之貪婪，與于不良的財政管理，把國家清償債項之能力，加以摧毀，而祇要求民衆之更偉大的納稅之能力。國家短少收入，逐漸厲害，苟非得資產階級之幫忙，決不能持久。路易十六世（一七七四到一七九三年）在位之時，正當這種財政困難之境遇，後來在一七八九年，不得不召集王國中之幾個階級

(Estates of the Realm，內包含貴族，教士，及市民三個階級——譯註)，共同會議。五月五日，他們會集于凡爾賽宮，在三個星期之內，以第三階級（即市民，亦即資產階級——譯註）及其知識的代言者為當時情境之支配者。他們把上面述過的那一個「三階級聯合會議」，變而為『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其功效則在以一种憲法給與法國全體國民，換一句說，把一種政治表現交給于國家中一種利益及權力的新階級手上。

革命開始了。舊式秩序，經被推倒；民衆四處暴動；破毀巴士的獄 (Bastille)，強制國民會議遷到巴黎。自一七四〇年後所造成的觀念之全世界，都加入而贊助這一種爭鬥。就一般的情形觀之，則個人行動的直接動機祇是本能，熱情，和個人利益。然在他方面觀之，則在政治羣衆行動之事件中，其先必加以駁難及討論，於是本能和個人利益，首先便變而為觀念，思想，原理，和理論，把整個行動，加入于更高尚，更華貴，更道德，和更一般地人本的性質之內。然而倘若仍為一種階級鬥爭之問題，則最強有力

的階級勝利之利益，最後便蓋過于一般原理之上了。

國民會議用了兩年時間，討論憲法。同時，國家也加以改組，教會財產，盡被沒收，行使新紙幣，于是而發現革命的發財者，土地和市場的投機家。偉大的革命觀念充斥全國人之腦中，而偉大的利益則充斥于資產階級的富人之荷包中。一七九一年憲法，誠誠實實地反映出這些情形。牠的開始是「人權」之規定；一切男子，自由平等，社會之目的在維持這種不可讓渡的人權。這種高尚莊嚴的原理之後，便規定人權之細目——自由，財產，安甯。

其基楚原理是由社會主義自然律引伸來的。但其補充的原理則是中層階級的重農學派之教義。

後來，選用了純粹的資產政治標準了：一七九一年之憲法，自宣佈一切人類自由平等之後，却又把人類分為自動的及被動的兩種市民，前者才有選舉權，而且選舉採間接

制，於是富人才能夠成爲候選人。以前爲君王專制所規定的，現在却變爲憲法之規定。

不用說，下層階級，如民主黨人，共和黨人，和社會改良之熱心者，都不滿意於這樣的一種憲法。

一七九一年九月，憲法通過之後，國民會議之工作便完畢了。繼之者爲「立法會議」(Legislative Assembly)，其組成爲新的人物，內含有大多數中層階級的民主黨及共和黨徒，他們在巴黎的羣衆，饑饉之增加，和外來之危險——幾種壓迫之下，不得不要求一種勇敢的政策。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之革命份子，把革命之權力，奪在手中，把王室的份子，囚禁起來。羣衆之興起，便開始革命之第二個階段——革命史中最重要之階段。但在戰鬥員之間，却發生一種裂痕；所以在資產階級及手工人或工人羣衆之間，有一條大的洪溝。一方面是左派的共和黨人，社會改良家及無產的革命者；而他方面則爲溫和的共和黨人，憲法統治者，和繁榮的市民。因爲貧乏增加的結果，社會問

題，更成重要，雖然牠的重要點尙未爲領袖的耶可賓黨 (Jacobins，是左派的共和黨，和純粹的政治民主黨) 人所了解。現在，各種社會改良之計劃及方案，已開始在勞動團體之中加以討論。因爲糧食之欠缺，物價之騰貴，國家財產 (被沒收之教會財產) 之浪費，便令到人們注意於土地之改革，國家對於糧食價格，應該規定，而最後，還注意於社會主義之觀念來。

革命力量之分化增強了反革命及其外邦同盟之勢力。當立法會議不能夠努力以反抗這些份子之時，在一七九二年九月便不得不解散，而以『國民大會』 (National Convention) 爲之替代，國民大會中，一切成年的法國人都有平等的選舉權。於是法國宣佈爲一個共和國，國王先被定罪，後遭殺戮。以偉大的努力，抗拒歐洲反革命同盟軍之繼續壓迫，然而無論何種攻擊私產的社會主義理論，仍被排斥。一七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國民大會決議，一切以消滅財產制度爲目的的煽動者，都要受死刑之處分。一七九三年五

月三十一日，巴黎人民又暴動起來，同年八月十日，國民大會應許他們，制定一種新憲法——純粹民主主義的新憲法：牠是政治的民主主義之完滿表現。然而財產仍是不可侵犯的。對於革命羣衆的各種熱情最爲深識的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在憲法草案中，曾企圖加入一條關於財產的款目，其措詞是社會主義者所能夠接納的，「財產就是每一個人可以享受法律確定屬於他自己的那一部份物品之權利」但羅氏對於自己的草案之選用，却沒有什麼積極之努力。然而一七九三年八月的憲法，並沒有實行，其理由將於下一章敘述。從一七九三年十月至一七九四年七月，國家事務由於一個革命的政府或革命的獨裁制度所管理，牠有絕對之權力；徵集軍隊，反抗歐洲的反動勢力，規定糧食之最低價格，改組高級的教育系統，施行密達式（Metric）的度量衡法，但同時也壓制共和主義反對黨之右派但頓（Danton）和左派赫伯特（Herbert）及激烈的社會改革家。羅伯斯比爾及其徒黨爲外憂內患所煩擾，不得不托庇於『恐怖政策』，爲這種政策之主要犧牲者，却

是革命的工人和知識階級。

羅氏爲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形態所迷困，自己掘下了自己的墳墓，同時又掘下了革命的墳墓，他把最努力最前驅的社會改革份子，放到斷頭台上去。當他的破壞工作已經完成，他在一七九四年七月也被打倒，還且被人砍了首級。於是小資產階級獨裁制解體，代與者爲執政的制度，這種制度開始了反革命的工作，把巴黎的革命份子，解除武裝，創造出一七九五年時代的憲法，其基礎，採取限制的選舉制度，而大規模的教會財產之耗廢及股票市場之掠奪的時代開始了。

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五年是非常重要的，其理由凡三：（1）牠們見出一種革命的獨裁制度；（2）社會改良運動之興起；（3）牠們是巴卑夫謀叛之原因。我們輪着次序來把牠們逐一討論罷。

(2) 革命的燭裁制度

上面已經說過一七九三年八月的憲法，並未實行。牠是故意地加以保留，其目的在於和平之後，方才置於實用。由是便以獨裁制度替代憲法。這個原因在波拿洛第 (Bonaparte) 關於巴卑夫謀叛的著作中，告訴給我們。

波拿洛第是一個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和領袖的耶可賓黨的友人，思想崇高，道德清潔，他告訴給我們，這種民主主義憲法之制定者。好些都有一種意見，以為社會改造，無論怎樣重要，假使不先之以道德和經濟之變革，則人民快樂之保證，是不能夠的。他們更以為政治民主主義自身，祇為富人之利益。『假若情形仍像現在一樣，則最自由的政治憲法祇是那些不須工作的人們的利益。假若民衆，仍然為着必須手段的原因，不得不担任繁重而繼續不斷的勞苦，而且不能夠得獲政治事務之訓導，因為他們

的生活，要倚靠於富人，則祇有富人才能決定那些名爲民衆所取得的欺詐的政府形式。」（見波拿洛第『平等黨之謀叛』）雖然羅伯斯比爾及其徒黨，沒有按照着波拿洛第的意義而造成一種形式的社會，他們祇相信他們可以應用道德之一種改良和利己主義之一種壓制，或像羅伯斯比爾所說：「我們想把道德代替利己主義，法律的正義代替貴族政治之榮耀，理性之統制代替風尚之專制，精神之高尙代替浮華。」他以爲這種目的，可以由演說，「自由宗教」的說教，及警察之規制，便可成功。非達到那一個時候之前，民主主義仍要留中不發。所以獨裁制度並不是民主主義原理之一種否認；牠實是企圖創造精神之境和思想之條件，這樣牠才能夠爲民衆利益之原故，而把民主主義措於實施。可惜羅伯斯比爾見不到——因爲他是一個反社會主義者，所以他不能夠看到——這樣的一種心能是不能夠由觀念形態之手段產生出來的。他深信理性之萬能，但沒有曉得我們知識生活之趨勢及內容，尤其是羣衆心理學，在一個極大的限度上，實是社會環境

之結果，而且獨裁制度之主要工作，應該是徐徐引導到符合一致的社會及教育之改造。羅伯斯比爾並不如此，他却把多數的社會改造家的運動者及工人，砍下了頭顱，以維持他的獨裁制度。這種悲劇的程序仍報復到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獨裁者身上。一七九四年之開始，羅伯斯比爾之勢力已經成爲無意識地反革命了，恰像每一種溫和的社會改造團體一樣，就在今日一切民主主義革命之樞機中，還無異致，殺戮左派的革命份子，由此而準備着反革命之路向。這真是一種可怖的歷史教訓。

我們現在再回復而討論獨裁制的問題，這種制度，非等到一七九五到一七九六年，平等黨（巴卑夫及其黨徒）之謀叛時，還未把牠自身表現於一個尖銳的形式。

(3) 一七九三年之憲法及社會批評

一七九三年，這些和思想的社會改造方式相習熟的革命份子，都曉得這種鬥爭之

中，包含有貧富之衝突，有產和無產之衝突。波拿洛第和革命之領袖及羣衆，都有深切之關係，他對於這一點，有如下的指陳：『我的意見，以爲法國共和創造的直接貢獻是現存爭論之暴發，這種爭論，一方面是財富及特權的擁護者，他方面却是平等黨之友人，工人之多數階級。』自然，富人及特權階級對於一七九三年的憲法，其態度是仇視的。他們否認政治平等之見解。而在牠方面，則在平等黨（或稱社會主義者及社會改造者）之友人中，却又分爲好幾種意見。巴卑夫，波拿洛第，及其友好，確然承認民主主義法是有缺點的。因爲牠宣佈財產有不可侵犯之性質。然而他們仍以爲政治的民主主義實是經濟平等成功之良好手段。而從民主主義到社會改造，其間必有一個過渡時期，是爲獨裁專政。上述的幾個革命者因此都贊助羅伯斯比爾和民主主義之憲法。但是還有一種左派，以羅克司（Abbe Jacques Roux）及赫巴德黨爲代表，他們的最後目的，在於財產關係之革命，他警告人民，勿墮於幻覺之中，慎防民主主義者之欺騙，就連羅伯斯

比爾，聖格斯德 (Gautier) 及其他，都是要提防的。他們之攻擊憲法，在於牠反對羣衆之性質，牠容許因戰爭而發財的人，土地投機者及交易投機者，和壟斷者都毫無感動地做去。羅克司說道：『倘若一個階級可以令別個階級餓死，倘若富人以其專利權可以統治貧人之生死，那就自由祇是一種幻想而已。又倘若反革命表現於糧食價格之繼續增長之中，有四份之三的市民，流出眼淚，仍不能夠得獲糧食，那就共和除了是一個空想之外，還有什麼東西。不消滅了壟斷的人之手段，我們是不能夠得獲『無褲黨』(Sans-culottes，當時過激派之賤稱——譯譯) 的革命和憲法之贊助的。國內的富者對於貧者之戰爭實比之外國對於法國之戰爭，更爲可怕。資產階級在革命四年期中，愈增加他們自己的富有；比之土地的貴族還更壞的就是一種新的商業貴族，他們壓迫我們，強令物價，高上加高，而且沒有人能夠看見這種過程，究竟會達到那一個地步。難道一個騙子之財產比之一個人的生命還更神聖嗎？』

羅克司表現出一個正直民衆的深沉的憤慨，一個勇敢的社會主義者的憤慨。然而波拿洛第及巴卑夫所採取的態度是不更正當的麼？假若一切有革命思想的人，聯合起來，站在前列，贊助羅伯斯比爾的民主主義和獨裁制度，同時却又超過他的前頭，把社會改造的要點教訓民衆，這樣做不更好嗎？羅伯斯比爾仍舊需要羣衆，以保護他自己而反抗吉洛地黨（Gironde 法國的和平共和派）人；所以假若勞動羣衆，不反對他，而且跟着他走，他會不得不讓步，而從事于社會改造的。

上述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還未曾得有一個現成的答案的。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六年法國革命之最良好的領袖是不同意於這些解答的。

(4) 郎格及多利維耳

法國革命初年，在里昂有一個匆忙的著作家，寫作各種社會及經濟的問題，他自稱

爲「郎格」(L'Ange)。法國史家朱立斯米次立德(Jules Michellet)以郎格爲傅立葉(Fourier)的精神上之父親。這個像啞謎一樣神祕的郎格，經過了五十年間，才有少許事情，發現探索的光燄。有一個名朱利西(Jauries)者，發現他是德國人，名叫郎格，生於加爾(Kahl)，而受教育於曼斯德(Munster)，他才十六歲便跑到巴黎，一七九三年，他在里昂爲一個市政官吏。朱利西研究郎格之著作，告訴給我們，說道：一七九〇年，郎格印刷他的小冊子，在書中，他描寫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他自己呢，却屬於激烈的改造派，他以爲該憲法是充滿着矛盾的，以人權之描述開始，這是一般地可以實行的，然而牠繼續着便把市民分爲自動的和被動的兩個範疇。財產擁有者，他名之爲自動市民，而工人則爲被動的，然而實際上，祇有後者方能製造財富。富者之財產並不是什麼，祇是他們把工人榨取出來的剩餘而已。(而在今日，則我們稱爲剩餘價值。)郎格希望人道主義者之偉大友人及君王之贊助。他別一種著作的主題是農耕聯合會社組織之設計，他

以爲這樣便可以解決糧食之缺乏，而且可以禁止壟斷者之活動。這種設計會深深地給傅立葉以印象，當時他正在里昂爲一個商人的助手。傅立葉並未提過郎格，但在他的書『四種運動』(Quatre Mouvements, 一八〇八年)之序言中，他承認他的全部著作，淵源於一個農耕會社的設計之內。郎格之主要觀念，如下所述：穀類之總價值不能高過於工人之總收入；所以，每一個工人便可以以其工資而得獲生活；然而現在却不如此，這應歸咎於壟斷家。至於補救之方法，武力是不能夠奏效的。唯一的補救要把全法國，都施行農耕社會之一種網狀組織。每一百家要成立一個會社。各個會社之設立，都以合股組織爲基楚，而國家則由於一種貸金的手續而成爲股份者。合作生產和消費者會社之利益會證明是很顯著的，令到富人也一同參加於其內。

還有別一個改造者是牧師比爾多利維耳(Pierre Dolivier)他主張土地之改革。他的批評觀念很像斯賓斯。他的積極建議是：消滅承襲權，把大地產平均分給農人。他的書

印刷於一七九四年，其名稱則爲原始正義論 (Essai Sur la Justice primitive)。

第五章 巴卑夫及其徒黨之謀叛

(1) 原因及目的

羅伯斯比爾在一七九四年七月之末失敗了，國民大會之統治權，歸入于反革命之份子手內，其後還採用一七九五年反民主主義的憲法，這樣祇能夠把一切社會改革者及耶可賓派等仍舊忠于革命的人，聯結起來，反抗當時之執政。這兩派革命份子合作起來；在和平討論之時，耶可賓派深信除非有經濟之變形，則民主主義是不可能的，所以政治之革命，應該要古式財產關係之消滅，土地共產之組織，一般人有勞動之義務，和社會上之平等——這些爲之補充。要有一種德性而純朴的生活方式，把青年人加以教訓，使

成爲有用之市民，利己之主義和權力之慾望，應該搗碎——這些都是凝成新社會之基礎的，而且令到法國成爲一切民族之模範。雖然這種謀叛之計劃附以巴卑夫（註一）之名義，但巴卑夫並不是牠的知識創造者和領袖人。他祇是牠的公共代言人和著作作者罷了。這種運動之最正確的創設人，實是波拿洛第。

（註一）法蘭西斯諾爾巴卑夫（François Noël Babeuf）是一個土地改革論者，他採取一個羅馬名，革拉古（Gracchus），生于一七六四年，自由修而得獲廣博之知識。他以口舌及文字，服務于法國革命，他主張『護民官』（Tribune du peuple）制度之民主主義及土地改革，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以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殉難者而死。

（2） 腓立普波拿洛第及革命的獨裁制度

我們要討論當時一個最偉大的人。他知識豐富，但性格之特質更爲豐富。他可以被

稱爲一個社會革命的法蘭西斯亞西斯（Francis d'Assisi）。他的書名爲「合法之謀叛」（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 1818年Brussels版），就是描寫當時的謀叛的。他用一種迷人的文體而著作，所以便沒有譯能夠把牠轉述出來。波拿洛第由於一個意大利家族誕生出來，而這個家族是會把偉大的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意大利之大美術家，一四七五到一五六四年——註者）供獻給世界的。他在一七六〇年，生於比撒（Pisa）他狠年青，便擢升而爲高級之長官，但在法國革命開始的時候，他把官職丟去了。最初他在哥撒加（Corsica 1790年到1791年）活動，在那裏青年的拿破倫便和他親密，把他當爲一個可欽羨的友人，後來他走到巴黎，巴黎的國民大會委托以各種使命。他成爲羅伯斯比爾的密友，而且由大會接納，認爲有法國公民之權利。巴卑夫的意見常常是變遷的，但波拿洛第並不如此，他的觀點是始終一致的，他以爲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二年的法國革命之目的祇是確立憲法政制及中產階級反對地主的政府，自一七九二年之後，

又進一步了，有產和無產兩個階級，面對面地鬥爭起來，所以從社會觀點看來，一七九三年之憲法是確有缺點的，但牠的民主主義之準備，却未可厚非，牠能幫助無產者戰鬥之力量，雖然他們是受過社會主義之教訓的。羅伯斯比爾一失敗之後，波拿洛第便建設了『龐第安同盟』(Union of the Pantheon)，這是由同盟會議的地點而得名的，其進展非常之速，一七九六年，有一萬七千人，即在巴黎衛兵之中，也得了很多徒黨。

同盟之首領是波拿洛第。他把有能幹思想的人，集合起來，結合成一個祕密的執行委員會，準備一旦爆發，傾覆當時的執政政體，消滅一七九五年之憲法。執行委員會所最注意的是這樣的一個問題：當執政制度傾覆之時，應該採用那一種政體。他們也一致贊同，一七九三年之憲法是不能夠馬上施行的。關於這一點，波拿洛第如下述說出來：

『法國革命之經驗，尤其是國民大會之解體和失敗，確然指示出一種民族，若其意見經在不平等及暴君之統治下形成了之後，他們是極難加以整理的，在一個革命的改造

時間中，他們極難能夠選出多少人，以担当領導及完成革命之工作的。這種艱難的工作，祇能夠付給那些一時聰慧，勇敢，愛國，和仁愛者之手，他們已用很長久之研究，以探討社會罪惡之成因，而且解放他們，脫離成見和普通罪惡之統治，他們的知識，超邁同儕，他們輕蔑金錢和一般榮譽，他在確定平等之勝利而找得他們之快樂。或者在一種政治革命之開始時，在尊敬真正的民主主義之外，必須少注意于投票的制度，而把絕對的努力，交給于聰明而強有力的革命家手裏。」

經過官長之討論後，一切關於獨裁制度之利益及缺點都經過詳細之攷慮，于是執行委員會最終，即加以一個結論，以為在消滅專制暴政之後，巴黎及各部份之叛亂者，應該成立一個國民會議，授國民會議以最高權力。然而祕密的執行委員會仍舊留存，以攷慮候選者之資格，並且監察新的國民會議之行動。

在這些觀念和攷慮之中，建設了革命獨裁制的意見之基礎了。

(3) 謀叛之結果

在謀叛的祕密代表者之中，有一個爲紀里塞爾大佐 (Capitan Grisel)，他把全盤密謀，通告執政。軍政部長加爾諾 (Carnot) 訓令青年的將官，邦拿柏脫的拿破侖 (Napoleon Bonaparte)，解散庇第安同盟，還要拿捕其首領。一七九六年二月之末，他便解散同盟；五月十日捕獲各個領袖。審訊之時期，非常之長，至用了十一個月。執政者怕巴黎的勞工羣衆的一部份有不法之舉動，便把犯人移送于凡多姆 (Vendôme) 城。在那裏設立一個法庭，把巴卑夫及多爾德 (Darthe) 獻定死罪，而波拿洛夫及其他領袖，則宣告流放，其時爲五月二十六日。巴卑夫及多爾德馬上便企圖結果了他們自己的生命，以短劍自刺，但被兵士所禁制，不能達到目的，就而他們的鮮血，四處噴流，卒爲他人牽出法庭，在第二日，死于斷頭台上。

至于那一個背黨求榮的紀里塞爾，後來爲巴卑夫長子嘉彌爾 (Canillo) 所槍殺。

波拿洛爾仍囚于查爾堡 (Charbourg) 的監獄中，那時，他的往日的欽慕者及青年的友人拿破侖，已經成爲法國的第一個執政官 (First Consul)，而且是實際上之統治者了，他獻議給波拿洛第以高位，時爲一八〇一年。但波拿洛第狼輕蔑地拒絕之。一八〇七年，他才得獲自由，住于法國之西南邊境，在那裏他又和意大利之革命家相聯合；後來他定居于瑞士，他以教授音樂及語言，狠節儉地生活去；但卒爲瑞士政府驅逐，他又走到不列塞爾 (Brissels)，于一八二八年，他印刷了他關於巴卑夫及其徒黨之謀叛及審訊一書。這一本書，在一八二八至一八四〇年間，對於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有一種極有力的影響。自一八三〇年之七月革命後，波拿洛第回到巴黎，當時之革命運動尊爲一個聖者。他的門生之一，即爲奧格斯德白蘭格 (August Blanqui)。一八三四年，警察又試圖驅逐他出境，但國民大會授以公民權，保護這一個高年的貴人，免于驅逐。自此以

後，他用雷門德（Raymond）之假名，居于巴黎，教授音樂，一八三七年，過世了。

第六章 德意志之反動

(I) 經濟的復興和政治的壓迫

在十八世紀之初年，「三十年戰爭」之蹂躪，在全個德意志之都市和鄉村中，都仍然可以痛苦地顯示出來。德國中部及南部之一切鄉村，全成荒廢；狼多都市，幾乎沒有了人烟；商業知工業似乎都趨于崩敗；祇有漢堡(Hamburg)和來布色(Leipzig)還有點商業精神之活躍；這兩個都市——並不是多數的世俗和精神貴族之宮廷——在國家生命之沙漠中，是沃土了。當時貴族之驕橫，地主之貪慾，長官之追求權勢及拘泥，于是飽嘗痛苦之德意志民族，便很難醫好他們的創傷，他們的負擔增加，他們復興之過程，發

生阻礙。非過了十八世紀之中葉後情形並未見改良。英法工業之革命，英荷農業之繁榮，法之啓蒙文學運動，及其政治經濟之提升，達到一個榮譽的地位——這些一切，都誠誠實實。反影到德意志之物質及知識。一部份由于政府之幫忙，尤其是大腓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他和西歐文化是狼習熟的，一部份則由德意志農人，工人，和商人階級獨創性之重新恢復，經濟生活之復蘇；採用新生產方法，麻布絲綢製造增加，而農業開始應用新的栽培方法。在十八世紀之末葉，農業聯合會及雜誌經已發現了。

（如不列斯拉爾經濟學報 *Breslauer Oekonomische Nachrichten*，柏林土地農作學報 *Berliner Landwirtschaftsbibliothek*，園執什誌 *Journal fuer Gartenkunst*，還有一種名經濟百科辭書 *Oekonom Enzyklopaedie*）

在漢堡，有一個促進藝術和實用工業的會社發現。牠的港口已經有繁盛國家的船隻來往，特別一七七六年美國宣佈獨立之後，因為要避免英國之港口，于是美國人都找着

了德國港口灣泊。每年大概有二千號船隻，出入于漢堡港，而其中祇有一百五六十隻是漢堡的；漢堡同時又發展一種航海保險的商業，所發出之保險單，達到由一千萬到二千萬磅。

麻布製造業之基楚地是西利西亞 (Silesia)，奧伯羅西茲 (Oberlausitz)，巴利非爾德 (Bielefeld)，及奧斯那伯勒克 (Osnabrueck) 和緬頓 (Minden) 兩個區域。德國麻布出口每年大概為二千萬德拉爾，以英金伸之，約為三百萬磅。

更為有趣的是由莫西爾 (Justus Moser) 所寫出的指示。他陳述 (一七六九年) 德國手工業工場制度之競爭而墮落。他說道：「罪惡是不能夠消弭的，或者富人應該成爲手工。像好些地方的金銀匠，製帽和製襪者，都居于王宮，享受一切由經驗，研究，虛飾，和財富所能夠頒給的利益：假若一個帽工的主人或一個襪工的主人，他的技巧像前者一樣，爲什麼他不應該達到同樣的令名呢。」(註一)

(註一)見莫西爾的 *Auswahl aus Seinem Schriften* 一九一四年版，四十四頁以下，六十五頁以下。

同時由科司德 (Georg Foster 一七九〇年) 之敘述中，也暗示出阿珍 (Aachen) 和普爾斯查 (Burscheid) 的工場制度：「新教之壓迫和憎恨，就是「爲什麼在阿珍之外發現很多工場」這一個理由。普爾斯查地方有好幾個溫泉，其地有偉大的製衣工場及編織工場。……華爾斯 (Vals)，也是一樣。我一聽到提及愛爾伯非爾德 (Elberfeld)，華爾斯，和斯美爾那 (Smyrna) 的名字，我是如何的快樂呢。衣服之在這裏做好的，運到德利斯德 (Trieste) 和威尼斯，還運到土耳其。其實地是非常良好的，牠祇用西班牙之最好質地的羊毛。……」(註一)

(註一)見科司德之 *Briefe und Tagebucher*，十七頁，一三九頁。

西利西亞之礦產及鑛解業也進步了；每年的一切做成功的物品，其價值爲以十二乘一千四百萬德拉爾，以英金計之，大約是二百萬磅。

大約在一七八〇年，撒遜尼(Saxony)出產了八十四萬對襪子和手套。來布色之全年買賣總額是一千八百萬德拉爾。(約合英金二百五十萬磅)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十八世紀之末葉和德國經濟生活之積極的能力及推進之一種恢復，是符合一致的。(註一)而這種經濟的經營及創造的活動，適和表示着一種進步的及自由的精神之文學，神學，及哲學中知識能力的暴發相對當。但政治之退步，壓迫，而且小王族和貴族，對於人民，還要他們服奴隸之役，這些事情，都由他們的詩人和思想家所痛楚地感覺着了。當時一個最聰慧而最有教化的政治思想家威蘭德(Ch. M. Wieland)在 *Goldenen Spiegel* 一書中，曾表現出這種情感，他說道：『在小專制的君王眼中，人民沒有權利，王族沒有責任。而王族之對付人民，祇以為是一羣活動之機械，祇為他而工作，却無權而休息，供給，和快樂。這樣的一種不自然的思想方式，真是很難想像的，而最確實之事情，則莫過于王族自視為一種較高的生物，……以行使自然所存

在于其中的任性行爲，他們無論怎樣做，一切都祇得准許牠，也沒有人能夠向他們提出要求。臣下之順從，非常利害，在特殊情境之中，他們稍爲得獲人類應有之權，這便當爲一種不應得的恩典了。」這種悽慘圖畫的表現，確是實情，並不過爲渲染，威蘭德或者腦中先有了德意志南部之情形，然而就在大腓特烈管理下之普魯士，少許直言無隱的政治批評是不能夠的。勇敢的來辛 (Lessing) 曾把關於這一點的事情，寫給尼古來 (Nicolaï)，說道：「讓每一個柏林人企圖在貴族宮庭之前，說出真理罷，讓每一個柏林人企圖提起他的聲音，爲臣下的權利之原故，而反對聚斂和專制，像現在的法國人和丹麥人，一樣做作罷，爾會很快便見出現代歐洲的一個最奴隸的國家了。」

(註一) 見 Biedermann 之 *Deutschland im 18. Jahrhundert* 第一卷，及 Jaurès 之 *La Convention* 第

一卷。

由于這些經濟努力和政治壓迫之衝突德國古典文學便引生一種極大部份的能力。然

而牠的性質是中層階級的。席勒爾 (Schiller) 便是牠的古典代表；他是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靈魂，而那一個時代恰證明近代德國資產階級之誕生，至于大詩人哥德 (Goethe) 的思想，則屬於一切時代的，從文藝復興，直到十九世紀。其他的思想家，像文各爾曼 (Winckelmann) 等，則完全獻身于美學一方面，仍然不能夠打破文藝復興之傳統精神。十五世紀以後，一切西歐的知識工作，緊緊地凝聚于德意志領域中的幾十年之內，似乎牠要竭盡每一個溫司 (ounce) 的力量，以補救好幾個世紀的失敗。席勒爾也研究美學問題，他仍留遺于一種道德的中層階級者之原型上，他見出「在有益的中層秩序之中，存在着我們整個文化之創造者，而這種文化是準備着爲人類之長久快樂的。」

(教區演講，宇宙史研究之意義及目的。)

(2) 威蘭德和海因斯之社會主義

德意志之思想家及詩人，像經濟之復興一樣，共同接受有好些英法二國之思想家及詩人之刺激。十八世紀中葉之後，德國啓蒙運動之哲學，戲劇，小說，法制，政治及社會批評——這些一切，都爲洛克(Locke)，沙夫斯堡利(Shaftesbury)，理查孫(Richardson)，菲爾丁(Fielding)，休謨(Hume)，和盧騷所影響。就是康德哲學，若沒有奧坎(Ockham)，洛克，巴克利(Bakley)，和休謨，也是不可能的。又從上述的各個名稱之中，可以見出在十八世紀之最後二十五年間，德國之法蘭西影響漸衰，而英吉利影響，則日漸強而有力。

自從德國中層階級仍居于軟弱之地位後，法國影響非常有勢力，各處的地方貴族宮廷，都把來變爲凡爾賽宮之小縮影；每一個王族都摸倣路易十四世；無論什麼東西，凡從巴黎來的，他們總以爲是絕對主義之一種供給。但在十八世紀中葉之後，這種情形，根本改變了：德國中產階級開始鼓舞起來，不久便在文學方面，對於法國宮廷的戲劇，

發生攻擊，而法國之影響，一般地動搖起來了。他們又發現英國文學之中層階級的性質，並且優先接納這種文學。至于法蘭西之影響，現在祇餘下盧騷，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良好的資產階級，雖然他的社會批評，是走入了歧路的。

在這個時代之反影（戲劇）中，完成這種變革的詩人和批評家，就是來辛（G. F. Lessing）。

文學上反對小貴族之專制，官僚之專橫，及警察之抑制，便刺激起政治之思想，喚發起社會學問題，憲法問題，和社會批評之一種趣味。這種趨勢的一個最好的文學代言人就是威蘭德（一七七三到一八一三年），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論文家，他的修辭是清晰而敏捷的，他的題材是誠實而光耀的，他對於古代，對於近代之西歐，又有令人可驚之知識。

對於我們，他有兩種著作是特別有趣味的，一是金鏡（Der Goldene Spiegel, The

Golden Mirror, 一七七二年), 一是聲諾普的待俄澤泥之問答 (Nachlass des Diogenes von Sinope, Dialogues of Diogenes of Sinope)。不用說, 他的觀念是主張「按據自然而生活」的。他又描寫一個社會, 沒有一切壓制遺痕, 完全自由, 而且在完全平等之下生活。他以為社會主義者之觀念, 祇有在一個比較單簡的社會, 才能實現, 至于比較複雜的社會則須要一個政府的機關, 其上還要一個聰明的君王和仁慈的法律。他把下述的故事; 托于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的老會員之口內說出來: 「我們的國家甚為微小, 祇包含有五百家, 在完全平等之下生活着, 除了愛慕自然自身的「變異性」, 令到人們有所區別外, 我們便沒有其他的區別了。我們愛護憲法, 尊敬長者, 我們以長者為人類之保存者, 這樣便能夠維持秩序和平, 而秩序及和平實是我們一致的原理和決意之結果。

「我們都把自己當為一個小家庭, 我們之中若有不和之爭論, 大概都是情敵之爭, 或兄弟姊妹之一時的吵鬧而已。……從八歲到十三歲, 兒童要接受很多教育, 以能夠令到

他們享受我們社會中其他的份子所享受的快樂爲止。從十二歲到二十歲，一切兒童，都從事牧羊，而女子也是一樣。由二十歲到六十歲，一切男子都從事農耕，至于園藝工作，則留待老年人去做。蠶絲之培植，棉花和絲業之準備，花木之培植，和一切家庭之責任，則操于我們妻女之手上。『當人口增殖之時，便另建設新的移民村落。但凡有野心，不安甯，或追求名譽的表現之青年，准許他們有一個機會，見見世界，以找着一個他們實施能力於國外之範圍，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則這些性質是會防礙單純和中庸的道德，平等，及博愛的。

威蘭德有一個門徒，名爲海因斯（J. J. Wilhelm Heinse 一七四九到一八〇三年），他充滿着文藝復興之精神，天賦有非常充足的文學能力。在他的 *Aringhelo*（一七八年）一書中，他描寫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國家於他的著作內之結論上；這一本書是由文藝和哲學之對話所構成，滲透于愛古心情之內。在一個希臘的海島之中，有一隊人

民，建設一個國家，還且定立一種以黎哥爾格斯 (Lycurgus) 及柏拉圖之模範爲法式的憲法，自然，牠也要顧慮到阿里士多德之反對理論。麥志維尼 (Machiavelli) 的君道篇 (Prince) 也在所必讀，然而『祇當爲勸誡之用』。柏拉圖以爲市民有兩種不同之範疇，一種階級是有榮譽的地位的，而其他一種，則從事農耕，這種區分，我們是廢棄不用的，但我們也輕蔑亞里士多德，我們祇要牢牢地保全物品之公共。我們所要排斥的罪惡，仍是很多，由此，我們可以見出，一切共和國的尖銳批評家，在他們的時候，還未能完全丟棄一切教育之成見。同時，財產也在公共酬報之形式上，繼續存在，一個人所得有的東西，可以保存，直到他死去之日爲止。而且，若根據蘇格拉底的高足所表示的模式，則婦人也是公有的，雖然祇在一個限度之中，而且即使男人，也是如此；換一句說，每一個人，都有完全的人格自由，而一切暴行都要禁止的。爲保存良好的秩序起見，又規定男女須隔別而居。』十份之一的婦女，對於公共事務之行動，有投票權，而至于關及

婦人之一切事情，則由婦人自決。「由是，愛情把他的意見，提升到最高之自由去；一切人民都努力追求美麗和溫雅。至關於人口問題，我們努力追仿斯巴達的方法，而對於斯巴達人，則達爾非 (Delphi) 之女祭司還不曉得那一個屬於死亡，而那一個是屬於上帝的；兒童全屬於國家。總言之，我們迴避一切為亞里士多德所陳述的煩擾，及在某個程度上，亞里斯多芬斯 (Aristophanes) 在他的 *Ecclesiazusae* 書中所提及的不方便。在海因斯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仍然有奴隸制度之存在，青年接受軍事教育，這恰然像在古代社會主義之理想國一樣了。

(3) 異教徒的社會及宗教之趨勢：韋沙布德 (光明派)

古代及文藝復興這兩個時代，雖然在威蘭德及海因斯二人的觀念中，佔有優越之地位，然而光明派 (Illuminati) 及來辛 (Lessing) 之社會及政治的觀念，都是異端的宗教

因素。不過他們雖然指出一種中世紀異端之復興，但所謂古代的問題，已並不是摩尼教義之善惡二者的抗爭，而是人類更進到一個較高的階級，到精神之完善；爲人類之教育，爲政治壓制及精神的和經濟的壓制之解放，而把神聖計劃更爲推進。

這便是光明派之祕密教訓；而來辛則在他方面，公開地把這種觀念表現出來。

光明派是一種祕密的團體，仿效共濟團（Freemasons）之方式而組織，所以二者很有好些相同之點。他們自稱爲最初的「完成者」，而在一七七六到一七八四年間，最爲活動。他們的創設者名韋沙布德（Adam Weishaupt），生於一七四八年而死於一八三〇年，在英高爾斯德（Ingolstadt）大學，爲自然律及聖經律之羅馬教的教授，曾經一次，爲耶穌會（羅馬教之一派，假宗教之名義，把自己之勢力，大張於各國政治上的宗派也。原名「Jesuit」，亦稱 Society of Jesus）之弟子，但其後却是耶穌會之反對者了，他在耶穌會中，採取了組織之方法，而自己從事組織起來，由是反抗教會主義，專制主

義，愚蠢和奴隸，並且建設一個爲一切人類的自由平等之王國。會員是祕密的，祇有學者，詩人，牧師，教員，高級官吏，王族，及其他牠有影響及有勢力的人們，方才可以加入於其內。光明派之戒律團體，分爲三級，數品，他這樣，是企圖爲會員之選擇，而且祇接納最能幹的會員，於最高品級之內。牠的會員是很多的，例如赫爾德(Herder, 德國大著作家——譯註)，哥德(大文學家)，尼古來(Nicolai 最著名的柏林書賈)，歌第(Gotha)威瑪爾(Weimar)，和不倫斯韋克(Brunswick)等公爵。後述的幾個祇被接納於較低的品級之內，祇能夠參加於培植和教育之內，而不能加入於戒律之目標。一七八〇到一七八三年，又有一個最著名的宣傳者，名加南奇豐花拉荷爾，(Freiherr Von Knigssee 一七五二到一七九六年)，他是『人類交際論』(Umgang mit Menschen, Intercourse with men)一書的作者。我總以爲來辛是和光明派有所接觸的，或者他和光明派的教義，是非常接近的；他的朋友尼古來或者早已領導他，加入這個團體了。

當時情緒之最可代表的畫圖，由加南奇描述出來，他那時曾經說道：「教士之欺騙，幾乎令到每一個人，都反對基督教，同時都令到他們狂信起來；王族之專制，到處創造出一種自由運動的反抗之趨勢。」這些趨勢都由韋沙布德利用起來，以實現他的解放計劃；而最可注意的，就是他採取斯巴達加斯之假名。這種組織，當然是屬於民衆的，但祇有當時的知識領袖，才受他所感化，由是而完成一種和平的革命。

韋沙布德的思想系統，如下所述：「自然」可從由下等進到高等的發展過程中找出來；自然所從陳示的各種樣式，各種階段，和各種法則，都祇是一種或同種之實在的變形而已。所以一種顯現出是充份成功的樣式，或者祇是一種新的和高等的變形之最低階級罷。這種發展過程之驅策力是人類之需要。新的需要做出新的發展時代。「一種新的需要從各種已滿足的需要，發生起來，而人類之歷史，就是牠的繼續不斷的需要之歷史。需要之起源及發展之歷史也就是完成過程之歷史，而所謂完成之過程，却是人類所

經已遇着的，牠就是文化活動之對象，禮儀優美之對象，潛伏不現的知識力量的發展之對象。在進化過程之各一個階段之內，一種交互替換，便在生活之樣式中，在道德及政治之情境中，在快樂之概念中，在人類彼此相待的行爲中，在他們的互相關係中，和在現世紀之整個社會情境中，發生影響。」人類之最低階段是奴隸，嚴酷之自然；需要之範圍，甚狹，但「自由及平等是人類最優美的兩種東西，在那時，牠們被人充份享受。」不過上帝及自然的計劃之一部份，是要教育人類，達到文化之更高的階段。當各個家族人口增進之時，生存手段，開始欠缺，於是游牧生活終止了，人類定居起來，耕植土地，而且確定私產制度；最強壯而最聰慧的人，便成功地統治弱者了，而弱者便不能夠用他們的能力以供給他們的需要，由是便不得不不要強者之幫助了；但當一個人無助之時，他失去了自由了。自由，平等，盡皆消滅，而祇有免除侮辱和襲擊的秩序安甯之必要。秩序之需求，便令到人類設置國家，還且把全部之權力授給幾個特殊的人物。這

樣便產生專制主義了，所謂專制主義，就是代替一切恩典的秩序和自由之一切壓迫，和充份之恐怖。國家和國家，互相分鬥，互相仇視起來，人類爲國家主義及愛國主義所屈服了；憎恨別人，殺戮別人，却成爲一種德性了；而且就使在同一國家之中的各個市民也爲愛慕地主主義和利己主義所毒，而互相憎怨。人民羣衆用他們的能力，決不能夠從這種悲慘的境地裏，超拔出來；祇有一種「光明派」的祕密團體，爲人類完滿而努力，團體，才能夠從事這樣的工作。所謂回復人類之原始的自由這一問題，不是要回復到野蠻的和粗暴的情境，而是要回復到一個更高的社會秩序。而且這也就是宗教歷史之意義。埃田園（樂土也——譯註）是以自由和平等爲特性的自然情境之象徵；所謂從恩典而墮落，是指奴隸和國家（壓制之政府）之基楚的引進到這個世界；拿撒勒（Nazareth，耶穌故鄉——譯注）之耶穌，其顯現及影響，是等于理性法律，仁慈，自由及平等之恢復。因爲祇有經過一種心靈之革命，人類才會得獲牠的長進，道德，自由，及平等。（註一）

(註一) 韋沙布德對於管理的光明派之演說，印於 *Nachtrag von Originalschriften*, Munich, 一七八七年。

一七八四年，光明派之團體爲巴華利亞政府所譴責，加以解散，並殘酷地迫害那些不能夠逃避的會員。韋沙布德逃于韋瑪爾，在那裏，他爲一個宮庭的顧問官，以終其身。(註一)

(註一) 當法國革命之時，反動勢力，譴責耶可賓黨，以爲牠之起源，是由於德、俄、義的基礎，即由於韋沙布德之著作。(見 *Jaure's Convention* 卷二，一五二九頁以後) 一九二一年，韋白斯德夫人 (*Mrs. W. Bster*) 印刷一本反對德國的書 (世界革命，倫敦版)，在其中，她企圖指出韋沙布德是一個在德國利益中一切社會革命運動者之著作，而且他還希望把英，法，俄，數國，殺入於紛擾之情形中呢。

(4) 噶荷爾德以法連來辛

來辛在一種宗教的氛圍中生長，起初，他本來想獻身于神學之研究的。後來，雖然他轉變了初衷，而研究哲學及文學，和唯理派及自然神派接觸，不過他仍常常回顧到嚴重的宗教及神學之探索，審慎地誦讀教父之書籍，或者還大多數是中世紀異端的書籍。他的基督教觀，以為是一種社會倫理的實際性質。這種態度之典型就是他開始對於神學範圍有一本寫作：他在一七五〇年著了『摩利凡派（Moravians）之辯護』，在書中，他推崇早代基督教之情感和實行，實在超出於這個世界的智慧和經典主義之遁詞之上。于是他又敘述一個早代的基督徒，他吩咐我們說道：『要迴避財富，要從財富逃脫出來；處己嚴而待人恕；要尊崇功績，即當牠載負有侮辱和不幸時，也要尊崇牠，捍衛牠，要和愚蠢的權力相反抗。』爲要達到他的活動生活之目的，社會基督教之異教觀念，便佔據着他的知識觀察之中心了。

上面經已敘述過來辛至少也和光明派，有過知識上之接觸了。他的異端宗教的社會

觀念，可以從他的『共濟協會之討論』(Discourses for Freemasons)一書中找出來，而尤其主要的是『人類之教育』(Education of the Human Race)。兩種著作之編集，都在光明派存在之初年。第一本書是特別獻給不倫斯威克(Brunswick)的腓迪南公爵(Duke Ferdinand)的，公爵就是光明派的會員。在該書之貢獻詞中，來辛說道：『我也在水源之旁，而且從水源吸飲了。』在第二個討論之中，我們有了一種在國家中人類的罪惡情境之理論；國家把人民分別開來；牠們建立起濠溝和牆壁，這些防礙物不特存于不同的民族之中，而且也存於一國的人民之內。所以，『在各個國家中，都狠希望應該有些人，要把人民從成見解放出來，并且曉得清清楚楚，愛國主義之消滅，實是一種德性，』還有：『牠並不是所要求的善行，而祇是設立一種以仁慈為不需要的情境而已，』來辛從第一個討論之中，已經指明應該創立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因為唯有在這樣的社會之下，每一個人才值得為生存之準備啊。

在人類之教育一書，來辛討論從野蠻時代到完成時代的人類發展之觀念，世界史是一種神聖歷程統系的成就，而人類在這個歷程之中，快要到「第三個時代」之成熟了。

所謂「第三個時代」，就是福羅利司之約阿喜謨 (Joachim of Floris) 和中世紀異教徒之教義；牠是『永久福音』 (Eternal Gospel) 之教義。(註1)

(註1) 見本書第二卷中世紀社會鬥爭史

以曾經用過很多注意于宗教及神祕問題之來辛，自然對於這種教義非常熟習了：

第八十六 牠將來確實會來的！這就是新的永久福音之時代，牠在新約中已經應許我們了！

第八十七 或者，十三十四兩世紀之熱心者，把捉着這種永久福音之一綫微光，但他們却錯誤了，因為他們預示這種日子距離他們的時代，最為接近。

第八十八 或者，他們三個時代之世界，並不是空虛的幻想，他們說，新的約

章，應該會像舊的約章一樣歸于消滅，這確不是可以輕蔑的觀察。

第八十九 他們祇深信他們能夠令到同時代的人們值得生存于第三個世紀，不必經過幼年時期，教育，和進備。

第九十 他們真成爲狂信者了。狂信者常常看見將來，但他却不能等待這種將來了。他希望促進這一個將來之來臨，而且由他自己促進。自然自身是要用幾千年間的，但在他的存在中，祇是一瞬。

第九十一 走爾的不可思議之道途罷，這是永久的天命！假若爾的脚步，向後退却，我仍是不失望的。「最短之綫常爲直綫」，這是不真確的。

第九十二 在爾的永久之道途中，爾有狠多負擔；有狠多工作，有很多要行的步驟！但是容易證明可以運載人類接近于完成之境域去的最大而最慢的車輪，其行動之推進是要由于較小而較速的各個車輪的，牠們的每一個都供給牠自己的貢獻。

因此，牠要用時間把一切進步的小車輪，活動起來，雖然有一切抵抗力，但牠們仍推動這個偉大車輪的發動。

(5) 法特烈基里斯託夫奧廷格爾

有一個非常博識教父的，士子的，和神祕的文學之神學家，為斯華比派 (Swabian) 的牧師，名奧廷格爾 (Friedrich Christoph Oetinger)，他深識哲學和自然科學，有內在之虔誠和強有力之社會情緒，一七〇二年，生于哥平根 (Goppingen)，一七八二年，戴着主教之職而過世。他在巴賓可辛 (Bebenhausen) 和包羅巴倫 (Blauenreun) 的寺院中讀書，後來，他又到杜平根 (Tuebingen) 的學會去，他在那裏，成爲一個演講者。他的自傳，實是十八世紀宗教生活認識的一種最有價值的文獻。他研究雅各波希未 (Jacob Boehme) 之書，而以個人接觸及通信和摩利凡派相接近。對於我們主題之最重要的就是他

的著作，黃金時代 (Guldenes zeit)，其著作之時代，由一七五九到一七六一年，在該書中，他討論千福年王國（見本書第一卷古代社會鬥爭史——譯註）的事情，而且發展下述的社會的原理及教義：

『一個領域中之真正快樂，有三個必須的條件。(1)無論社會秩序中所包含的一切變異如何，也無論一切階級之區別如何，一切人民都應該平等，各個人以他人之快樂為快樂，以他人之幸福為幸福，所以每一個人是自由人。(2)他們的品物應該公有，他們不以物品而快樂，因為一切物品都是公共產業。就性質上言之，當他人使用他的物品之時，他便可以要求使用他人之物品。(3)他們無論何人，都沒有奴役之要求。因為假如一切物品都豐富地存在，則支配權，財產，和由統治權所顯陳或暗蓄的義務，都不需要了。每一個人都要熱望他人之富有，假如他不須強制便有了好些必需的東西。最多，他也祇能和別人交換物品，而金錢却是不能使用的。倘若設立了這三條條件，則由生命

能力之聰明運用中，便可以引生正義了。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種爲智慧所幫助他找出的權力。而現在之所以有人類之不公平，完全因爲人類性質之弱點；所以有財產，則因爲物品之欠缺；義務，合同，和契約，則因爲必須從事爲他人而服務而工作的原故，由生命內在力量引出來的自然原始律，却已爲人爲律所覆蓋。人爲律把權力賦給特殊的人，把產業之性質放在物品之上，而且又把義務規定行爲。

這三種條件存在于樂園之中，但自墮落之後，便成爲反面了，所以在黃金時代中，平等和權力相調合，公有物品和所有權相調合，由奴役而解放的自由和強制勞動相調合，然而無論如何，平等，物品之公有，由奴役解放之自由，及契約，在將來，必佔優勢。』

奧廷格爾的這些原則，實在包含有基督教神學的社會教義之精華。（註一）

（註一）奧廷格爾說訓之結論，已爲奧伯倫（G. A. Oberlin）博士。在其 *Theosophie Friedrichs Gnr.*

Isopile Oettinger 一書中舉出來。見該書之第二版，一八五九年。

(6) 斐希特及其社會政策

斐希特生于一七六二年而死于一八一四年，是來辛的同鄉人，一個活潑的國家民主主義者，而且是一個最特殊和最能耐的德國行動者及思想家；他是政治家及演說家，他是後來一八四八年共和主義宣傳家的理想型式。至于他的著作，則祇有『告德意志國民書』，為今日所注意，然而他的著作，是狠值得研究的。一切其他的著作則具體化于德國知識發達之歷史中。在他少年的時代，正當德國之政治的及宗教的情形騷亂和平平的時代，這個時代，前已敘述過了。所以我們不必奇怪他之早年對於宗教之觀察和批評，是屬於世界主義的。他像克魯泡斯托 (Kropotkin) 一樣，非常熱烈地喜悅法國革命，他以為德國反革命之戰爭，實在並不是法德二國之戰爭，而為專制主義對於自由之攻擊。

他似乎不很關心于「羅倫及阿爾撒斯兩省的人，要在法國的地理書中，或德國的地理書中，找出他們的都市及鄉村。」這兩者屬法屬德，對於他都是一樣的。一七九三年，却刻記了他的革命熱誠之頂點：他輕蔑檢察官，贊助法國革命，而且緊握着一個理想國家的問題，若用他的名詞，則為理性國家的問題。在那個時候，他真是一個耶可賓黨了。自然，他在後期，仍舊有他的激烈衝動，所以他要準備着驅逐一切德國王族，而建設一個德國人民的統一體，他把一種高尚的社會和政治之使命歸之于他們。尤其在一八〇七年及一八一三年，他是一切反抗絕對威權的反動之首領，但以其全體觀之，則在一七九四年之後，斐希特已逐漸為宗教的神祕主義，政治的國家主義，及低級的中層階級觀念形態所統治了。我們應該記憶斐希特之人格是比之他的觀念，較為偉大，而後來，却以他的觀念比之他的實際工作，較為偉大了。這一個人本來有多少無產階級之勇氣，但 he 卒為當時德國小資產階級的情境所壓服。

在他的『告德意志國民書』中，他在他的同國人之前陳訴道：『就在一切國家中，還有好些人，不能夠相信人類的正義，理性，和真理的境域之應許，是虛幻而無價值的，所以，他們都以為現在的黑鐵時代，祇是一種到達較好情境之過渡而已。這些人及全體人類即要倚賴爾們的。古式的世界及其榮耀與偉大與乎其缺點，都已經墮落到牠自己的無價值之內了。假若在這些演講之中闡明確有真理，則在爾們一切近代人民之中，一切事實之下，便確然不誤地藏有人類完成之種子了。……後來，這裏便沒有選擇了：假若爾滅亡，則和爾們一同滅亡的是全人類為解放災禍的超渡之每一種希望。』一八〇七至一八〇八年德國為法國所佔據後，斐希特講出以下的話。德國人決不能用古老的政治方式及方法，以拯救他們自己及全世界：『武裝之衝突經已消滅了；倘若我們將來有戰爭，便會發現原理，道德，和品格之新的鬥爭了。』德國人民，復生起來，而且用自我犧牲的勞動，扶植一個理性和真理的應許的王國，用這種手段，便會影響到整個文化之

再生。「新世界之曙光經已達到發現之時候，照耀着山頂和將來之日子了。」雖然上舉的幾節可欽佩的篇幅，是可以為世界戰爭後之今日一個革命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所寫作的，但是『告德意志國民書』却完全是國家的，其目的則在於提升正在屈服中的悲劇時代的德人之國家意識，鼓舞牠，把一切法國的因素，加以排除，而且準備着一種反抗國外和國內壓迫者之決定的戰鬥。所以我們在上面說過，斐希特是一個國家的民主主義者，一個共和主義者——一個理想的一八四八年的人物。

他在社會和經濟的事情上，則是一個低級的中層階級的改造家。他對於這些問題之觀念，具體表現于他在一八〇〇年印刷的自足的商業國（*Self-Sufficient Commercial State*）一文中，他規定了他對於經濟原理及政治之實際方法的態度。斐希特的社會及經濟方針是自足的國體，為國家所統制，在團體中，每一個有體力的人，都根據着職業而組織起來，應該有一種中度而却是確定的收入。從拍拉圖的理性國家到斐希特的自足商

業國家，其距離，真是很大了。

斐希特反對經濟之競爭，反對自由貿易，反對世界商業之趨勢；他以為這些現象及趨勢，都是欺騙，詐偽，爭論，國家憎恨，和戰爭之根源。他希望有一種唯一的民族團體，獨立於異邦之外——一個密切的，自足的，廣大的區域，有堅確的界限，在其中，可以創造各種滿足簡單生活的必需用品，而且又可以互相交換。土地是神之產業，是屬於世界之創造主的；至於土地之應用，則屬於那一個去耘墾牠的人。唯一有應用土地及粗糙原料品權利的人，就是從事生產的人。根據斐希特，則這些物品使用中之產業，是由於分配物品使用的公民之交互契約起原的。其後，牠便不是產業了，而是造成所有權的物品之生產的或使用的操縱了。

在理論看來，這似乎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實際上，則斐希特的產業論是無意義的。因為地主不難用用益權這一種意義來證明他們的土地佔有權。斐希特之產業論，實不足

以防阻地產之交易，因為買者和賣者都可以滿意於這種土地之使用及用益權交換的交互關係。總言之，斐希特之產業論並沒有包含多少社會主義之因素；至多，牠也祇是法學的社會主義之一種幻想而已。

對於社會之組織，斐希特把市民分成三種經濟之範疇。第一種範疇是農人；第二種為手工工人，斐希特稱之為技術者；第三種範疇則為商人。每一個階級，都祇可由協同契約之規定，而從事牠自己的職業：農人不可從事工業及商業，其他例此——總說一句，每種東西，都為行會的路向所分界和配合。國家要規定職業之分界是並不違法的。同時，國家也要決定各種職業的人數，令到牠祇能收受各會員之必需的足量為止，由是以維持各個階級之平衡。

社會以農耕為基楚，產生供給一切需要的食糧及粗糙的原料。非生產人數之規定，則視農耕之生產量而定：假若農夫能夠生產過多之食糧，以供給好幾個人，則藝術家，

商人，教員，長官，及其他，都可以多分配幾個了。

不同職業者之物品交換，要由商人執行，而商人數目之多少，則由國家根據着農業和工業生產品之能夠交換的數量，以爲決定。

但是根據着何種價值之標準，而確定生產品之價值於商人呢，而商人對於消費者，又怎樣決定物品之價值呢？

價值之衡量是一種特殊數量之穀類。假若四磅麵粉爲一個人適當的日用口糧，則這個數目的麵粉，就是一個人一日工作及生產的價值量。生產若能更多，則其價值亦更大。根據着這種標準，則牠種食糧，便要用牠們的內在價值而評價。例如肉類，也是一種生存之食物，牠比之麵包，有更高之內在價值，因爲少量之肉類，其滋養時間之長久，已可和多量之麵包相等了。所以，平均說起來，若干數量之肉類，對於一個人一日之營養，便恰恰和若干穀類，營養這一個人的一日之價值相當，倘若他要這個數量之

肉類，則他可以用那個數量之穀類來償值。

爲要令到製造及一切勞動之價值之不能夠直接得獲食糧者，也有所計算起見，他便引用一種新的原理。工人應該可以生存於他作工之時候，其中還有爲學徒之時候，如果必要，還更可以加增及延展他的工作生活。所以，假如他祇以麵包維持他作工時間之生活，則爲他的工作起見，他應該收受他可以得獲的穀麥。而且，若在麵包之外，他還要其他的食物，他又可以根據上舉的規則，把他自己所剩餘的穀麥，加以交換。還要加以製造的產品——斐希特是指粗糙的原料品——之價值，適和要用同等之能力，加於穀麥之栽培內，而後可以產生若干穀類之價值相等。

斐希特把這些情形寫得非常複雜，非常討厭。但他的意義，可以括之如下：價值之衡量是一種特殊數量的食糧之滋養性；糧食可以和滋養料相等之他種糧食相交換。工業之產品，則彼此要按據着勞動力所表現之數量而互相交易，假如實施於農業，則要按據

看若干穀類之生產。工業勞動者之工資應該包括這種勞苦之代價和粗糙原料品之支出。用這種方法，農人和手作者便可以得獲生產物之公正的價值了。

然則什麼是商人之地位呢？假若他按據上述的標準而從事交易，他便把價值定在原有價值之上而已。不過他如何生活呢？這個問題之解答，是國家容許他增加若干由政府所規定的利益；這種利益就是他收入之來源。

從這一點開始，則根據斐希特之意見，其邏輯的推論，必以為商品之交換，必高出於其原有的價值，這就是說，「價格」是常常高過「價值」的，這是顯明的可笑的推論。

我們以上祇說過物品之交換。這很顯明要設立有某幾種交換之普遍有效的中介，由是才可使交換之實行成爲容易。這種交換的一般中介物就是金錢了。不過在斐希特商業國家之中，金錢雖具有地位，但金錢却沒有原本之價值。除了黃金和白銀之外，還有別

種價值之代用貨幣（紙幣及同樣較廉價的物質）。而代用貨幣之數量則由國家決定之。

「國家按據着上述的理由，可以自由指定為通貨的代用貨幣之數量。無論其數量是大是小，牠是常有一定相同之價值的。或者國家可以把牠假定為一百萬他拉爾（Taler）又或者可以把牠分為一百萬份，而每一份則名為一他拉爾。則若干的肉類，果類，及其他，或亞麻，大麻，麻布，或羊毛的衣服，等於若干穀類之價值，這種決定，已由上述的計算方法而評定了。假若一個人把除了穀類以外的一切商品之價值，用公共的通貨，追溯到穀類去，而且又由交易之轉換，以增加穀類之數量，他便會說道：這樣的一種穀類之價值是在流通之中。讓這種衡量為流通中之金錢來分割牠罷。假如在上述的假設之下，有一百萬的數量，則每一個數量之穀類，便等於一他拉爾的金錢，而且同數量之肉類，果類，亞麻，麻布，羊毛衣服等，若根據上述穀類數量之統計，則其價值也等於一他拉爾了。」用這種方法證明的價格，都要為法律之規定。

國外貿易祇操於國家之手，像其牠的國外關係——如外交，戰爭，和平，及其他一樣。斐希特希望全世界，爲同樣的獨立，自滿，自足的各個國家所構成。他又想在那一個世界中，無戰爭，無爭論，無妒忌。按着合理之方法而組織，各個國家的人民，都深深刻印有強固而合理的性質，而且發展他們的個性。各個獨立之國家，彼此恆久和平地互相對立。文藝和科學，盡皆國際化。『各種國外文學之寶藏可以由學術會員之中介而輸入國內，而同時又把本國文學交換給外國。……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防止各個國家之學者及藝術家之自由交換意見。報紙不再記錄殺人流血的戰爭，和平之契約或聯盟了，因爲這些東西，都煙消雲散，不再存在於這一個世界之上。報紙所登載的祇是科學進步之新聞，新發明之新聞，法制進步之新聞，政策進步之新聞，而且每一個國家還非常迅速唯恐不及地採用別個國家之新發明呢。』在這種樂觀主義之音調之中，斐希特終於停止在他的低級中層階級之烏托邦之上了。

第七章 拿破侖時代及王政復古時代之法國

(1) 戰爭，帝國政策，及商業投機

自巴卑夫及達爾代之處死及波拿洛第與其同黨之放逐後，法國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從政治之表面上看來，竟不復表現者，凡三十年。執政制度壓迫一切對於政府之反抗，而且準備了拿破侖統治之道路。一七九九年，拿氏傾覆了執政制度，一八〇四年，他竟接受了皇帝的威權。法蘭西人享受專制主義以前的平等，然而他們的想像中，充滿着流血的戰爭，及光榮的勝利，他們的荷包中，充滿着由商業而來的貨幣及紙幣，戰爭之契約，與乎戰爭之工業的錢幣。從商人，投機者，貸金者，股份交易業者看來，則革

命及拿破侖戰爭之時代，實是非常生利的和興奮的。教會被沒收的財產及移民財產之買受，穀類價值之增加，資本主義對於國內外粗糙原料品之獨佔，尤其是法國海港，盡為英國艦隊所封鎖，都令到拿破侖之興起和法國資產階級之興起，同時發生。

帝國政策代替了一切國內的和憲法的問題；帝國主義的成功，經濟的繁榮，和武力糾紛之地理情境，與乎海止勢力之重要，及其他，都非常熱烈地去研究。就使在斐希特的『自足商業國』一書中，我們已可以見出這些問題的極可注意之觀察了，即是可以把英法二國的衝突，追溯到前者居於海島的地位這一種事情上。（註一）而其尤為可以注意的是查理士傅立葉（Charles Fourier）之觀察。他推論日本也居於海島的地位，所以牠不得不注意於航海和經濟之部份，後來在關於中國之事件，便可以戰敗俄羅斯之競爭。（註二）傅氏同時又描述出當時欺騙的投機事業之狂歡，操縱價值之劫掠，財政階級的貴人及商家的股份交易之奸謀詭計。虛偽的戰爭消息是一種操縱法國股票起落之方法。

(註三)

(注一) 斐希特以爲「海島祇是大陸之附屬物，所以法英二國，應該彼此隸屬。然因爲二國人民之民族憤恨至深，所以便彼此都繼續着企圖侵略他的敵國。」

(注二) 「自俄國侵略中國，便迫令日本人馬上建設海軍，後來便成爲一度抵抗俄羅斯的防禦鐵壁，他們都有投身於世界工業之手段了。」(引自傅立葉的「四種運動」一八〇八年版，二八九頁)

(注三) 同上書，三四七頁。

法國資產階級祇會自肥，因而在拿破侖星光照耀，燦爛一時的時代，竟忘記了革命的鬥爭和憲法的問題；這個時代，直到大概一八一一年，方才終結。

(2) 查理士傅立葉

在這個非常擾動的時代(一七九二到一八一〇年)之社會環境中，有一個知識的出產

品，就是查理士傅立葉（一七七二到一八三七年），他這一個人，混合有橫溢的想像，無限制的樂觀主義，及尖銳之理解，過度的空想，觀察敏銳之天賦，與乎偉大的勇敢。他的性質是由各種不平均的部份所構成。原初，他是一個商人和商店之助手，當他逗留於里昂之工業中心的時候，他便被鼓舞而從事於社會批評，這是因為當時經濟生活之尖銳鬥爭及崩壞，於是令到很多小企業者——他也在其中——之生存，歸於沒落了，而郎格（L'Ange）所設立的合作計劃，似乎是當時的混亂情境中之一條生路。這種背景，便令我們看見傅立葉之整個情形了。當他是一個破壞的批評者之時，他攻擊競爭和崩解；但當他是一個積極的改造者之時，他便主張用合作的股份經營的方法，而把勞動連結起來。他在『四種運動』一書中，表明他的觀念，該書似乎在一八〇八年，印刷於來布色。而其後他所寫作的東西，都祇是這本書之擴大及注釋而已。

他的全生工作都瀰漫於下述的幾種基礎觀念。

(1) 人類之動機及熱情都在於全體之好處，有正當之目的，而且會扶助人類，到快樂之境地；社會工作則在於鼓勵他們，以適當的社會組織，達到這種目的。

(2) 商業，從道德及物質上看來，都是有害的，敗壞人類之德性；牠是文化中之低下的精神，然而文化却是要接近牠的界限的，而且將來，會以經濟和生活之聯合及合作的方式，爲之替代。

(3) 婚姻是一般地虛偽的，而且其中還包含有婦女奴隸之意義；應該以自由戀愛爲之替代。

(4) 文化呢；人類史之現在階段是充滿着罪惡的；然而牠創造了爲提高人類到協和及諧合之階段所必需的各種能力，在那裏，人類動機會爲他們的自由活動而找着了範圍，還且會創造財富，快樂和平呢。

傅立葉所提出之要求，顯見他已洞察了神聖創造和自然之祕密。哥林布，加白尼，

和紐頓等在物質界之概念中，所完成之工作，傅立葉也在有機界和社會運動之法律的概
念中完成他的工作了。他以為自己的『發見』是非常重要的，比之『人類發現後之一切科
學工作』都重要過。（概論）他又問道：『我們要為拍拉圖，辛尼加，盧騷，及福爾德，
與乎一切古代及近代愚昧之代言者——以他們關於政治及道德哲學之著作為限——將會
歸于消滅而悲悼麼？』（二十六頁）他又質問哲學家，他們的觀念形態究竟是為什麼的：
『我是不曉得思想之全部機械的，也未讀過洛克（Locke）和剛地力克（Condillac）的書，
然則我便沒有充份觀念，以找獲一般運動之整個系統？而爾們呢，却祇找獲出牠們的四
份之一，即物質的部份而已。而且，這是在科學努力之二千五百年來的事了。而我在現
在及將來之世紀中，都要受人感謝，因為我着手從事于他們無限的快樂。當我是書本中
定義的研究者之時，我要驅散一切政治及道德哲學之烏烟瘴氣，而在不穩固的科學之廢
址中，我却建立了宇宙和諧之理論。』（二二八頁）這種新鮮的真理，是由于一七九三

年，郎格所設立的農業會社之反想所促成。他從這種觀念出發，便信仰他已經找出了人類決定之全部數學的祕密。人類之超渡要倚靠于達到聯合及協作之過渡。『而且這種過渡不久便會完成。我們將會親眼看見這種爲世界上決不能夠再次發現的奇觀：從不連貫而到社會的聯合之中，忽然有一種過渡：牠是地上所能夠演奏的運動之最目眩神迷的結果；其先期的預料便要補償現代一切之災禍。每一個年頭，其中都含有很多變化，確抵得其他的好幾個世紀。』(三〇至三一頁)

這樣的引證夠了。牠已經充份令我們相信傅立葉實是一個含有各種不均衡的性質之人。讓我們討論他的理論罷。

傅立葉對於自然之觀念是屬于十七八世紀的。他所見的一切現象都是數學演奏的運動。他說，這些運動之數目有四種：就是社會的，動物的，有機的，和物質的。紐頓祇發現物質運動律。這就是重力的法則。現在呢，社會運動法則也要被發現了。個人情感

在社會生活之中穩匿着運動之法則。這些情感是向着某幾種「社會對象」(Destinées Sociales)的規定的目的。假如我們的情感有適當的目的，我們便不必躊躇，祇是跟着牠們去好了，因為像傅立葉所說，在給與牠們的影響中，在『情感的吸引』中，我們便會找着了我們的鵠的，和我們最高希望之充份滿足。然而道德家和哲學家對於我們衝動及情感之教訓，總以為是必須壓抑的，這種教訓是絕對地有害的；這種教訓決無效力；牠是無能力的，牠的唯一結果祇是虛耗紙張而其實一無所有的書本之積集。跟着道德家而來的是經濟學家，他們以為商業祇是給與欺騙，壟斷，破產，和股份交易之操縱以一種動力，造成整個道德之敗壞和許多不幸。

人類情感所傾向的吸引力，有三個中心。

- (1) 肉感 (或五種感覺)。
- (2) 知識之情感 (友誼，尊敬，仁愛，家庭之情感)。
- (3) 精練之情感 (爭勝，愛變遷及愛奇異，組織)。

第一組有五種感覺，第二組有四種，第三組有三種——總計爲十二種。牠們像十二口磁針，驅策着人類之精神，趨向于吸引力之三個坩堝或鵠的。最重要的是第三組，因爲牠們之目的，在於一般的及社會的統一，不過這一組之表現，不是單獨的，而是全組之組織，或聯合，這樣便找着了完滿的目的了。（一二三頁以下）

從這十二種情感之混合，便發生最不相同的各種性質。十二種情感之聯合會產生大約八百種不同的性質，所以要在八百人之一個會集中，方能夠有一個完全的完備；而且假若這些人在幼童時代接受適當之教育，他們便會表現出偉大的才能；例如荷馬，該撒，紐頓，及其他的偉大人物了。假如法國人口總數爲三千六百萬，以八百除之，我們便得到四萬五千名能夠和荷馬，狄摩西尼（Demosthenes）莫里哀（Moliere）相等的人物了。（一二六到一二七頁）

不過這必須根據于傅立葉之假想，這些情感和才能，必須要在一種協作的生活模式

及按着傳立葉的觀念而發展。

這種人類的新秩序是在來臨了。聯合之階段是跟隨着文化之階段的，而後者在現代已經顯然地接近牠的目的了。

到今日爲止，人類已經經過了下述的幾個階段。——(1)自然之階段：在埃田園中之樂園時代，也可稱爲「埃田主義」(Edenism)，在那裏，有自由，有平等，有豐富之果實，魚類，和野獸。在每一種生活之關係中，人類公共地生活着，而且爲部落之組織。(2)奴隸之階段：因爲人類之增加及合理的聯合之喪失，于是便發現了食糧之欠缺，爭論，攻擊，和劫掠，都一併惹起了。(3)族長政治：強有力而粗野的家庭設立了，貶黜婦女，引用私產制度，這種情形，可以在一切曾經生活于，或至今仍然生活於，父族政治之下的人們觀察出來：如在聖經時代之猶太人，及在中國與乎其他的亞洲國家中。(4)野蠻時代：這就是中世紀，封建主義發展，其中有一最好之點，就是許多

婦女之被人尊崇。至於其他呢，則封建主義發展文化，商業，和工業之種子。(5)文化之階段：人類之絕對的不相連屬及各個分離，人類互相仇視，態度和行爲，都是一樣。全無組織，商業精神摧殘一切較高的感性——人道，祖國，正義，互助，盡皆消滅；壟斷；市場之漲落不定；危機；欺詐，虛偽；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無產業者備受恥辱；競爭；崩解；經濟界之無政府狀態；家庭感情之消滅；父子也起鬥爭；資本家壓迫勞動者；富人統治政府；失望者之反叛和革命——上述一切，都是文化之特性。而在其中，婦人之損害最大；婦人可以買賣，所謂婚姻，除了女子之交易以外，並沒有其他意義，女子從幼年起，已經受着訓練，仰望着一個買受的人；不過兩性的本能却不能壓制；所謂「忠誠」的婦女，有牠們家內的男友，而男子也有他們的情婦；伴虛偽的一夫一妻制度而發現的，是姦通和娼妓制度。然而文化也完成了多少好處：牠已經促進了科學和技術，顯示勞動生產力進步之可能性，令到有錢的企業家，有機會按着更合理的商業方式

而從事農耕及產業的經營。

牠準備着一條大道給商業的和工業的封建主義，少數富人，統治全國之經濟力量，設立廣大無比的農耕經營，在那裏，有某種程度之組織及協作，而工人也可以得獲生存之保證。然而文化之階段後，便是第六階段，這個階段，傅立葉名之爲『保證主義』(Guaranteism)之階段——這是一種向第七個階段的社會及政治時代之過渡：第七個階段便是社會主義，而傅立葉則稱之『Socialisme』，在這個階段中，開始完成和諧和快樂之生活了。由是人類可以居住於『法倫斯梯爾』(Phalansteries)之中：以合作方式管理的大旅舍，集居起來，從事工作，其人數從一千六百到一千八百（爲八百之兩倍，或稍爲多些，由是以令到人類性質有最好之混合，在那裏。三種『最優美之情感』——爭勝，變異，和能力之集中——都有充份之自由）。

生產手段之社會化是在傅立葉觀念之領域外的。法倫斯梯爾是自由之集合，資本

家，工人，及有能幹的管理者，都可加入，而勞動之產品則以下述的方法而劃分：勞工得十二份之五，資本家得十二份之四，管理者得十二份之三。

自由戀愛，以團體之費用教育兒童，每日七餐，歌劇和戲曲，生活之愉快——這些一切都可以由法倫斯梯爾之制度成爲可能，由是，人類可以希望有一百四十四歲之平均年數，其高度則爲七尺。（四種運動二五一頁）

傅立葉不狠關心於政治，他憎惡革命及猶太人，尊敬拿破侖，而且常常想找着一個偉大，富有，良好的人，能夠採用他的計劃。他的著作，祇有一部份是可以誦讀的。傅立葉主義之最好的解釋者，就是孔西達倫得（Victor Considerant），他的社會的對象一書，出現於一八三七年，傅立葉之死亡也在這一年，該書是貢獻給當時法國的統治者和偉大的所有主路易腓立（Louis Philippe）王的。不過這本書所包含的，比傅立葉主義還多：這是馬克司到達巴黎（一八四三）以前，法國所演奏的社會批評工作之一本最重要的。

梗概。我從該書引述兩段如下罷。一個傅立葉和聖西門的門徒，名阿伯爾登蘭生（Abel Francon），說道：「我們平常皆以英倫爲一個模範。但是科學怎樣告訴我們？牠告訴我們，她的偉大工業的基礎原則，是把土地和資本，都集中於少數及又數的人的手裏。而且經驗又怎樣教訓我們？牠斷言這種一切奇跡之結果是卑下階級之壓制，是工業封建主義之設立，而這種工業封建制度，比之中世紀之封建制度，更爲可恨，更爲無恥。」（見社會的對象二二三頁）又其他的一段則爲：「政治的經濟學是一種通過利益的政策而殺害自由精神之過程，這種政策詆毀自由精神，視之爲奢華和愚昧，這種情勢，恰像武俠之精神爲自由主義所殺害，而且把牠譏笑爲「當昆克司主義」（Don Quixotism, Don Quixote 爲西班牙西凡德斯之一本小說中的主人翁名字，他憧憬於中世紀之武士生活，因而發生了許多笑柄，至死不悟——譯註）一樣。」那些熟習於馬克司的「神聖家族」（Heilige Familie）的人，必會注意於法國之影響了。

(3) 聖西門

我們要清楚把聖西門及聖西門主義者分別開來，像要把康德和新康德派分別開來一樣。聖西門像康德一樣，其社會主義的臭味甚淺；這兩個人都最好隸屬於自由思想之系統內；康德是哲學的自由主義派，而聖西門是經濟的自由主義派；他們兩人都把宗教當爲實際倫理之教義。

至於聖西門主義者呢。有多少聖西門的門徒，在較後之時代，一八二九年——他們教師死後之四年——開始宣傳一種他們所得獲的社會改造趨向之觀念，然而他們除了親炙聖西門之外，還和傅立葉之合作理論，英國勞動鬥爭及社會教義（一八一〇到一八二六年），和波拿洛第之社會主義觀念，非常習熟。所以他們恰像新康德派一樣，新康德派也是習熟近代社會主義，而且努力建設介於他們的大師——康德——和馬克司主義之

最密切關連的。

亨利聖西門子爵(Count Henri de Saint Simon)是一個屬於法國最高貴族之家庭的後裔；他和著名的紀錄著作家德克聖西門(Duc de Saint Simon 爲路易十四世之臣下)，大有關連，而且還可以追溯他的家譜，到查理士大帝。他受有貴族之教育，參加於宮廷和軍事的社會中。當他是一個青年軍官之時，他追隨拉法夷脫(Lafayette)之麾下，參加美國之獨立戰爭，反抗英國，在那裏，便學曉了欽羨合衆國之純粹中層階級之性質。他在那時，已經計劃着開通巴拿馬運河，因爲他對於商業和工業之活動，是非常注意的。他後來回到法國，加入革命之漩渦中，而且利用經濟之機會以買賣官吏沒收之產業，由是便聽得了許多金錢(一四〇〇〇〇法郎)，這樣多的金錢便令到他能夠充滿他的知識的罅隙，而且容許他享受生命所能夠容許的快樂。然而金錢不久便爲這種貴族式的知識生活方式所耗盡，於是他又過着菲薄的生活，常常感着不足了，後來一個猶太的銀行家名

羅德列格 (Rodrigues) 和他的友人，供給他以生活費，他才無憂無慮，終其晚年。在一八〇二到一八二五年中，他又發展一種活潑的新聞記者之活動。他的觀念生成是中層階級之工業利益及他的個人人道主義之傾向的。略為觀察當時之情境，便會顯示出這種事實了。

在革命及戰爭之時代所鼓舞的富人，形成中層階級，他們是同意於拿破侖之專制主義的，自從勝利以光榮之月輪冠蓋着專制主義以來，一向都是這樣。然在莫斯科和來布色 (一八一二及一八一三年) 之不幸結局之後，中層階級却走到反抗方面去了，當拿破侖從愛爾巴 (Elba) 回到巴黎之時，在他面前的，就是一種強有力的憲法運動，對於這一種運動，他不得不讓步了。

一八一五年，拿破侖最後之失敗後，波爾邦王朝 (Bourbons) 重掌王權 (路易十八世。一八一四至一八二四年，查理十世，一八二四至一八三〇年)。他們完全忘記了

一切革命之教訓，還把貴族及僧侶，放到原日之位置上，因為這樣，中層階級便發生反叛了。從經濟上言之，牠比之一七八九年前輩更爲有力，同時，技術和工業也有了極大的進步。他們的代表更覺得他們確實操縱着國家之真正權力，而波爾邦王朝却剝奪他們的一切影響。一種反叛的資產階級必求援於卑下的階級，而且當牠自己就是人民之代表，以反對個人的君主及反動。

當時社會情形之知識的果實就是聖西門（一七六〇至一八二五年），和聖西門派，而後者在七月革命之前夜中，尤爲重要，因為當中層階級正在和波爾邦王朝尖刻地反抗之時，聖西門祇爲一個這種反叛開始之目擊者，而且曾努力把王政和資產階級之矛盾，加以調和。

聖西門教義之精要包含於一個命題之中，他以為社會之主要工作應該在於促進財富之生產，而工業主義者（製造家，專門家，農人，技術者，銀行家，商人）則在社會之

中，形成一種比貴族及僧侶更爲重要之因素，中層階級之能幹者則操持國家之統治。良好社會之生活，其偉大的影響，不在于政治的組織，而在于財產之權利。財產之要求應該以財富之增進及財產之自由爲基礎。確定財產權利之法律是一切中之最重要者；牠是一切社會構造之基礎。限定權力之劃分及規制牠的應用之法則（憲法）祇是次要的法則而已。（見聖西門之『Oeuvres』，羅德列格所輯，一八四一年巴黎版，第一卷，二四八，二五七，二五九，二六七頁）聖西門有時把財產權和財產律分別開來。他以前者爲進步的：『當人類知能進步之時，一時定立之財產律是不會永久存在的。』（二六五頁）他更進一步以爲貴族之財產是以征服，強力，爲基礎的，至于工業主義者（製造者，農人，銀行家，商人，技術家）之財產則是他們合法活動之結果。他的財產觀念，是幫助中層階級，而譴責貴族之財產，譴責朝臣之政治的要求，便連高位操權于國家及教會之中的貴人，也一併加以譴責。這種觀念之最普通的結論，便包含于一八一九年聖西門所刊行

之故事之中，因為這一個故事，他竟被人檢舉。幸得陪審官宣告無罪。他在這一個故事中，把五十個頭等的物理學家，化學家，技術家，工業主義者，航海者，商人，和藝術家之最後的喪失，與乎五十個王族，朝臣，大臣，和高級的主教之最後的喪失，加以比較。喪失了前一項，決不能夠補充，而喪失了後一項，其補充之容易，如拾草芥。所以聖西門便勸告波爾邦王朝之路易十八世，要把他自己和工業主義者聯盟，而成爲一個資產階級之君主。法國之資產階級也同時追慕這樣的一個君王，而這樣的一個君王，直到波爾邦王朝傾覆之後，一八三〇年，才由路易腓立(Louis Philippe 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王表示出來。

聖西門也侵入到哲學史去，他企圖用他的概念之光朋把過去陳示出來。關於這一層，我們于下一節中討論聖西門派時，才一併研究。同時我們又要注意聖西門之經濟觀念，其性質完全是中層階級的。而他最初對於工人之態度也是一種中層階級之態度。在

他的第一本著作『日內瓦居民書簡』(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一八〇二年)中，他把社會分爲三個階級：(1)自由階級(例如學者，藝術家，和一切有進步思想的人)；(2)資產階級，他們是不希望革新的；(3)在「平等」之下而結合的人們。他對於那些努力追求平等的工人說道：『資產階級已經得獲了統治無產階級之權力，其原因，不在於他們產業之性質，而在於他們知識優越之結果。』(見『Oeuvres』第二卷，二四，二七，四十頁)他又對工人們說道：『試看法國在爾們的同伴統治之下，會表現什麼呢！他們祇把飢餓帶來而已。』(四十頁)聖西門也想及憲法會議(一七九二到一七九四年)之時代；他不曉得當時并不是工人之統治；他也不曉得當時之飢餓，實由於耶可賓派之反對黨的工作：即是經紀人，壟斷者，謀求不正當利益者之工作。聖西門以爲憲法會議之統治是『最完全的無政府。』(一三六頁)『憲法會議毀滅了路易十六世，而路易十六世實是法國之高尙的人道主義者，他又毀滅了法國社會組織之基礎制度的君王政體。憲法會

議創製一種民主主義憲法，祇把最偉大的影響，投入於最窮乏及最無知之人們中。』(三六頁)

聖西門確實仍然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所以，他是工業主義統治之贊助者，但當他是一個啓蒙的人物時，他又狠小心來觀察工人運動了。他注意於英國工業工人在一八一〇年後，何以反叛工業主義者，毀壞機械(勞得派運動)，又於一八一六到一八一八年，從事於要求選舉權和工場保護制而鬪爭。而且，他自己本已具有一種很強有力的道德和宗教的傾向，所以便催促他注意于基督教之社會教訓；他讀過來辛之『人類的教育』，而且爲書中觀念所影響。一八一九年之後，聖西門更注意於幫助工人之必要了。在他的『工業問答』(Catechisme des Industriels)一書中，他勸告僱主注意工人，保護工人：『工業之領袖是一個天生的保護者，是工人階級之自然的領袖。一自工業之領袖禁制和工人聯合之後，工人便爲陰謀家及過激派所誘惑，而入於做成革命及奪取政權之情境中了。』

(見『Oeuvres』第一卷，二二一頁)英倫的事件就是例證。在他生活之晚年，他對於工人之良好生活，非常注意，比之其他的一切注意，都重視過；他對於這個主題之觀察陳示於在他死前印刷之新基督教 (Le nonvean Christianisme 一八二五年)一書中；新的基督教要規制勞資二方面之關係，這樣，而『最貧窮階級之分配的最可能迅速的改進，才有功效；』新的基督教從羅馬教及改正教之教條及儀式脫變出來，而且成爲社會之倫理，他的主要命題是人類相愛，四海一家。『新的基督教包含有好些部份，而其主要的部份則和那些爲歐美的各種異教宗派所特有的部份相一致。新基督教像以前的原始基督教一樣，要爲道德及公衆意見之勢力所幫助和促進。』聖西門于是又開始演說他對於富人之教訓，由是以得獲他們幫助他的教義。同時對於富人，他又把他的教訓清楚表明『并不是反對他們的到益的，貧人地位之增進，會令到富人階級之快樂生活減退起來，這祇是表面的事情罷了。我要令藝術家，學者，和大僱主們，曉得他們的利益，實和民衆之利

益，根本一致，而他們，一方面屬於勞動階級，他方面則是牠的自然領袖，並且人民對於服務之贊賞，就是他們光榮影響的唯一價值之報酬了。『他還求援於「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及其他君王及貴族：『爲基督教之名義而聯合起來，担負着利用權力之責任罷；要曉得牠要命令他們，貢獻他們的一切能力，以最迅速的時間提高貧窮人之社會機會。』

聖西門宣佈了這樣新福音之後，便過世了。若總結起來，則如下述：聖西門既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祇是一個富有倫理成見的自由主義者，他祇能夠貢獻出他的自由主義和倫理理論之符合的表現，這是因爲他的知識和他遠離金錢的追求之原故。這特別可以實施於他的財產的教義，而他的教義——從工人階級之興起和無產階級鬭爭之開始的觀察——却能夠維持一種不利於中層階級財產的解釋。而且這種教義之解釋，還爲聖西門派所影響呢。

(4) 聖西門派

有一小部份依附於聖西門教義的人，大多數都是有教育和有財富者。一八二七年之後，法國議會中之選舉投票，經已漸漸傾向於政府之反對派方面，然在更早之時，即一八二一年，巴黎之青年知識份子，經已祕密組織會社，以傾覆波爾邦王朝，建設國民之統治，而且『解放民族』。他們參加於意大利之『燒炭黨』(Carbonari)之關係裏，練習他們陰謀反叛之方法，研究法國革命及英國社會情况和理論，還且接受一切新觀念，像爲祕密組織的革命青年所嚮往的東西，他們都曉得了。這些青年人中，有聖阿孟德巴撒德(Saint-Amend Bazard 一七九一到一八三二年)，是一個邏輯而頭腦清醒的人，有巴茲斯(P. B. J. Buckoz, 一七九六到一八六五年)，他後來却努力宣傳協作之生產(要受國家之幫助)。巴撒德在一八二五年加入爲聖西門主義者；一八二九年，他讀波拿洛第之書，其

後，他就在聖西門派之會集中，演講先師的教義。他的合作者，名安芬庭 (B. P. Arfa-
nin 一七九六到一八六四年)，是一個財政機關的管理者，後來，又成爲一個鐵道的指
導員，他有高尚的想像，熱誠，偉大的能力及敏慧。和他們一同活動的有巴拉爾 (Per-
no) 兄弟，他們後來都是偉大財政機關之建設者，又有雷賽 (F. Lussols)，是蘇黎士運
河的建設者，和巴拿馬運河之初步工程的指導人。那便可以見出聖西門教義之真正精義
了：就是後來成功了工商業之自由主義；但同時，社會的情形仍佔據着前景，而聖西門
主義者仍被人當爲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及安芬庭的總集 (*Oeuvres de Saint-Simon et*
P. Arfa-nin) 便包含着聖西門派教義之光明的解釋，這解釋是由巴撒德在一八二九到一八
三〇年間所演講的。他提出聖西門的幾個基楚觀念，從而以他自己的研究及經驗，爲之
發展，並且把牠混合於一個同性質的系統內。那種系統之基礎特性，如下所述：

聖西門以爲在人類歷史中，有機的和批評的時代，互相交替。前者之特性是思想及

「信仰之統一」，一種社會利益之聯合；這些時代就是：希臘，以紀元前五世紀爲止，在那個時候，汎神主義之支配是沒有疑問的；更進一步則爲中世紀，直到路得出現時爲止，在那個時候，羅馬教成了精神的一致性。有機的時代之後就是批評之時代，在這個時候，思想統一性分解了，社會的矛盾發生起來；像紀元前五世紀後之希臘，各種哲學系統，一時併生。至於在中世紀，則批評時代以宗教改革而開始，同時顯現的是各種思想和革命之系統，而繼續着批評的時代之後者，又是有機時代了。開始這個新時代的是聖西門之使命，他在『新基督教』一書中已加解釋。牠要把爲路得所引進的批評時代，加以結束了。

巴撒德根據着這種思想之歷程，宣言這種有機時代和批評時代之交替，其特性實爲聯合之原到及衝突之原則。但衝突和矛盾是一時的而且是第二義的性質，而人類之最主要的努力及歷史之最主要的法律就是聯合。各個家族及都市之衝突和鬥爭，其目的是想

在一種信仰，一種精神統一性之皇國下，同一的民族鑄合起來。人類現在就努力造成一個偉大，普遍，和有機之聯合。在其中，仁愛，知識，及財富，都會加增。

衝突和抗爭常常以物質力量之優勢為原因，這樣便令人與人之互相剝削了。不過這種力量之效果常常是柔弱無力的；而這種柔弱無力的歷程，是從舊日的奴隸變形而為今日之勞工這一種進步，顯現出來。這種漸進的階段是：奴隸，農奴，工錢勞動者。在這一串的進程中，便可見人類剝削人類之逐漸減少了。

奴隸是屬於主人的，而農奴則有多少自由，至于近代之工人則政治完全自由了。然而他們仍欠缺了經濟之自由，在經濟方面，仍存倚賴之性質。這種進步又見于社會聯合之增長，可惜這種增長仍為財產之傳統法律的堅持所阻礙，牠令到所有主不用勞動，便能舒服的生活，而且統治他人。至少，牠必說『財產是全個政治秩序之基楚。至于我們聖西門派則一般地也同意于這種說法，不過以為財產祇是一種社會的事實，隨從着進步

律之社會事實。所以財產這一種東西，其認識，其定義，其規制，都因着各個時代而有不同。『卷四十一，二二一頁』亨利茲海因(Heinrich Heine)在前一世紀的三十年中，曾經把這種運動，由他寄給『Augsburg Allgemeine Zeitung』的巴黎通信裏，通知德國人，譏諷的說：『聖西門派並不想消滅私產，不過規定牠的不存在而已。』

然而聖西門派仍主張消滅承襲權。『已死之人之財產應該交給國家，而國家實是一個活動勞工者的大聯合。全體國民有承襲權，並不關於他的家族。子女所有之特權會損害很多娛樂及休息，所以應該完全廢止。』(二四三頁)爲什麼單是一個父親之子或某人之親屬便可以得獲財富呢？完全之財產權是由于產生財產之能力。在一個聯合的國家中，在活動的勞動者之聯合中，每一個人都接着他的能力，而得獲一個地位，而其工值則按其工作而定。國家變而爲一個經濟之統治，在國家之上，則爲一個最良好最有效的統治者；恰像今日，我們有軍事學校，以訓練有能力的軍官一樣，在這一聯合的國家

中也有訓練工業領袖之學校。這些領袖之工作要包含着管理國家之計劃，按據各人之能力而分配工作，給以相當之位置；而且接着他們的服務而報償他們之功績。經濟之進程必須規定，其規定不用民主的方法，而用一種僧侶式的組織統治。祇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消滅懶惰，工作過勞，貧乏，人類剝削他人，和奴隸之遺跡，方能建設一個新的有機的時代——社會和諧之時代。

近代工人已有政治上之自由了，但同時也當爲經濟之自由而努力。不過這不須用武力革命之方法。「聖西門教義之目的，不在於「打倒」，不在於革命；牠的目的在於變形，在於進化——牠提供這個世界以一種新的教育，一種徹底的重生。」（二七九頁）從古迄今，偉大的變遷總採取武力和災禍之性質，這是因爲人們不曉得進步法律的原故。因爲愚昧，所以便把進化變爲革命。現在呢，人類曉得牠是正在進步之中，而且又曉得社會危機之法則；其結果，則牠自然會很容易爲變形之預備，而避免強力之襲擊了。

「我們所宣示的社會組織之變遷——我們以為現在的財產制度必會讓渡給一種非常不同的財產制度——既不為驟然的故事所影響，也不為強力所影響，牠要由一種和平而漸進的過渡的方法。」（二八一頁）在聖西門派的聯合國家之中，最高的社會階級則為宗教家（新基督教之宣教者）；第二個階級則為自然科學家；第三則為工業主義者。道德和宗教之熱誠，清楚的觀察，訓練過的理性，和有效工業的專門技術，便會把人類，加以解放。（卷四十二，二八八頁以下）

巴撒德的這些演講引起了很多人之興趣，而且特別適合于吸引知識階級，藝術家，和仁慈的自由派之注意。

可惜聖西門派中不久便分離起來，由是便不能夠有更進一步的宣傳。安芬庭和巴撒德及羅德列格相衝突，于是便走入於傅立葉主義者對於婦人解放之觀念的影響之下，還且想把自由戀愛之原則，接駁於聖西門主義之身上。對於這一種企圖，很多會員都表示

反對。由此，安芬庭及其徒衆便退隱於曼尼爾門登德 (Montmartre) 的地方，在那裏，他有一個時候，便爲他的團體中之一個社會的首領而生活着。聖西門主義便不能成爲一種運動了，不過牠遺贈給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社會革命運動，以一種很豐富的社會學及經濟之觀念，而這些觀念，後來竟繼續運用了一個長久的時間。

第八章 英國勞動運動之發端

——一七九二到一八二四年——

(1) 法國革命之影響

在這個經濟，政治，和社會批評的騷動時代之中葉，由於法國革命之暴發而為更進一步的驚駭，而第一次的民主主義和反政治的勞工運動，却發生於大不列顛。牠的創始人為「一個蘇格蘭的靴鞋匠。名多瑪斯赫爾地(Thomas Hardy, 一七五二到一八三二年)，他在一七七二年居住於倫敦，在那裏，他吸受了民主主義的觀念之空氣。到一七九一年之末，他建設了一個工人階級的社會，名為「倫敦通信會社」(The London Correspondence Society, 簡稱L. C. S.)，還且和法國耶可賓黨通消息。同樣的組織，也發生於沙菲

爾 (Sheffield)，加凡德利 (Coventry)，列茲 (Leeds)，諾廷咸 (Nottingham)，諾威茲 (Norwich) 和愛丁堡 (Edinburgh)。牠們用通信的方法，互相接觸，而其名稱則爲「通信會社」。政治的社會，才被禁止形成一個同盟；所以便用各個會員信札之交換，以維持牠們相互之消息。這種社會之原理是民主主義及勞工之保護法規。這個團體之宣言在一七九二年印刷出來，有如下之敘述：

『自由是人類之生得權；我們的責任是熱誠地擁護牠，不爲人所破壞，這爲的是我們的同國人及我們的後代之利益。公民應有參加政府之權力；倘沒有這種權力，便沒有一個人能自稱是自由的了。』

大部份大不列顛的人民未有議會中之代表，也不得參加於任何政府之部份。專制，不平，不適當的選舉權，和腐敗的推選之結果，是：重壓的稅收，不公道的法律，自由之限制，和國家財富之虛耗。這些罪惡之唯一挽救法，就是議會中人民之平等，普遍，

和公正之代表制度。倫敦通信會社即決定爲這個目的而努力，但牠却非難一切武力和無政府之狀態，牠的武器是合理的信仰，決定，和統一性。」

一七九二年九月之末，法國宣佈是一個共和國了，倫敦通信會社即以下述的頌詞，送到法國的巴黎國會去：

「法蘭西人啊！爾們現在是自由了，而我們則正在爲大不列顛自由之勝利而武裝起來。爾們享受自由之前驅者的最堪妒羨的光榮，而我們也仰望着前面的人類所積蓄之福祉。我們熱望爾們，假如爾們得達了最後之光榮，則一種三角同盟便會出現起來，這種同盟不是由於君王，而是由於美，法，英三國的人民，他們把自由帶到歐洲各國，把和平帶到全個世界。」

重要的民主主義派政治家便加入於倫敦通信會社。斯賓斯爲牠的工作非常熱烈；而葛德文之『政治的正義』(Political Justice)，一自印刷之後，即爲勞動團體的各個會員所

誦讀。會員增進極速，令到當時那個在一七九三年以後，和法國開仗的英國政府，對於這一個會社，注意起來，捕拿牠的領袖，控告以大逆不道之罪名。他們多數都以無罪而釋放。但組織却繼續不斷地備受迫害，大抵在一七九九年，便消滅了。在一八一〇到一一八二〇年間立在前綫之許多勞工領袖，從前都是接受過倫敦通信會社之教育的。

(2) 拉底德派

很多不同的份子都被吸收於近代無產階級之形成的歷程中：例如工銀勞動者，家內勞動者，無產業的農民，手工工人，和工場勞動者，他們的運命為經濟革命之結果，分別影響，并不相同。這些部份中，很多倒向後頭，回顧行會之時代；而又有些，則為革命的，為民主主義，社會改造，土地公有的社會主義之改造而鬥爭；然而大多數之態度總是憎恨僱主和整個的工場的制度。大不列顛之勞動階級則首先投入於經濟之歷程和為

資本主義制度所利用的生活之樣式中，而十九世紀之最良好的思想則努力于解開這種困難。在工業革命之初期，完全為騷動所支配，其中，高聳着新的機械，像由異邦走來的怪物一樣，吸引很多驚奇注視者之注意。

一個人為科學及技術之奇異所包圍，為各種機械所包圍，而機械當為日常之現象及應用之品物，因為牠們在十九世紀時便已存在，這樣的一個二十世紀的人很難想像在機械發現初期之第一次犧牲者的情緒。就在十九世紀之中葉，還有有教育之英國人，把機械當為人類知識力之病害的產品，而且是英倫墮落之象徵。他們總喜歡引用培根之格言，以為戰爭之技術繁榮於國家之幼年時代，國家之成年時代，則為學術之繁榮，後來，二者便同時繁榮，過一個很長的時代；但工藝之技術，工業和商業，則在國家墮落之時代，方才興盛起來。所以『憲章主義』(Chartists)之中央機關，便寫出下述的話：

『在現代，很少人胆敢討論機械之問題，牠似乎是令人有某一種恐怖的；每一個人

都看出牠怎樣影響一切偉大的革命，各個階級之關係，完全變遷，然而總沒有一個人胆敢加以干涉。』

自從十六世紀後手工人和工場工人所經已恐怖的東西，到十八世紀之後半葉，便來襲擊他們了：一種鐵魔之攻擊很快便把久被遵守的習尚，排擠而去，麻痺大多數精巧的人手，把貧富加以清楚的劃分。無產階級以其恐怖和驚異，沉沒於貧窮之深坑中，注視着這種無休息而像鯨魚一樣的生物，牠還似賦有不朽的能力，於是他們的口中，便靜默地互相傳語：讓我們聯合起來，把牠們搗毀，令到牠們的數目減少，而且還在於幼稚時代罷。假如我們讓牠增加，和無防害地擴展起來，則牠們將來必成絕對之主人，而我們却是牠們的奴隸了。

第一條禁止搗毀機械之法律，在一七六九年之英國，通過了。牠承認這種行為是一種罪惡，可以死刑懲治之。所以工業革命之開始便影響到政治對於機械價值之觀念的

變形。雖然有這種「德拉古」的(Draconian，爲紀元前六二一年之雅典法官，曾編製著名苛酷之法典，後來即以他代替嚴刑峻法了——譯註) 苛例，然而北部及中部之英倫，仍繼續有毀壞機械之事情發現。在諾廷咸，有個名內德拉底(Ned Lud，或名Ned Ludham者，專以搗毀製襪機著名。他的行爲在蘭加斯耳，有很多的仿效者，所以破壞機器之人，逐漸便稱爲拉底德黨(Luddites)。

一八一—及一八一二年，拉底德主義成爲一種羣衆運動，這種運動追求的是政治和經濟之目標。統治階級，看見這種拉底德黨之暴發，竟達到這個程度，便震驚起來，於是政府便引用破壞機器者處以死刑之法案。但在貴族院(即英國之上議院)之二讀會中，爵士拜倫(Lord Byron)對於這種法案，有一番深沉之演說，他是偏袒於勞工方面的，其時在一八一二年之二月也。

但一八一二年三月這種法案，率成爲法律，不過牠證明一七六九之法令是不可實

行的，牠是一種嚴峻的德拉古之法律強制而已。然在好幾處地方，人民之破壞機器及工場者，都置之死地，不過牠也證明非常困難以發現這種嫌疑人。所以祇有懸大量金錢以購取拉底德黨首領之頭顱，他們的密謀，才被洩漏。然而也祇在約克阿西西斯（York Assizes）的地方，把拉底德黨處以死刑。一八一三年正月十三日，三個勞動者，走上了斷頭台，其中有一個是拉底德黨之首領，名佐治馬拉爾（George Mellor）。他們臨難從容，不改常度；而馬拉爾還在斷頭台上，對羣衆說了一篇簡短的演說。在一八一三的年報中，報告處決他們的情形，說馬拉爾和其被難之跟從者，真不像一個殘殺者，若在他的情境中，他們必是正直的人。三天之後，又有十五工人被定死罪，午前殺七個，午後殺八個。這樣的嚴刑及迫害，才把拉底德黨解散，然而後來，牠又逐漸回復起來，在一八一六年，拉底德運動，其基礎成爲重要的革命運動，再次騷動起來了。拜倫在這種運動中，對於拉底德黨表示敬重，一八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做了一首拉底德黨

之歌，把他們和美國獨立戰爭之人們相比較。

(3) 狂飈時代

拿破侖戰爭之結束在一八一五年。英倫數十年來所未聞之外表的和平，回復到地上來了，但是所歡迎之烟火，却把殘忍之燈光，扔在艱難，貧苦，反叛，陰謀，和示威運動之舞台上。社會情境的改造之希望，終竟無由實現。微小的金錢工值，高昂的物價，失業，和重稅，政治及經濟之嚴苛（地主統治和反聯合的法律），合到平民之不平，達於最高的頂點。一八一六年後，英倫已入於反叛之狀態了，牠爲警察挑撥所激動，而採取無效的謀叛，其中自然少不了許多犧牲，在各省區都像在倫敦一樣。一八一六年拉底德主義死灰復燃；在諾廷咸的織襪者搗毀了三十具機械；在英倫東部之鄉村中，農耕勞作者燃燒着稻草堆；毀壞了打穀機，舉着「麵包或鮮血」的口號之標幟，巡行示威。在伯明

漢(Birmingham)，伯拉斯東(Preston)，和紐加德爾(Newcastle)，失業羣衆，也結隊巡行；在鄧德(Dundee)和格拉斯哥(Glasgow)，還與兵士發生流血的之衝突。在中部之英倫，也有反叛之企圖，其組織是祕密的，發現之後，便把其中有關係之二十三人，或犧牲了生命，或喪失了自由。一八一九年，實是爲成人參政及社會改革之原故，而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大示威運動之年，兵士向巡行羣衆開火，殺傷了好幾百人。一八二〇年，倫敦又有反叛之準備，後來，殺了五個參加者，方才結束。在重要的革命運動之這四個年頭間，雪梨(Shelley)作出了他的『工人進行曲』(Workers Marseillaise)……

『告英國人』

英國人啊，爲什麼

替那些把爾們打倒的地主耕地呢？

爲什麼勞苦而小心地

替爾們的暴君織就穿着的華衣呢？

由搖籃到墳墓，

這些不知感謝的雄蜂，祇會嗡嗡然

竭盡爾們的汗珠——不啊，飲盡爾們的鮮血，

爾們爲什麼尙衣他，食他，而且令他們舒服呢？

英國之蜜蜂啊，爲什麼讓他鎔造

許多武器，桎梏，和鞭子呢？

這些無針的雄蜂，

總要毀壞爾們勞作之產品！

爾們有休息，安樂，和舒服，

居宅，食物，愛情之溫柔的安慰麼？

或者爲什麼爾們的買受，用了

爾們的痛苦和恐怖這樣的高價呢？

爾們播散了種子，他人收穫；

爾們尋求了財富，他人保管；

爾們製造的衣服，爲他人所穿；

爾們鎔鑄的武器，却爲他人所攜帶。

播散種子罷——但不要爲暴君所收穫；
尋求財富罷——不要爲欺騙者所享有；
製造衣服罷——不要爲懶惰者所服用；
鑄鑄兵器罷——要爲保護你自己而攜帶着。

(4) 羅拔奧文

英吉利近代社會主義史以奧文開始。他又是一般社會主義歷史中之一個最偉大的人物。他最初是一個社會改造者，但他比之一切中層階級的經濟學者及政治家，却早早把捉着經濟革命之重要點了，當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之時，他追求在社會進步的服務中社會主義成功之手段。他的個人性質比之傅立葉和聖西門都崇高過，而且他又比之他們，

更能深入資本主義之核心；然而他都被他們之歷史的知識及普通的觀察能力所超越過。

羅拔奧文(Robert Owen)，一七七一年，生於威爾士之紐陶(Newtown)的一個低級的中層階級家庭中。他的父親是一個馬鞍匠，賣鐵商，和郵局長。他在鄉村讀書，直到一七八一年；在學校中，他已才能出衆。後來，他在斯坦佛(Stawford)，倫敦和曼徹斯德等地方，爲學徒，爲助手。在他早年的時代，他已表現有組織之天才，尤其是他領導他人之天稟。他的強有力而簡朴的知力，完美的體格康健和性情，常常受理性之統治，由於這些特點，其結果便是不可破壞的，有能力的，和目的正常的決志，而且又堅於自信 and 當機立決，這樣便令他成爲人類之領袖了。奧文是一個狠希有的天才的人，他的心能之過程，其進展並沒有偉大的衝突和騷動的移轉，所以他對於動力神經之命令，非常清楚而堅定，并不荒廢時間。這種人若爲正當的社會學觀念所領導，則以其組織之能力，狼易成爲偉大的將官，著名的政治家，和成功的革命者。一七九〇年，奧文成爲曼

徹斯德紡織工場之監督，該工場合共有五百工人。他雖是一個穿着平常衣服的少年人，但在他的統治之下的工人，很快便接受了他的影響，雖然該工場中之工人仍是由於人民中之最低級和最敗壞德性的部份所招來的。他的年薪爲三百磅，而他又可以得獲在一種很好利益的企業中，成爲一個股東之希望。但他仍然居於舊位，直到一七九五年；到那個時期，他開始營業了。工業革命之創造的波瀾，把財富和尊榮，帶到那些曉得怎樣利用時機之商界，但又把那些不能夠利用機會之人，推之於深淵。奧文看得清楚，捉得着實，而且克勝這個時機：他毫不猶疑，決定按照着他自己的計劃，而經營製造業，他投身於美好之紡績經營，在其中，得獲大利。他的商業發展至速，在一七九七年那麼早，他已得獲了好幾個同志，以六萬磅之價值，在新蘭勒基（New Lanark）的地方，達爾（Dale）和阿奇力德（Arkwright）之商店，買收了一個紡織工場，在那裏，他開始他的前驅的社會改革之活動，後來因爲他的營業之勝利，他便成爲當時著名人物之一名。在一

八〇〇年，他得了工場之完全統治權，同時便影響到新蘭勒基之工場鄉村，得了一種社會的重生，在那裏，他不獨產生美好之棉紗，還且護養着健康和快樂之人民，與乎高貴之性質。

奧文在新蘭勒基地方所引用之基礎改造，得了預期之勝利的注意，其條目如下所述：

(1) 他建設了嬰孩護養院，其訓練之方法則以觀察為基礎；他消滅了賞罰之制度；男童要受體育之訓練，女童要受家政之訓練。

(2) 十歲以下之兒童不准作工於工廠。他又決定每天工時為十時半。

(3) 工場之房舍按照着寬敞而衛生的方法而建築；他同時在工場鄉村之中，引用清潔之方法，並且教訓村中之居民以清潔，秩序，及守時之習慣。建設合作社，內中以最廉之價值，售賣各種良好的商品，又工人在衛生房舍及工場之中，都得有體魄和知識之

康強，所以酒店便失了牠的吸引力了。工人禁戒酒精之享用，醉酒和牠的敗壞德性的影響，都消滅了。

(4) 病疾和養老之補助金，早經設備；一八〇六年，當一種商業危機暴發，和很多失業產生之時，奧文以工資供給失業者，直到危機已過為止。

奧文之改造的全部計劃，其基礎觀念，以為罪惡祇能夠在罪惡之根源經已停止之後，方才消滅。在這種之情境中，人類生活之樣式，應該發展一切為人類所內含的善良性質。

因為人性完全倚賴於環境，而環境是他所由生產，所由過活，和所由工作的。所以問題便是怎樣形成一個環境——性質形成之因素——令人類會成為德性，而情感和工作都成為一種社會的生物。

一八一二年以後，奧文又從事於教育之改造和工場之法規，在公共場所中演說；他

同時又成爲一個自由思想者，而在一八一七年，更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了。他以爲救濟貧窮律應該廢棄，他主張爲失業者計，要設立農業及工業之移民地，後來，他又勸工人羣衆，自己組織生產協作社，不單爲他們自己之用，還要轉向於爲一切人之福祉，而技術之發明在資本統治之下，實是反對他們的一種咒詛。工人地位惡化之原因，與乎失業及倚賴的增加之原因，他以爲完全因爲機械的增加，並無前例，於是令到財富漸歸於富人，而無產者，祇有失業及工銀之低減，把他們的妻兒驅到工場去。在一八一八到一八二二年間，他在報紙之論文中，小冊子中，和政府之報告中，總宣傳下述的意見：

在一七九〇年以前，即是說在工業革命深切地影響到英國經濟生活之前，生產之工人祇由成人去充當；未成長的幼童和婦人，準備着加入系統工業之工銀勞動中，非常少見。大概在一七九二年，約有四份之一的人口從事生產。大不列顛和愛爾蘭之人口，總數約爲一千五百萬名，所以從事生產的，約在三百七十五萬左右。當時的科學（數學

及化學）生產力大概爲手工工作的生產力之三倍；這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萬，而若統計全部生產力則爲一千五百萬。所以生產力之數目和人口之數目是對等的。生產力和人口之比，爲一對一。

此後，機械發明之急速實施之時期來到了，一七六〇年以來，即已攻襲生產的勞動力，後來便逐部份地克勝了。牠們所帶來之變遷是非常的。牠把婦工和童工充斥於工場之中，工作之時日，也拖長起來。生產力數目之增加是非常多的。一八一七年，不列顛各島的人口，達到一千八百萬，其三分之一，則爲六百萬，這個數目是訓練過的生產勞動力了。同時機械生產力之增加極大，牠們在現在（一八一七年），即在最低之統計，也有二萬萬了。這些鋼鐵般的工人之二萬萬個單位的勞動力，不歇的，系統的，和無價值的從事於財富之創造。這就是說，每一個不列顛人，用十倍以上的勞動力，不分晝夜，生產各種財富；而每一個人類的勞動者，爲他的生存的原故，要和超過三十倍的面又不

須休息的機械競爭者相鬥爭。以三十對一！在一七九二年到一八一七年間，不列顛各島之經濟情形，有如下述之變遷！

人口增加由一千五百萬到

一千八百萬

手作勞動之增加，由一千五百萬之四份一到一千八百萬之三份一

六百萬

機械生產單位之增加

二萬萬

舊式機械生產單位之總數

一千一百二十五萬

一八一七年生產單位之總數

二萬一千七百二十五萬

所以在一八一七年，生產單位多過不列顛人口之十二倍。即是說，一七九二年之後不列顛創造財富之權已增加了十二倍。不列顛可以用戰爭及其他無用之方法，以荒廢這種多餘之財富，也可以利用牠以推進人口情形之改進。而這種財富，不列顛政府曾用之於無益的戰爭者幾乎一個世紀，還且用之以打倒拿破侖呢。

然而不列顛生產力之過度的增進，比之可以利用之機會，還不覺得重要。國家仍舊包含有未用之資本，及用而不當的資本，而這些資本倘若加以運用，儘可以一年一年地發展生產力，而遠勝於手工勞作之同等力量。人口雖不足二千萬，而且生產力也祇爲盲目的自利所領導，然而不列顛總可以滿足她自己的市場，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用各種工場之商品，充塞於世界市場去，所以不列顛政府總熱烈地去開闢新的市場，就在遙遠的國家，也都一樣；假若牠可以促進一個新的世界發現起來，則不列顛之工業，至少也不會防礙新要求之滿足的。

然而貧人哀求救濟，總是徒勞；社會中之各個階級，都沉入於貧窮之境域內；手工作（工資）之價值低落；窮人滿懷憎恨，而且想借助於武力；在可怖之境域中的仁慈的握手，並不可以援拯他們。事實上，他們也決不能用從古迄今的方法而得解放；這些方法祇是把他們的痛苦更爲增加，更爲深刻而已。因爲牠就是科學之進步，機械生產力之增

加，和造成這些情境的財富之增進，而且財富之增進，還會繼續着創造牠們，在各種流行之情境之下。然則羣衆之貧乏和一般貧乏之情境，其原因何在呢？其原因實在於新生產力之急速增加，而這樣的社會之有利的實施，却完全沒有準備；社會沒有設立各種制度，令一切份子都有一個機會，在新的科學及經濟之成功的利益中，有分配之權利。

所以我們現在之大問題並不潛伏於生產之範圍，而實潛伏於分配之範圍。爲財富正當利用的迅速的充溢及繁富之波動，還沒有造成各種的準備；知識之豐富仍未利用——這些就是罪惡之真因了。由是而有貧窮，愚昧，懶惰，犯罪，嚴苛的刑罰，和流血的鬥爭——這都是道德和物質不健全的社會情境之徵象。沒有一個政治經濟學家，政治家，精神的教師，和立法家，表現出他們真能認識這種事情之實況，而且實施一種徹底的挽救方法。

由此言之，奧文實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註一）但當觀察工人羣衆之退步之時，他還

未相信他們的階級鬥爭和解放，而且他的自由思想還教他，欲想幫助他們，必不能出于鬥爭，還是要用教育之啓蒙，和平和地變遷這種情況，于是他又跳入烏托邦主義之中了，他的希望，便完全在于社會主義移民地之基礎。一八二十年，他辭謝了他的職業生活，在美洲和英倫，建設好些社會主義移民地，但一切的結果，都是失敗的。于是他對于正當的勞動運動，便撒手不幹，然而勞動運動在一八二二年以後——在反對結合法律之取消之後——經已合併于一種階級鬥爭之中。牠採取了奧文之社會批評和合作原理，後來，還設立了合作的會社。

（註一）「社會主義」一個名詞，初現于一八二七年之「合作雜誌」中。

（5） 孔伯，格雷，湯普孫，摩爾根，伯雷

阿伯蘭孔伯 (Abram Combe 一七八五到一八二七年) 完全在奧文影響之下。一八二

七年，他探訪新蘭勒基，像其他的萬萬千千人一樣，馬上便接受了奧文的觀念。三年後，他印刷了一本趣味的小冊子：『新舊制度之隱喻的描寫』(Metaphorical Sketches of the Old and the New System)，一八二五年，他在格拉斯哥之附近，設立了一個俄爾卑斯頓(Orbiston)的社會主義新村，在那裏，他努力奮鬥過度，至于死亡。他之死後，他的社會主義創造品，瓜分瓦解了。

約翰格雷(John Gray 一七九八到一八五〇年)是孔伯的好友，而且是俄爾卑斯頓新村之股東，他的改造之主張，以為須經過交換和流通之中介。他少時讀書于立普頓(Leipton)之小學，後在倫敦，跟一商人為學徒，在那裏，他看見一八一六到一八二十年間的貧窮狀況，因而刺激起他的社會批評之觀念。一八二五年，他印刷一本小冊子：『人類幸福之講演』(Lecture on Human Happiness)，全書內容，幾乎完全根據奧文觀念之精神，內中還含有一張統計表，他以數學表明生產階級祇得獲他們努力所產生的物品

之價值之五份之一，而五份之四却走入了非生產階級之荷包中。競爭不獨停止各種利益之生產，還且努力產生一種直接的不公道的效果。格雷尊敬奧文之計劃，而在他的小冊子之終，更加以下述的宣言：在後一個講演中，我們會努力解明別幾種在合理的資本基礎上面之安排，由於其引用之方法，則我們財富之唯一限制，就是我們生產力之耗盡和我們要求之滿足。」

他所應許之論文，在一八三一年印出，名『社會系統』(The Social System)，社會改造之全部，集中於交易之過程中。他改造計劃之顯著特點，如下所述：

『貴金屬之標準應該完全消滅。為交換中介物之金錢應該是易於接近和易於得獲，像牠為交換中介所服務的物品一樣；而且當牠是價值之一種標準時，黃金應該常常不變，像一碼和一磅的衡量一樣。然而黃金既不易得，其價值又不恆定，所以黃金實不適宜於充當交換之中介和價值之標準。黃金之標準如此，紙幣之標準亦然，因為他們都祇

是價值之代表；牠們以抵押品而流行，在其集合之時候，便比金錢所賦與牠的價值更多。其結果，即我們常常爲交換手段之一種缺乏而感受痛苦，因爲後者缺少了等待交換的貨物總量而跌落了。欲想完成這種目的，金錢之自身應該沒有交換之價值，而祇表現是一種收條，證明持有收條者經已爲國家財富，增加了若干價值，所以便無論何時，總可以憑票到國家財富的總機關，領受同價的物品。交換制度決不可以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及競爭情境內實行，牠要有系統之組織。格雷在第一種著作中所提出的合作原理，要完全限制於交易之範圍中。在這一點中，他和奧文，便有極大的分別了。按格雷所說，物品之生產還保留有私人企業之性質。祇當物品經已造好，方用中央的合作組織爲之交換。因爲這種原故，便要設立一個國家銀行，擁有製造收條的完全權力。而且還要建築好些貨倉，這些貨倉在代理者統治之下，和國家銀行有密切之接觸，貨倉從銀行領受收條，而且把物品之減退及充斥報告給國家銀行。各種生產者把他們造好的物品，帶到國

家之貨倉，授給委任之估價人規定這些物品（粗糙原料品，跌價和勞動的費用）之價值，還且要加增某一種利益的成數，以補償各種地租，利益，貯存之跌價，意外和稅收等耗費，而這種成數則由商務會議決定之。價值加以利益便成爲物品之零售的價值。於是生產者領取收條，其價值是和他所帶到貨倉的物品總值相對當，他憑着這張收條，可以到別個貨倉中，領受他所必須之物品。用這種方法，流通的紙幣（收條）便可以常常和現存物品之數量相對當了；而生產者也可以常常把我們的造成物品和他們所必須的東西，爲同樣價值之交換，他們又可以維持着供給和需求之管理了。國家銀行之報告書在無論那個時候，都可以表示現存物品之比對，如是便可以避免生產過多及各種危機。在這種進程中，生產佔有主要的地位；一個人生產較多，則他所得亦較多，可以滿足他的多倍的需要。生產決定要求，并不像今日一樣，以要求爲生產之限度。

格雷事業之開始，是一個奧文主義的無意之說明者，然其終局，竟爲私有生產之贊

助人，他是實利主義教條之戰士，奧文之反抗者，但同時有一個人，和格雷適相反對，這就是威廉湯普孫 (William Thompson, 生於一七八五年，死於一八三三年)，他開始研究的是社會問題，但很快便發展而為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而且是奧文主義之理論的說明者。他研究的最初果實就是他的包羅宏富的著作「最能扶助人類幸福的財富分配原理之研究」『*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這一本書表出他的猶豫不決之痕跡，與乎他痛楚地努力以滿足他的科學之認識。在一八二五年又編成一本小書，名『勞動的報酬』(Labour Rewarded)，後二年才加以印刷，祇有這一本小書，方是完全奧文化的。

他是一個邊沁 (Bentham) 的學生，所以他相信快樂是社會之目的，而物品之生產形成快樂之基礎條件，財產之安存則為生產物品之動機。若沒有物品之生產，則人類要求和希望之滿足是不可想像的，但若沒有財產之安存，則勞動生產品之增加，却是不會成

爲問題的。

現在，工業革命已指出生產品之自身不能夠產生快樂了。快樂不獨倚賴於生產，尤要倚賴於經濟物品的最公平而可能的分配，然而這在今日，是欠缺的。雖然工人造成財富，而資本家却仍截留最大的部份，這樣，便發生最大的不平等和不安甯，由是便破壞了快樂之原理。全個社會之境是惡劣而不公正的。在財產和快樂之安存欠缺的地方，財富之生產是不能夠增加的。所以假如安存和平等是財富繼續生產及最大限度快樂的確證方法，那便除了公平的高尙單純性外，便沒有別種分配之留遺了：所謂公平的高尙單純性，就是每一個人應該在他的勞動生產品全部的自由處分中，有所保證。而且，這就是工人所提出之要求。他們的時間，勞苦地應用，他們的體力及知力努力地造成對象物，由是以增加他們自己的舒適，他們現在便要求享有他們勞力所做成功的產業。然而勞動者應該收受一切，而安置生產手段之資本家便不應該有所收受麼？湯普孫答道：

「自然，勞動者應該爲這些手段之應用而償其價值，當他不幸而不能夠擁有這些手段之時；所以現在之問題，就是勞動生產品應該爲這些應用而減去多少呢。

這種應用的價值，表現出兩種標準：其一是勞動者之標準，其二是資本家之標準。勞動者之標準即存在於這些總量之貢獻中，牠會補償在生產中所消費的資本之虛耗，而且還會增加牠的所有主和監督人之報酬，供給他有和最活動僱傭的生產勞動者以同等之安樂。至於資本家之標準則在其反面，他是應用機械和其他資本之結果，便用同數目之勞動，也可產生更多的價值，而這些剩餘價值之總數，則由資本家以其高尚之技巧和知力，把資本及其應用，增加及擴進於勞動者中，但其結果，總是據爲己有。根據這兩種不同之標準，則勞動者爲增進他的生產力所必須的資本應用而交給的總量之分別是非常巨大的。這種分別是介於財富及貧窮兩者之幾乎完全平等及過份之內。換一句說。根據前一個標準，則貧富幾乎完全平等，而根據後一種標準，則富者過剩而貧人感受欠缺

了。

約翰曼德爾摩爾根 (John Winter Morgan 一七八二到一八五四年) 是一個基督教奧文主義者，他也值得有一個簡單的提說。一八二六年，他印刷了「蜜蜂之反叛」(Revolt of Bees) 一書，而在一八三八年，又印刷「十九世紀中之罕謨登」(罕謨登為英國大政治家，生於一五九四年，死於一六四三年——譯註)『Hampt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他在這一本書中，宣傳奧文主義，書用問答體，文字美麗，富有詩意，故為當時有教育之工人所悅讀。

然而奧文主義之最良好而最決定的解釋則為伯雷 (J. F. Bray) 之工作，他是列茲 (Leeds) 地方的一個排字工人，他的解釋具載於他的一本光輝燦爛的書，名「勞動之錯誤」(Labour's Wrongs) 中 (一八三九年)。

(6) 個人主義的社會改良家：歷文斯頓，霍斯堅

我們現在要從個人主義之觀點，攷察社會批判之派別了，這種個人主義之社會批評實和社會主義之批評，循着平行線而前進。雖然牠也強烈地反對資本主義，但這些批評家是不能夠達到社會主義之結論的。

他們在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中，見出了一種社會生活的疾病和無秩序的情境，而工業革命經已把牠提升到工人勞力的剝削者之地位。這些批評家之挽救方法，是一種社會改良，其目的在於建設一個獨立農耕和工業勞動的社會，還且令到資本家剝削勞動工業之產品，成爲不可能。其結果，他們反對地租，反對資本主義之利益，反對專制，反對責任及高稅，反對一般國家的建設工作及衡量。從其遠矚點觀之，他們或是自由商業的自由主義者，或是無政府主義者，然而他們總是反對社會主義之戰術和對象的，他們所

有的，祇是對於社會之批判的態度。他們出發點是洛克，阿當斯密，和李嘉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葛德文；他們一切的意見，總以為規定的法律，必屬於人類或自然，假若國家之法律，或人為之規制不妨害自然律之自由運用，牠自會帶領人類到快樂去。

這種派別之知識領袖為歷文斯頓 (Percy Ravenstone)；他的門生則為霍斯堅 (Thomas Hodgskin)。同樣的思潮又可以在一八二〇到一八三〇年的其他著作家中，找出來，這些著作家大多數匿名投稿於各種進步的雜誌。在這些匿名的政論家中，有一個為馬克司所發見，而且名之為『小冊子著作者』。歷文斯頓之主要著作名『關於政治經濟學上一般通行意見之正確性的幾種攷察』 (A Few Doubts as to the Correctness of Some Opinions Generally Entertained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出現之時期為一八二一年。三年之後，他印刷了一本關於公債制度的小冊子，這個問題曾為馬克司所討論過 (見『Theorien neber Mehrwert』卷三)。他是一個尖刻而博學的研究者。他以為

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生活之科學是異名同實的。這種科學之目的應該在於人類幸福之建設，而不在于犧牲勞動階級以集積個人財富。他的教義之精要可以歸結如下數語：

社會之基礎力量是人類及物品之生產。這是一種自然律，為人類所努力增加，和自然以能力供給人類，使以勞動而護他們的生活。人口之增加令到生產，物料，知識之資源，也一同增加，而且因為牠們增加之原故，還領導社會構造之改變。倘若把這些基礎力量好好地運用，則人口之增加常常表示着財富之加增和幸福之實現——社會之正當目的，即在於此。因為祇有人口之增加才能夠有一種普遍之分工，而分工才可以令到人類根據效益之路向為財富生產之組織，并且以動機，經驗，和閒暇的時日，給發明家和科學家，以成功他們的觀念。所謂發明并不是幾個因此得名的人物之功勞，而實是人類或國家之集合勞動的產品。但是人類之基礎力量是為某幾種社會組織所妨礙，而這些妨礙之結果就是社會生活之毫無規律，而其表現則為貧乏及生產階級之壓迫。是那幾種組

織產生這些怪惡的增加呢？這就是財產（資本），高價的地租，和高額的租稅。牠們把勞動者產生財富之自然應享的權利破壞了，而且繼續地增大不生產階級之數目，他們領受有勞動者生產之最大的部份。

這樣的資本自身是不存在的；牠祇是一種貯藏的勞動。但牠仍造出一種崇拜的對象，一種形而上的概念，而一切社會生活之成功都歸屬於牠，至於增加真正資本之勞動則祇當爲一個由于形而上的東西之恩惠而得保存生活的乞丐。這種從牠的創造者而被提取的貯藏的勞動，在不生產階級之手裏，一變而爲權力了。牠的佔有者，原初祇是爲人民選出之領袖及官長；人民以爲沒有領袖而生活，其可能性太弱了，而在時間之進程中，這些領袖却霸佔國家生命之根源，而且得獲政治之權力。經濟和政治的權力常常是手攜着手的。在這種財產分配的情境中。便決定了政府之形式，道德之形式，和國家之性質。統治者一旦得了政治權力之後，便開始以增加之強度，壓迫勞動者，勞資之矛盾

便成爲一種不可溝通的大濠溝了。

一切工人部份之鬥爭都是無效的。這是一種弱者和強有力之鬥爭。被約束的馬匹和穿馬靴的騎者之鬥爭。在這種騷動的競爭之中，全個國家都受損害，都受強制。工人階級是無權力的。牠應該爲一切心中存着國家福利之人們所贊助。所以祇有由于一種革命，國家方才能夠在資本之壓制下，解放牠自身了。

同樣的思潮也有一種匿名的小冊子表現着，這本小冊子，發見於一八二十年，其形式則爲寄給約翰羅素爵士 (Lord John Russell) 的一封信。小冊子之論證，可以歸納如下述：

自從機械時代發生之後，勞動成爲非常地生產的。資本，或稱貯藏的勞動，可以豐富無限地產生出來。但是生產的勞動者則不得不把他們勞苦所得之產品之七份之六，讓給資本家，這樣，才被允許應用生產和粗糙原料品之手段。所以資本之利息是狠高的。

而且資本之利息愈高，工人所生產的物品之分配愈少，而勞動階便愈貧乏。資本之高額利息，便是祇有很少資本存在之證明，雖然事實上牠是很容易創造的。這種矛盾之現象，其原因是什麼呢？其原因實是：用國外貿易之方法，把有用的土產和外國的奢侈品相交換；紙幣；戰爭；穀類之結合；工業之法制的規定。這些原因妨阻着資本之迅速增加，因此便妨阻着利息率之低減，牠們妨阻着勞動者在他的工業之結果中的分配之增加。所以顯明的補救方法就是在移去這些阻礙；但主要的，還是工業自由之建設。這種方法一經引用，則其餘的原因都容易移去了。資本將會迅速地增加，利息率將會低減，而工人將會收受他的產品中之較大的分配。工人經濟地位之改進會令到工作時間減短。而工作時間之減短和高價之工資就是國家繁榮之最真確的表徵了。

遲早總會有這樣的時代之來臨：資本之存在於這種性質中，沒有人為資本之運用而交付少許之利息。當利率降到零度，人類解放之時鐘便鳴起來了。

霍斯堅 (Thomas Hodgskin 一七八七到一八六九年) 爲當時之情形及他的思想之傾向而催逼着進入于社會批評的道路中，他是恆久地而明顯地爲歷文斯頓所影響的。他的主要著作爲：『勞動之辯護』(Labour Defended)，在一八二五年匿名發表；一八二六年，他在倫敦力學院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 中，演述了好幾個演講，集成而爲『通俗經濟學』(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最後，則在一八三二年，以匿名發表『自然財產權和人爲財產權之比較』(Natural and Artificial Rights of Property Contrasted) 一書。他的歷史理論是不統一的，但下述的結論，大抵是正確的。

社會是一種自然現象，遠附以若干規定的法律。世界之精神，最高的道德律，把這些法律放在社會之上，由是而創造一種公正的世界秩序。政治經濟學者之工作是純粹消極方面的：牠祇研究這些法律，而且防止牠們的破壞。自然律是利益的，而人爲律則是有害的。初時。自由是存在的。勞動者就是完全佔有和財富之名號。人類由于自然本能

之運用，便增加了；和人類數目一同增加的，就是物質之需求，也一同增加，而因為物質需求之增加便刺激了強烈之思想，而且因為觀察，發明，和發現，科學和能力便增加起來。發明並不是個人之工作，牠表出全個社會之思想及活動的結果；發明家和發現者祇有着一種幸運的天賦，能夠把各種新知識，用他們自己的一種微末之觀念，調合于一種統一性之中。而且，地理之境，對於人類之能量及權力之發展，實有至強大的影響。假若事物之自然程序，不為人類制度所妨害，則人類在正義之道途上的進步是很普通的事情。不幸強力却妨礙或破壞自然之法律：牠把勞動從財富分裂開來，令到非工作之人成爲一個立法家。其結果便是：不平等，壓制，貧乏，奢侈，工作過度，懶惰，戰爭，和犯罪。然而人類之法律總不能把自然律，排擠淨盡。所以雖然有人類的人爲律，而被壓制者之自由運動，仍慢慢地經過內在社會律之運用而成功。農奴脫逃地役之拘束，而且得獲了他所創造的生產品之支配權。後來，資本人家出現了；他徵收地主中利息

之一種稅捐。在現代則中層階級更成重要；牠代表勞動和財產的聯合之一種第二次的化身。以機械發明之普遍，逐漸消滅一切繁重的工作，中層階級便令到全個社會，都成爲自由和平等之人類。

霍斯堅的經濟學，證明資本是不生產的，而確定的資本（生產手段）則爲工人所創造，而以他們創造的力量所賦給的，至于流通的資本（在生產手段形式中之工資）則爲工人日常所生產。

物品之生產有三種重要的東西：（1）知識和發明的思想；（2）專門的能力；（3）運用工具之精巧和能力。這三種東西都爲手作工人及腦想工人所創造，而用這些東西之幫助，英倫便可以成爲富有了，然而不必要經過所謂資本，資本者祇是一種神祕的徵兆而已。假如企業者加入于生產之程序中，他們應得之酬勞，便像合格之工人一樣。但若他們是資本家，則他們祇是一個掠奪者而已，掠奪者之利益，是直接地反抗工人之利益。

的。因爲這種原因，勞資之偉大門爭，便發生了。幸而工人現在已經醒悟了，曉得組織了，還且以教育和文化之幫助，努力補充他們數目上和物質上之優勢。非等到勞動和財富，互相聯合攜手之時候，地上不會有和平及幸福了。（註一）

（註一）見馬克司之 *Theorien neuer Movement*，卷三；霍斯堅所謂「確定」和「流通」之資本，馬克司則稱爲「固定」和「變異」的資本。

第九章 第一次的英國社會革命運動

——一八二五到一八五五年——

(1) 第一個階段：爲要求選舉權的勞動階級及中產階級之同盟（一八二五到一八三二年）

大約在一八二五年，不列顛工人階級已經走入到牠的第一次社會革命運動去，在運動之進程中，牠經過三個階段之發展。

第一個階段就是爲選舉權之鬥爭，在這種鬥爭中牠和中產階級相聯合。從一七六〇到一八二五年，把大不列顛之社會生活加以改變的經濟革命，創造了好些偉大的工業中心，尤其是在英倫之北部及蘇格蘭，這種經濟革命鼓動當時的中產階級及工人階級，決

意爲選舉權而鬥爭，把他們從選舉權除外出來，這種不平是要消滅的，因爲這種目的，他們便投身于選舉法之改革的抗爭中。民主主義之觀念當第一次英國反對專制王政之革命時期（一六四二到一六四九年），與乎法國革命之初年（一七八九到一七九三年），經已發生，而在十九世紀之開始三十年，與乎選舉運動，更爲增加勢力，牠已走入到一種洪流之內了。從事情之表面看來，是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爲着爭求成人選舉權，而組成一種同盟，但在實際上，這兩個階級之經濟衝突，却極顯著，于是在中產階級之部份，又容許有一種純粹之合作。工人階級之較進步的部份早已經吸收了奧文，奧文派，格雷，霍斯堅，和其他爲資本主義的著作之社會批評的教義，牠把工錢勞動者，當爲唯一生產品，創造剩餘價值的工人，不過牠還未有充份強有力之情感，要在政治鬥爭之中佔一個獨立的地位。其後，牠又附入有中產階級：例如工業家，製造家，和商人，他們大多數都是沒有投票權的。在一八三〇年巴黎七月革命之後，這種鬥爭特別厲害，當時，英國

爲保守黨和地主所操縱的政府，也不得不引用改造的計劃。一八三二年，議會通過一種新的改造律，以滿足中產階級之要求，至于工人階級則完全失敗，空手而退。在一八三二年之後，也像其前一樣，工人們完全沒有政治之選舉權。

(3) 第二個階段：反議會主義及工團主義（一八三二到一八三五年）

新選舉制度之失意和中產階級之普遍的運動，不久便在工人階級中，造成一種反議會的和工團主義之趨勢，孕育成重要的發展。他們以爲全部議會的政治鬥爭，祇是一種欺騙，一種把工人階級之正當目的轉移方向之方法。自此以後，他們之口號便是「經濟行動」。于是便成立有非常偉大能力之職工聯合，其目的則在轉移工人階級之生產手段，一部份則用總同盟罷工，一部份則用合作社。一八三三年以後，全個不列顛的無產者，都投入于這種運動之中。一切關於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的觀念，在二十世紀之

初年，便已討論，其他如工人議會問題，把政治之議會變而為工業代表之議會的問題，都可以在一八三三及一八三四年之英國勞動報紙內找出來。包羅廣大之階級鬥爭，羣衆之罷工及示威巡行，各種聯合的會議——都無非以解除資本主義之束縛，保護無產階級之自由爲目的。這種非常之運動，爲英吉利工人的長久歷史中一切運動之最有趣味之運動，馬上便碰着了中產階級之破壞，長官之仇視，和政府之惡意，他們聯合各種壓制之方法，以毀滅這種運動。至于這一次失敗還有一個附從之原因，就是奧文主義者和社會改良派與乎革命之工團主義者之衝突，奧文主義者和社會改良派之特性，則爲階級之休戚相關，而後者之特性則爲階級鬥爭之準備，他們的意見之分歧，便在這種偉大的運動中，分爭起來。這種運動之最好的文件，當引述于下面。這種文件顯現于一八三四年九月三十日之職工聯合機關報『Pioneer and Official Gazette』中，其要點如下述：

『我們對於勞動支持者和工作階級之聯合的增長的精神，加以考慮。——在歐洲最

進步的國家中，勞動階級之聯合精神證明着一種強有力的自然情感，促進牠的原因對於人類幸福上，有極大而極重要的影響，比之大多數人民所承認的處置，更大而更重要。從有史以前的時間起，這種創造和我們同在，並且存在於我們之中，進行着，工作着。個人在各個不同之時候，總多少為地土性之一時的安排，或環繞着他的人為事物，所鼓動；但自然對於一個人之不止息的影響，却由發展一切有機本質之同化的恆常律而不同，牠們在每一個頃刻中，微微地變動牠們自己，而且沒有一種本質能夠合理地說是「常在」的，因為一切東西總由一種改變而跑到他種改變去。無論在那一個指定的剎那中，社會之境應該常常把牠當為變遷中的東西。……這是創造主進行創造的法則，從各個個人之困難和思想，而得獲人類之極大的幸福。一種工作之新系統正在來到這個世界了。新的系統和階級鬥爭都是新社會秩序之積極的符號。勞工部或工業委員會，其地位應該為偉大的領袖所佔有。這種秩序，將會逐漸整備一條到產業共同之大道。

「同時，鬥爭仍舊進行，而勞動仍舊受苦。然而我們要忍耐。時代精神是不可抵抗的一種能力——職工聯合應該繼續；還且要有更多之罷工和更多之顛躓。不過無論他們遇着了怎麼的一時之錯誤和痛苦，更好之聯合是要形成的，而且國民會由時代之艱難學習了很多的東西。一個新世界會逐漸顯示牠自己；妨害和桎梏社會的財政欺騙和錯誤，將會爲各個個人所看見；一種新的知識和自由，會自己發生而且傳播，從這一種單獨的理由，所以決不能在思想及行動之古老而破壞的基礎上找尋補救之方法，因爲這種思想及行動之基礎，對於現在開始之心能的豐富和機械的能力，是過于狹窄了！」

(3) 第三個階段：新憲章運動（一八三六到一八五五年）

直到一八三六年之末期，勞動運動又復興起。牠在一八三四年和一八三五年，雖然失敗，但現在已復原了。自此以後，牠成爲一個政治階級之政黨，其目的在於選舉權和

議會之民主主義化，牠以爲這便是社會主義秩序建設之一種方法。這個運動學習了許多經驗：由一八二五到一八三二年間的事情，表明和中產階級之同盟是無益的；又由一八三二到一八三五年間的事情，表明單用經濟行動的一種迅速勝利是不可能的。

自此以後，牠爲民主主義而奮爭，由是而追求牠的獨立勞動黨之政治及職工聯合的目的。

牠的程序就是在一八三七及一八三八年所起草的特許憲章，而其實際上，除了含有下述六點的一張單據之外，便沒有什麼東西了。這六個要點便是：（1）成人選舉權；（2）平等的選舉區（3）取消議會候補者之資格問題；（4）議會每年開會；（5）無記名投票；（6）議員支給薪俸。從這特許憲章（Charter），所以全個運動便稱「新憲章運動」（Chartism）。這個名詞的最好的意義是社會的民主主義，因爲牠是聯合着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目的的。

一八三七年後，新憲章運動便成爲一種羣衆運動，一種爲政治權力革命的鬥爭，而牠的會員也受了很大的犧牲。但其終局，他們仍失敗于如下之弱點：不能夠以一種有力而統一的組織，供給民衆，而當時的反動的聯合法律也不准許各個區域支部有一種全國中心的組織之成立。所以新憲章主義者祇能夠形成各地方的支部，而彼此不能夠有互相之接觸。有時，他們便成立了祕密組織，然而祇令到政府之偵探，有一個機會，專意促成謀叛的趨勢，由是而把新憲章主義者控以大逆不道，他們因此便犧牲了很多人。從普通說來，各個地土之組織要用領袖人和演說者爲之連系。然其後，則這種運動之優越部份即完全屬於他們。可惜領袖人和演說者，究竟還是人類，自然也有人類之缺點。他們分裂起來，于是便指明新憲章運動之聯合，也分離而崩解了，黨派之形成和英雄之崇拜——一切都令到新憲章運動之廣大而組織良好的行動，成爲困難。此外還有一個弱點，就是沒有一種統一的戰術。

在這種運動中，有兩種戰術之主張，牠們都互相爭長：一種自稱爲『武力派』(Physical Force Party)，而其他的一種則稱爲『道德力派』(Moral Force Party)。前者主張秘密組織武力之反叛，而後者則信仰教育之功能，和緩慢的政治及職工聯合之組織。因爲這兩派互相鬥爭，於是這種運動便不能夠有聯合之行動，有直接之勝利了。然而新憲章運動者之鬥爭，常常是狠英雄的，尤其是在一八三九年和一八四二年。一八四二年，羣衆之罷工，其範圍極博，幾乎和一種總同盟罷工相等。

新憲章運動之失敗，也由於沒有良好的領導人。牠的最著名的領袖是非爾格奧加諾爾 (Feargus O'Connor, 一七九八到一八五五年)，然而他祇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和土地改良論者。他同時是一八三八到一八五二年新憲章運動之機關報『北星』(Northern Star) 的所有主和編輯人；他有有力之口才，得到很多羣衆之信仰，然而他並不是一個知識優越之人。到後來，他成爲一個激烈的土地改良論者。

一八四八年之後，新憲章運動完全失敗了，表面上看來，完全沒有所成就。但在實際上，這個時代，確實遺贈了一種非常豐富的遺產——觀念，改革，和無產者事業之遺產。

社會民主主義勞動之先鋒時代，就是一個強烈改造活動之開始時代——英倫的一個返老還童之時代，向着不列顛帝國之民主主義化的第一個步驟。新憲章運動的時代看見爲幼童和少年人而設的第一種真正爲工場法律（一八三三年），第一種爲婦孺而設的礦坑律（一八四二年），每日十小時之法律（一八四七年），言論自由律（一八三六年），穀類律之廢除（一八四六年），政治組織禁令之解除，（一八四六年）——這些法令，一方面埋沒了地主之專橫，而一方面則埋沒資本之絕對的統治。然而此後，選舉權仍是一個實際政治的問題，但到一九一八年，牠便成爲完全的民主的了。

新憲章運動所遺贈給工人階級者，爲協作之觀念，爲更成功的職工組合，爲一種國

際的觀察。牠領導一種鬥爭而進步工人的階級，走進文學和政治經濟學中。新憲章運動刺激馬克司和昂格斯知識系統之發達，令到穆勒約翰(John Stuart Mill)成爲一個倫理的社會主義者，而且強烈地影響的士累利(DIsraeli, 猶太種的政治家，兩任英國首相，一八〇四到一八八一年——譯註)，金斯黎(Kingsley, 英國之小說家，一八一九到一八七五年——譯註)，喀來爾(Carlyle, 蘇格蘭之論文家及歷史家，一七九五到一八八一年——譯註)，莫累斯刺斯欽(Maurice Ruskin, 英國著作家，藝術批評家和改造家，一八一九到一九〇〇年——譯註)，及一般的保守派或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

與文主義和新憲章運動時代之遺產是無限的，再沒有別人能像馬克司的描述那麼好的了，他在「國際工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之就職演說詞中，把這些遺產陳述出來，這個聯合會是在距離新憲章運動消滅後十年，才成立的。他說道：

『在三十年最可欽羨的堅忍戰鬥之後，英國工人竟能得獲勝利，達到每日十小時之工作。……十小時工作律，不特是一種偉大的實際成功；牠是一種原則上之勝利；牠第一次在廣博之日光中，把中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屈服于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之前面。然而一種更偉大的對於有產者政治經濟學的勝利，還等待着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呢。我們援用協合運動，尤其是工場之協作的原理爲基楚者，而牠們之所以得獲存在，實由于少數『被人輕視者』和無人幫助者之手上。』

勞動之鬥爭和痛苦，決不會徒勞無功。假如牠們不直接達到牠們的目的，牠們總會準備着最後勝利之道路。

第十章 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八年之法國

(1) 資產階級的王政

對於封建祭司的政府之反抗，在一八三〇年後，便已巨量的發生，令到查理第十世不得不借助于壓抑的方法。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他發佈了三度法令，取消出版之自由，減少選舉權，並且宣佈最後的選舉中反對者之候選人為無效。這三種壓制便是波爾邦王朝的最後之棺材釘。反對者召集工人，建築寨柵，在『光明之三日』（廿七日至廿九日，七月）中，查理士十世便被打倒了。然而巴黎工人流血所奮爭者為共和，但卒無由實現，路易腓立普（Louis Philippe 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竟成為奧利安主義的（Orléanais）。

leanist) 資產階級之王政，而財政之勢力竟統治着政府。

馬克司寫道：『七月革命後，當一個自由派的銀行家，拉花德(Lafitte)，和他的好友奧利安(Orleans)公爵，共同慶祝勝利于維利飯店(Hotel de Ville)，他說出以下的话：「自此以後，便成爲銀行家之統治了」。拉花德以前，曾把革命之祕密告訴于法國政府。實在說起來，這並不是法國之資產階級在路易腓立普之下而統治，而祇是一小部份之他們——銀行家，股票大王，鐵道大王，煤礦，鐵礦，和森林之物主，重新興起而環繞着他們一部份的土地財產，所謂財政之貴族政體。……正當的工業資產階級形成一種公共反對之部份，換一句說，牠祇是代表着議會中之一個少數的派別罷了。』(見馬克司法國階級鬥爭一書)

在資產階級統治之時間中，在以前曾爲拿破侖戰爭和波爾邦王朝之復辟所妨礙的經濟變遷，已經活潑地進行，而生產及交易之手段，又已經發展于資本主義之方向。若和

英國工業進步之結果相比較，則法國工業進步之結果並不足以動人，但牠們在社會和經濟的思想，與勞動運動中，也發生一種有力的影響。表現這一種情境的，就是爲一個當時最著名的社會著作家，伯格爾 (Pecqueur) 在他的社會經濟學 (Economie sociale, 1839年，巴黎版) 一書之封面中，提出一句題詞，「祇有蒸氣，構成一種最可紀念的革命。」(La Vapeur est, à elle seule, une révolution mémorable)

鐵道，汽船，和其他船隻之建造，煤鐵生產之增加，家庭工業和國外貿易之澎漲，合股公司之非常的增加，殖民地之奪取——這些都是工業革命進步之顯著的象徵了。

這種變遷，祇暫時令工人和小商人受害。沒有政治之權利和經濟之幫助，國家祇在「一種金權階級的手裏，剝削國民，用殘暴的方法，以壓迫每種反叛的企圖。羣衆被帶到不幸的災禍中了。工時過長，工資甚小，間接稅極高，而爲反對方面之知識階級和低級的中產階級所孕育的政治上之不平，令到各個大都市和工業中心點的勞動人口，容易接

受反叛的圖謀和社會主義之觀念。

從一八三〇到一八三九年，法國各個都市，都看見有一串的共和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反叛與乎謀亂之事情，而從一八三七到一八四八年，法國又為各種社會主義觀念和方案的最肥美的土地。小說家，浪漫的詩家，神學家，和立法家，都互相爭競，以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之難以維持，而且譴責現存之秩序——像李博德(Jean Reybard)在一八四三年他的 *Etudes sur les reformateurs* 一書第一章所陳訴。這一年，馬克司剛到巴黎。

(2) 資產階級與平民階級之劃分

這種經濟發展之社會結果，便是把社會分為兩個階級，一個是資產階級，一個是平民。路易斯白蘭克(Louis Blanc)在他的『十年史』(*Histoire de dix ans*) 一八三〇到一八四〇年)中，這樣說：「從「資產階級」這個名詞，我曉得是指全部份或佔有生產之工

具，或佔有資本的市民，以他們自己的資源，而從事勞動，而且祇在某一個限度上，互相倚賴。至于「平民階級」則指一切無資本的市民，他們要完全依靠于他人，以維持其生活之必需品。

這種階級之劃分非常顯著，在工人向委托人之議院（Chamber of Deputies）之一次請愿（一八三一年，二月三日）中，一個名叫查理士巴蘭格（Charles Beranger）的工人說道：『大概爾們之中，也祇有小數，沒會聽過平民之言語。平民階級就是全體從事工作，而其社會的生活却為他人所掠奪的人，他們一無所有；爾曉得我所指示的麼：這即是無產階級啊。』（見Octave Testy之*Mouvement Ouvrier*，一八三〇到一八三四年，巴黎，一九〇八年版，八十二頁）。當時所謂平民階級和資產階級實是異名同實。（比較E. J. 的書，關於安芬庭對於七月革命之批評：『平民或無產者，在塞棚之上，鬥爭，但在勝利之後，資產階級却武裝反對無產者了，』三二六到三二七頁）。

這種事實之成立，因為下述之理由，而非常重要。假如平民和無產者在當時，是異名同實的觀念，則平民之統治或民主主義，在事實上，便會指出是無產者統治或工人階級之統治，而不像今日所謂「民主主義」，既反對寡頭專制，也反對一個王政的全民統治了。在一八三一到一八四八年間，民主主義是指反對資產階級之平民的統治。

我們祇有從這種歷史之背景，才可以了解「共產主義者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中的相反而不可理解——因為表面上是互相矛盾——的詞句：「工人革命之第一步，就是要把無產階級，提引到統治階級之地位，為民主主義而鬥爭。」在「共產主義者宣言」中之所謂民主主義，其意義實是指工人階級之統治。

昂格司 (Friedrich Engels) 則更走前一步，熱烈地說道：「民主主義，在今日即為社會主義。……除了那些不計在其內的人民之外，在一八四六年，一切歐洲的民主主義者，多少總是社會主義者。」(見他的遺稿卷二，四〇五頁)

現在讓我們繼續攷察當時之社會主義的歷史罷。

(3) 祕密之謀叛及暴動

我們已經敘述過，就在王政復興之時代中，已有各種運動之興起，這些運動，一部份是自由主義的，一部份却含有民主主義之性質，牠們有祕密之組織，而其目的，則在傾覆波爾邦王朝，而重振國民之最高統治。這些組織之形成就是「燒炭黨」(Carbonari)之形式：一種意大利反抗異邦統治者之謀叛組織。燒炭黨之戰術是武裝之反叛；燒炭黨徒之責任，是要每人常常準備着一枝來福槍和五十口子彈，用一種特殊的記號，便要會集起來，遠且要聽從領袖之命令。有一部份巴黎的學生，在巴撒德 (Bazard) 和巴茲斯 (Bucher) 領導之下，形成一種祕密組織，名『真理同盟』(Amis de la Verite, Friends of Truth)，其目的則在建設一個民主主義的社會。當加入這個同盟之時，每一個會員，

部要說出下述的誓詞：「我誓必盡我一切之能力，以勝利地實現自由，平等，之原理，和憎恨專制主義。」巴撒德和巴茲斯都是醫學學者，他們又都是青年之爲社會主義觀念所吸引者。我們上面已經見出，巴撒德實是一個聖西門主義者之良好的解釋人了。

法國燒炭黨人和波拿洛第 (Proudhon) 相聯合，而波拿洛第則從巴魯塞爾 (Brisson) 把巴卑夫謀叛之觀念，散播給他們。路易士奧格斯德白蘭格 (Louis August Blanqui) 大抵在一八二五年，加入這種運動。但就其全體看來，這些運動之發生，一部份是由於自由派的中產階級，而牠一部份則含有民主的共和主義之性質。一八三十年七月革命之後，中產階級之份子脫離而去了，而他們的地位，爲巴黎及幾個工業中心之工人羣衆所補充，工人階級和民主的共和主義份子，以祕密組織而連合，然而爲工人階級之最努力的部份，則爲無產的社會主義份子，他們在白蘭格領導之下，而形成一種騷動的羣衆。

在一八三十年八月到一八三九年五月之間，我們在法蘭西之中，找出了四個祕密的

偉大組織：「人民之友」(Amis du peuple, The People's Friends)『民權社』(Droits de l'homme, The Rights of Man)『家族社』(Societe des Familles, Society of Families)和『季節社』(Societe des Saisons, Society of Seasons)。有好些不列顛的新憲章主義者，或者直接是這些組織之會員，或者則和牠們互通消息。

一八三九年之後，仍然存有好些細小的祕密組織，牠們自稱爲『新季節社』(Nouvelles Saisons, The New Seasons)，不過沒有重要之運動，因爲他們沒有白蘭格和波拿格第之贊助：後一個已死了；而前者從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八年，又被放在獄中，奄奄無生氣。好些祕密組織之領袖人物是：花羅干 (Flocon)，拉斯比爾 (Raspail)，馬拉斯德 (Marrast)，巴巴斯 (Barbas)，加斯德爾 (Caussidiere)，及其他，我們將會看見他們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領袖者，他們或是中產階階之共和主義者，或者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

從中產階級之民主觀念到無產者社會主義運動——這種變遷是逐漸接受波拿洛第之影響，和一八三一到一八三四年里昂紡織工人的暴動之影響，而且爲牠們二者所促進，至於里昂紡織工人的暴動，其發生，一部份由於工資不足，瀕於餓死，而一部份則由於共和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觀念，但這種暴動，卒由自由主義派的政治家，德爾斯（Thiers）——這個德爾斯，後來在一八七一年，還有組織地把社會主義者加以屠殺——之手，中產階級政府以流血的屠殺，壓止下去。『人民之友』和『民權社』則仍偏重於一種中產階級和民主主義的性質，或者則沉溺於共和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家族社』和『季節社』則在牠方面，牠們都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德意志之社會主義者如韋德靈（Weitling），洗拍爾（Schapper），包爾（Bauer），及其他在倫敦的德國工人教育協會的會員，都在『家族社』和『季節社』中，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相接近，而上舉之德國工人教育協會，後來便成爲社會主義同盟之核心。波拿洛第及其著作，在上舉的法國秘密組織之

中，有一種非常偉大之影響，在其中，最先發展的為革命獨裁之觀念，這種觀念，後來便為韋德靈和社會主義同盟所採取了。

「家族社」接收新會員，必把下述的問題，質問準備入會者，而其答案，則也如下述：

「爾以為政府怎樣？」

「政府祇為着少數特權者之利益而工作。」

「現今的統治的貴族是什麼人呢？」

「財政家，銀行家，交易之投機者，專利者，大地主——總括一句，是掠奪者。」

「政府倚賴什麼權力而存在的呢？」

「倚賴強權。」

「什麼是社會之主要罪惡呢？」

「貪婪，金錢之慾望，牠代替了一切道德之地位；財富之崇拜，無產者之輕蔑和迫害。」

「那一個是平民？」

「全體工人；他們處於奴隸之地位；無產者之運命和農奴及黑奴之運命，並無兩樣。」

「社會之基礎應該怎樣呢？」

「社會之平等；市民權利之確實的存在，自由教育，政府之參加；市民之責任是爲社會而獻身，對於其他的市民，要有兄弟之情誼。」

「將來之革命應該是一種政治的還是社會的革命呢？」

「是社會的革命。」

「在革命成功之後，平民能夠自治麼？」

「當社會是道德上有病的時候，英雄之統治是必要的，這樣，方能馬上建設健康的社會情境；但在好些時候，人民應該有一個革命的政府了。（註一）」

（註一）見荷德（De la Horde）之祕密社會史（Histoire des Societes Secretes），一八五〇年，一九九頁以下。

在當時的一個革命的政府就是指一種社會主義之獨裁制度了。

「季節社」仍然含有決然的無產的社會主義之性質。牠圖謀在一八三九年五月暴動，在這次謀叛中，德國籍的會員如韋德靈及洗拍爾等都有參加，但其結果，卒歸失敗。或者新憲章運動興起於一八三九年，本來是預先計劃着和這次巴黎暴動相響應的。法國籍的領袖，如白蘭格和巴巴斯，都被捕獲，處以死刑，後來加以減等，為終身禁錮。

馬克司熟悉這種組織或牠的活動，他說出下述之評論：

「直至到一八三十年，自由派的資產階級，領導着一切謀叛，以反抗王政之復活，

這是衆目昭彰之事實。但在七月革命之後，他們的地位已爲共和主義派資產階級所取而代了。至於無產階級，則在王政復活之下，已經學會了結黨謀亂之行爲，當共和派的資產階級在不重要空市街巷戰而恐懼逃亡之時，無產者便走到前線去。巴巴斯和白蘭格所領導之『季節社』於一八三九年之暴動，已經是完全無產階級之事業了。……『從整體觀之，馬克司以爲『祇以無產階級成爲革命運動之一部份，是再不能適合於現代革命之工作的，牠應該全由無產階級所運用。』(註一)

(註一) 馬克司和昂格斯文存 (Literary Remains of Marx and Engels)，卷三，四二八頁，四三三頁。

(4) 奧格斯德白蘭格

當時最著名之人物爲奧格斯德白蘭格 (August Blanqui)。他有深刻之見解，偉大之

知識，尖銳而簡潔的口才，絕對的勇敢，爲工人階級之原故而無限的犧牲，他把他生活中之最美好的時代，爲工人階級之原故而入獄，而被逐，身體又被警察和憲兵所虐待，因爲這樣，白蘭格便成爲一個英雄人物了。他在一八〇五年，生於普查德德尼爾 (Pesch-et-Ternier)；他的父親是一個副知事；他有一個兄弟，即著名的經濟學家阿多夫白蘭格 (Adolf Blancqui)。他畢業於中學後，即致入巴黎大學；他研究醫學和法律，而同時却參加於巴撒德和巴茲斯的秘密政治革命的團體。一八二七年，他第一次參加巷戰，受傷被擒。一八二九年，他加入『地球』(Globe) 雜誌，爲一個編輯部員，這個雜誌，初時屬於自由派之左翼，後來，却成爲聖西門主義之雜誌。一八三十年，他又加入七月革命之塞柵上的鬥爭。其結果既歸失敗，他又加入『人民之友』，一八三二年被逮，在那個時候，他向裁判官宣言道：『這是貧富鬥爭之問題，在其中，後者是取攻勢的；特權者吸食貧人之血汗而成爲肥胖。議院祇是一種機械，把二千五百萬農民，和五百萬工人放在

牠的輪機之中，搾取他們的鮮血，由是以輸送富者之血管去。租稅是一種掠奪行爲，懶惰人藉此以搶掠工人階級。』他卒被定一年監禁之罪。在「民權社」中，他屬於左派，而後來，又成爲『家族社』之領袖。因爲這些活動之原故，他又被逮，處以兩年監禁。一八三七年爲大赦令所釋放，他又領導『季節社』，而且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圖謀大舉，被捉獲，像上面經已述說過，他被判以死刑，後來減等，則爲終身監禁，直到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方才恢復自由。

他一到巴黎，便非常激烈地譴責當時所形成的暫時的聯合，他主張要有一種純粹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政府，應該有一個時間，由他們獨裁地統治着，而且用各種適當的改革——如凡俗之學校，自由教育，協作社，社會改造——逐漸地準備人民，達到一個共和主義之社會主義之社會。『因爲社會主義不能夠由法令所引入；牠祇能夠由教育和訓練而逐漸實現。……革命自身既不變遷人類，也不變遷情況；牠祇供給政治和經濟改造之

機會。當革命勝利之時代，法官和高級長官都要辭退，而中間及下級的長官則應仍舊留存，以爲試用。要有一個巴黎人的獨裁制度以指導政府之事業，直到國家之民主主義共和政體，和協作經濟之成熟爲止。一種革命中之主要因素是政權之奪取及其在教育和社会改造的利益中之運用。革命者應該明白地留心於一切烏托邦之思想，因爲烏托邦主義者大抵都是政治上之反動者啊。』(註一)，白蘭格是一個欽仰馬克司的人，馬克司反對蒲魯東的『哲學之貧困』(Misere de la philosophie)一書，白蘭格非常歡喜去閱讀。

(註二)

(註一)見白蘭格之社會批評(Critique Sociale)，巴黎，一八八五年版，卷一，一七三至二二〇頁。

(註二)見馬克司昂格斯之通信，一九一三年版，卷四，一四〇頁。

因爲他反對虛偽的共和政體之國會(一八四八年，五月)，所以他又被定以十年之監禁。一八六九年，他又努力利用拿破侖三世時代的人民之不平，使贊成共和政體之政

府。在一八七〇年戰爭之時，他開始居留於巴黎，編輯一種雜誌，名「祖國之危機」(Patrie en danger)。一八七一年，二月，他離開巴黎，還作了一本小冊子，以詆毀幾個新共和主義之領袖者，稱之爲反動派和反叛的奸賊，其後，他便和他的姊妹同居於鄉間，但凡爾賽政府仍逮捕他，而且禁止他參加『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之運動，雖然巴黎公社愿意以好些人爲担保品，以贖回白蘭格，而凡爾賽政府卒不答應。像馬克司在他的『法蘭西之內亂』(Civil War in France)一書中所言，凡爾賽政府明知這樣便是送一個首領給巴黎公社。白蘭格在軍事裁判之前，祇能夠免了死罪。他被放逐了，直到一八七九年之大赦令下，才得回返巴黎，在那裏他又編輯一種雜誌，名『非神非主』(Ni dieu ni Maître, Neither God Nor Master)。在得享高年之後，這個帶着桎梏的普羅米索斯(Prometheus，爲希臘神話之一個神，做土偶，從天上盜取天火，令土偶賦有生命，後因此竟被加以桎梏——譯註)，死於巴黎，時一八八一年，一月，一日也。

(5) 社會主義者及社會改良者：伯格爾，蒲魯東，加伯德，拉羅克司，白蘭克

雖然無產階級之主要精神是革命的，而且努力實現牠們的社會和經濟之目的，而其手段則為奪取政權，但當時（一八三〇到一八四〇年）社會主義之知識界却反影出一種徹底的和平進化的性質：無產階級也並不參加活動於其中：他們把勞動者當為憐憫，同情，和仁慈之對象。這個時候之法國社會主義，若非倫理和宗教的，便是烏托邦主義的——系統的計劃而已。

牠似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二者毫無關係。一方面是波拿洛第和白蘭格，是無產階級和革命的社會主義，而他方面則為倫理的，宗教的，和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及社會改良家。大多數這些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改良家，都是著名而有勢力之著作家，但是他們若不隸屬於聖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的影響之下，則其觀察點，必為低級的中產階級所

限制。倘若他們是聖西門主義者或傅立業主義者，則他們希望社會之進步從資本主義之發展而來，從資本家及國家之恩典而來，或者他們所追求的，是用價廉而不可兌換的紙幣之製造，中間人之排除，和國家官吏的制度（國庫的制度）——這些方法，而把小商人從顛沛流離之情境中。解放出來。

在巴撒德之後，最著名的聖西門主義者是康斯坦丁·伯格爾（Constantin Pequeur，一八〇一到一八八七年）；他比較地在當時德國社會主義者中，是最有創造性之人物。他的最良好之著作是『社會經濟』（*Economie Sociale* 一八三九年，巴黎版），書中討論蒸汽機對於商業，工業，農業，和一般文化的影響。這本著作共有兩卷，原來由於法蘭西之『道德的及政治的科學會』（*French Academy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以蒸汽，鐵道，和汽船之文化影響為題目，懸賞徵文。伯格爾之著作竟得賞金，雖然學會中是不能夠同意於他的社會主義之結論的。他非常熱烈地贊成近代技術之成功，他以為近代技

術(1)用分業協作的方法以增進財富(2)促進平等和同胞之觀念，因為近代交通之便利，而人民便能夠更為接近，令他們不得不共同工作，不得不倚賴相互之服務。『總之，一句話，聯合和一切社會效果都由這種根源流出來。』(卷一，八〇頁)工場中之蒸汽機和商業路線內之機關車，把秩序，系統，及結合，引入於從古迄今所流行之無政府，無系統，和無結合之境中。瓦特(Watt)和斯提反生(Stephenson)實在把「離散」和「分別」，加以結束，而另外造成共同工作和服務，(卷一，六十四至九十五頁)所以我們們時代之一般趨勢就是聯合：消滅小企業，小家庭，和個人之職務，同時又組織合股公司——以達到『集中化』；在一八三八年，有這種的國內公司八百六十所，記載於巴黎公報之中。『大多數的工人，同樣地工作於一個大的房屋之內，這實在是資本之混合，相聯工業的各種分支之協作，和小工場，小工業中心的相伴而來的消滅——之必有結果。……一切分離獨立和私人生活之影響，在公共生活之影響之前，調合起來了。在這

種情形之中，新的生產方式隱藏着一種工業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革命。（六十三頁）社會生活之真正的改進，在於財富資源，勞動工具，一般幸福的情境之逐漸的社會化。」（卷一，概論，第七頁）一切存着於以往及現在的事情，似乎都是爲着勞動工具的社會化而鬥爭的，換一句說，把土地和粗糙原料品，從個人之物主裏，解放出來，漸漸變形而爲公共財產，這種公共財產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讓渡的，社會的，和集合的：『我們緩緩地而間接地向着這種情境而移動，經過不可更改的必需，形勢的力量之曲折而未知的道路而移動；所以我們的移動，是由於宗教，政治，社會改革，和工業機械之變遷；而且經由這些道路，我們便會得到各種制度，以組織社會化，把這種原理範成爲一種社會律，這是將來經濟憲法中之最高的法律。』（卷二，十二至十三頁）然而社會化之歷程的最後憑藉不是要倚賴於物質之因素，而是要倚賴人的道德之重生，由於重生，他才能捨棄個人利益之追求，而努力於公共之福利。勞動者之動機必須有一種轉變。而且，社會

化之全部問題是一個宗教和道德的問題；（卷二，二十四至二十五頁）愛人應該發生於愛神之觀念上面。上帝之天命許久已導引人類，向着這種道德領域中進行了。中產階級，勞工階級，奮鬥者，活潑者，和有能力的人，將會更成富有，更多教化；牠在這種方向之進步愈多，則牠傾向於分配勞動者以愈多之工資和愈好之待遇；牠將會把利息分給勞動者。」（第二卷，二二二頁，二二二頁）不過也要曉得，在新的發明之中也會附着某種之退步：新機械之所有主，最初便把自己視爲專利主義者和特權之人物。不過這種退步是一時的罷了。『天命總會明白地在適當的時間，由於加課於牠的反對者之上的政治和道德之發展，以宣示社會化會怎樣最好地完成，換一句說，機械會怎樣爲全社會之利益而運用。』（卷一，四五頁）伯格爾同時也很熱烈地提倡國際之和平，和國際之仲裁。他思想之全部原來傾向於樂觀主義之自由貿易者，祇因爲熟習聖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才把他爲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罷了。他的著作，燦爛着一種仁慈，人道，及良好教

化的精神。他大概就是「社會化」一詞之創造者，這個名詞在他的著作中，最爲常見。總之，伯格爾之理想是一種社會論理的社會主義者的秩序：「一個上帝之共和政體。」

同時有一個比伯格爾更爲喧囂而活動，但却不狠博學和高尚的人，就是蒲魯東（P. J. Proudhon）。他生於比生干（Besancon），和傅立葉之生地相同，而其矜誇和自負，也和傅立葉無異。他雖然生於貧苦家庭之中，却享受有良好之教育，入過中學校，雖然不狠規律地，但也到他十九歲之時，方才輟學。大約在二十歲左右，他練習印刷術，後來便成爲一個校稿人，最後又成爲一個社會批評家。一八四十年他印刷了他的最著名的著作：『何謂財產？』（What is Property?）他的答案就是『財產卽是贓物』（Property is robbery）。一八四六年，他又印刷兩卷的『經濟之矛盾或貧困之哲學』（Economic Contradictions or 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而馬司却以『哲學之貧困』一書爲之答。他們二人在一八四四及一八四五年，相敘於巴黎，長久地討論一切社會及哲學問題。在一八

四八年，普魯東顯示出他的社會問題之結論了：要設立一間人民銀行，生產者可以向這間銀行收受廉價而不用金錢的掛帳，並且可以根據其生產品之價值基礎而交換別種同價值的生產品。這種著作馬上令他名著巴黎，在下一次之選舉會（一八四八年六月）中，竟給他一個選為國會議員之機會。自此以後，他編輯雜誌，印刷好幾種小冊子和書籍，但因為這個原故，他為反動勢力所迫害。他於一八六五年，死在巴黎。

普魯東祇是一個論辯家，而并非不是一個系統的思想者。他的主要觀念，儘可歸納起來，如下所述：財產之制度是不正當而有害的；單純佔有一片土地這種事實，並不會做成該地之財產權。而勞動力也不做成這種權力，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土地之製造者。而且，經驗也指明勞動力不會引生財產之佔有，試看一般工人，豈不都是貧苦的麼。祇有為一個人以其自己的勞動力而造成的東西，才是合法之產業（這和財產是相對照的）。然而在財產制度之下，交換是不能有同等價值之效果的。勞動者以其所得之工資決不能

購回他所創造的財富；財產之佔有者——生產手段之佔有者——總用地租，利潤，和利息之形式，以剝削工人生產物之一部份，佔為己有。要除去這種不公正的罪惡，並不須要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祇要建設一個社會，在其中，生產者能夠以其勞動生產品，換取價值相同的東西。手工工人可以獨立地生產他們的商品，於是他們便可以到人民銀行接收廉價的帳單，人民銀行也是他們將來要設立的，由是他們便根據着同等價值之基礎而互相交換生產品。這便是相互之信用和同等價值之交換。這樣的一個社會便不必有國家制度，牠祇是完全個人的自由和平等。總而言之，他的系統是互助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聯合，牠的性質是小資產階級的，因為牠見不到資本主義完全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則正像伯格爾所正當地觀察到的，展示着一種趨向聯合和集中化的強有力之趨勢。

現在說說幾個不甚重要的人物了。愛丁尼加伯德（Etienne Cabet，一七八八到一八

五六年）是一個哥西加（一八三〇年）的辯護士和代理人，原來他屬於中產階級之共和黨。他被政府反對黨選入國會，為資產階級之統治所迫害，但他在國會中，總勇敢地擁護他的信仰。一八三四年，定罪下獄，他逃亡於倫敦，在那裏，他觀察奧文主義之運動，他研究多馬斯謨耳之「烏托邦」，因此，他便成一個社會主義者。後來他復返巴黎，於一八四二年，作了一本烏托邦的故事，名「意加利亞旅行記」（A Voyage to Icaria），這本書對於社會主義觀念之傳播有非常偉大之貢獻，而且也是狠值得一讀的。

比爾拉羅克司（Pierre Leroux，一七九七到一八七一年）是第一個天資的勞動者而成爲一個聖西門主義派（一八二四年）。他從事排字的工作，他創設「地球」雜誌，但他後來却放棄了聖西門主義，而成爲一個神祕宗教的改造家，他對於後來著作所謂社會主義「羅曼司」的佐治山得（George Sand），大有影響。

路易白蘭克（Louis Blanc，一八一一到一八八二年）本質是一個政論家。他的歷史

著作非常流行。若以他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看來，則他的著名全因為他的一本小書，『勞動組織』(Organization du Travail 一八三九到一八四十年)。勞動組織後來成爲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口號。白蘭克深刻地譴責「競爭」，以之爲近代貧乏之根源，其後便接續着建議鐵道鑛山之國有化的計劃，還且要用國家之幫助以設立勞動協作生產會社。在一八四八年之革命，白蘭克佔一個重要的地位。他的觀念在德意志三月革命之中，又復奮興起來。他的觀念非常流行，所以拉賽爾(Lassalle)也加以採取，而且運用之以成爲他後來宣傳之建設的部份。

(6) 一八四八之二月革命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事實之深刻的研究，對於革命者和勞動者，是非常重要的，牠比之以前各種革命，都重要過。因爲在一八四八年二月之後，勞動者在歷史之階段中，

已經佔有一個位置，由於牠的要求，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運用他們的權力。這一次革命之發端，擴展，和結局，對於我們，總有深沉之教訓，無論是在現在，或在將來，都是一樣。牠顯示着和一九一八年德國之十一月革命有同樣之高貴。繼長增高的共和黨和低級的中產階級之反抗，財政家之狂歡，高級長官之腐敗，社會主義革命觀念之廣播，一八四五和一八四六兩年之不良的收穫，一八四七年商業之危機和高昂之物價——這些一切因素，聯合起來，把資產階級之統治，放在無信用之破產地位了。巴黎一部份中產階級和低級的中產階級，召集工人羣衆，向塞柵去。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工人羣衆響應這個要求，並且經過好幾次武力之衝突，革命卒獲勝利。君王逃走，羣衆便像水流一樣，站在反動報紙，『國民』(National)，和『改造』(Reforme) 兩個編輯室之前，在那裏，編集了一張臨時政府之名單，以備爲站在外面的人民所承認。其初，共和黨祇想得獲一個中產階級的政府，但受塞柵中戰士之強硬的威嚇，便不得不把社會主義之領

袖，路易士白蘭克，和阿爾伯德（Albert 一個勞動者），列入於閣員之中。政府之元首是拉馬丁（Lamartine），他是一個詩人，演說家，和「共和主義者」，然而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和他的僭輩立刻便企圖背棄了他們的「理想」，把共和政體之宣佈，延緩不變，但爲拉斯比爾（Raspail）所表示的巴黎勞動者之威脅，便令到新的執政者，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共和。同時，勞動者馬茲（Morche）向政府要求『勞動權』之批准——他帶着一枝手槍在手上，站在拉馬丁之前，等到這種『勞動權』法律爲白蘭克所造成而且表現於文字爲止。當時之這種要求，恰和德意志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中之社會化的要求，極相近似。政府總想把路易士白蘭克和阿爾伯德二人排除出外，國務院便在盧森堡宮廷（Palais Luxembourgs）中設立一個勞動委員會。以白蘭克和阿爾伯德爲委員，伯格爾爲祕書。爲要對付實行「勞動權」起見，國家工場便設立起來，而其目的，却想表示工人要求之無信仰，而且指出社會主義觀念之輕浮，不切實際。同時，政府却

又準備武力以制止工人勝利之氣燄，和要求之滿足。像在上面說過，奧格斯德白蘭格當時也在巴黎；他見出臨時政府之計劃，所以他要求應該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爲之掃除污穢，代其地位，而這個社會主義政府則當在相當時間，實行專政，以準備國家之改造。然而臨時政府却根據於牠的民主主義之原理，而且要求召集一個以普遍選舉權爲基礎的國會。社會民主主義之份子，也爲這種計劃所屈服，於是便贊助政府，而反對白蘭格和他的社會主義同輩的意見。自是以後，政府之工作便容易了；牠更增加兵力——表面上，反對共產主義，而骨子裏，却反對無產階級，而且當白蘭格爲着要傾覆臨時政府，而另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爲之代替的目的，在一八四八年，四月，十六日，組織大示威巡行之時，臨時政府便以社會民主主義派之贊助，用移花接木之方法，欺騙羣衆，以武力專爲共產主義之威脅。四月十六日，一大隊莊嚴而無武器的示威運動，在巴黎布街中巡行。旗幟上揭示着下述的口號：『消滅人類之剝削！』『勞動權！』『工人之

組織！」但是政府告訴羣衆，牠並不反抗勞動者和社會主義者，不過牠祇反對共產主義者而已。牠用這種巧妙之提示，而武裝之兵士，便在示威巡行之中，高聲大呼：「打倒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和低級的中產階級本來已充滿着對於共產主義之恐怖，所以他們也一同叫喊起來，白蘭格計劃之目的，便完全失敗了。這些進程之直接的結果便是加強反動之勢力。在四月之末，國會開始選舉了，在那時，一切社會主義之候選人，無不失敗，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好幾個工人被殺呢。

臨時政府爲資產階級所贊揚，而爲一切社會主義及社會革命的份子所譴責，到底也下場了。海因 (Heine) 所表現的意見是非常有趣味的。

「革命之可悲悼的進程，應該歸咎於人民的無信仰之委託者，他們拙劣，無胆，和二心，便把人民統治權之偉大行動消耗淨盡了，這種統治權實是以最無限量的權力交付給他們的。……臨時政府最初時代之權力，某至祇採取「臨時政府」之名稱，這可表現微

小人們之躊躇不決。這個『臨時政府』之名稱，公然地表示牠的胆怯，取消牠能夠做出一切事情的進展。人民已像長大了的孤兒，然而仍沒有在革命的幸福荷囊，抽出更爲不幸的不中的彩票，像那些組織臨時政府之人們一樣。他們都是可憐的喜劇中人，他們頭髮的顏色，和沙士比亞在『夏夜之夢』(Midsummer Night's Dream)一劇中，顯示給我們看見的清客戲劇的英雄一樣。事實上，這些勇敢的伙伴，已經一無所懼，他們總可以嚴肅地工作起來，而木匠叔諾克(Schnock)則在進行中之人民之前，證明他並不是一隻真的獅子，祇是一隻臨時的獅子，他實是木匠叔諾克，而人民也不必震驚於他的咆哮，因爲這祇是一種臨時之咆哮罷了。』(見海因之 Deutschland, 二四二頁)

五月四日國會開會，完成一個中產階級之政府。十天之後，白蘭格利用一種巡行示威，其目的則在於和波蘭及意大利之親善，與乎設立一種『民主主義的國外政策』，他爲示威運動之領袖，領導着羣衆，列隊於國會之前。他走入國會之中，要求演說，提醒

執政者，說他們權力和地位，完全為勞動階級之犧牲所賜，說新政府之外交政策偏於俄羅斯和奧大利兩國，但却不企圖以公義對付那些屠殺法國工人之凶手，又說他們之合法的工作是要從事於社會問題。因為白蘭格之調停，使一切社會主義之份子重歸一致，而起草做出一張代表一切社會主義趨勢的閣員名表。然而太遲，無補於事。反動勢力已經騎駿馬於跨下，執利劍於手中。新政府解散盧森堡委員會，取消國立工場，勸勉失業者，投入軍伍，或回歸故里；他們對羣衆這樣宣言，激動羣衆，在六月之最末一個星期，發生暴動。巴黎市滿佈寨柵，充斥戰士。共和派的將軍加維諾克（Cavaignac）領着政府的軍隊，攻擊無產軍，三日之後，在無產者的最勇敢的戰士之流血中，無產革命之陣營，完全覆沒了。共和派或民主派的資產階級殺戮真正的共和主義者，而却準備着路意拿破命（Louis Napoleon）執政之道路，他被選為法國共和國之總統，後來，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之非常手段（Comp d'état），奪取了專政權，再後一年，竟竊用帝皇之冠冕

了。當時奧格斯德白蘭格被囚，路意士白蘭克和好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則因為逃避拘捕的原故，而逃亡於國外。於是二月革命便因為社會主義者和勞動者之分離與乎革命經驗之缺乏，以可怖的失敗而終結了。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七角 (價實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社會鬥爭史
第四卷
近代社會鬥爭與思想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原著者 Max Beer

翻譯者 葉 啓 芳

發行者 會 獻 聲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話掛號七二七三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
廣州財牌
濟南商埠緯二路
前街樓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54

6050/0